

北京文博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 北京历史名城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及其意义

□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 晏公祠、法海寺和弘教寺考

□ 明长城「北京结」防线的形成及布防策略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2007 2



文物局

王世仁,男,1934年生,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76年任承德市文物局古建队技术员、工程师,1984年调任北京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创办了古代建筑研究所、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并任所长。主要从事建筑历史及相关领域工作。

一、中国建筑史 他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书中有关宋代汾阴后土祠,藏、蒙、回、维等民族的寺庙、民居,明代的长城、敌台、关隘等的新资料,都是他实地调查的成果。该书中的分析图和综合图也是他负责收集、编排并亲自参与绘制的。他对西安南郊汉代礼制建筑(大土门遗址)进行的复原研究,是最早对考古遗址进行原状推测的成果之一。

近代建筑史方面。1958年,他受梁思成先生指派,与傅熹年一起完成了中国最早最详细的一份有关青岛的近代建筑调查报告。他还是《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的主要执笔人和统稿人之一。他曾呼吁保护近代优秀的代表性建筑,并最终在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有所体现。

二、文物保护工作 他主持或指导了很多文物修复的项目,如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北京司马台长城、湖广会馆等。作为圆明园遗址保护工程的学术和技术总负责人,他提出了保护手段服从遗址的价值,达到可逆、可读、可看和可识别的“四可”要求这样一条比较清晰的思路,初步解决了长期困扰文物界的大遗址保护问题。

他认为保护目标和保护手段应当以价值评估的结论为导向,一切历史遗存都具有文物和社会的双重价值。他提出复建永定门的建议并最终得到实现。由他主笔编写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包括38条正文和16章《若干重要问题的阐

述》,由国家文物局推荐成为中国文物保护的行业标准,并获得了国家文物局首届“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一等奖。

现在,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村镇)的保护又成为文物保护的一个新课题。王先生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其不同于其他文保单位的特殊性,在社会发展中必然会发生改变。于是,他主编了北京宣武区和东城区的史迹记录——《宣南鸿雪图志》和《东华图志》,其中前者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后者获得一等奖。以“图志”的形式全面详细地记录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这在国内还是首创。

三、对建筑美学的探索 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曾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建筑艺术和建筑审美特征的文章,并受邀在1980年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上发言,引起广泛关注。同年考取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唯一一名副研究员。

他的《民族形式再认识》、《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传统建筑美学基础刍议》等论文在当时影响很大。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撰写“建筑美学”条目,基本上理清了建筑美学的脉络和各种观念。他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国建筑艺术分支、《美学百科全书》建筑美学分支的主编。他的《民族形式再认识》还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集》中。1986年他将十三篇有关文章以《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为名结集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经过台湾再版,又经过增删,于2005年再次出版。

王世仁先生1995年退休,实际上是“退而未休”,他还在文物保护领域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的主要成果收录在2001年出版的《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中,该书获得2002年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12月,王世仁被推选为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外籍院士。

专家榜

赵迅,男,生于1926年10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他从事教育工作的父亲,曾经兴办过一所小型综合性陈列馆,用中南海(当年中南海是对外开放的)怀仁堂的正厅和耳室当作展室,以“教育群众,启发民智”为目的,不收门票。父亲自己兼任馆长。陈列室和中南海就成为幼年赵迅的课余和假日游憩场所,从潜意识上对展室的清幽环境、展品的琳琅满目和中南海的园林风光萌发出模糊的喜爱。这是他对展陈事业的原始性接触,当年他9岁。两年之后,日寇侵华,太液池泛舟、延庆楼(怀仁堂的后罩楼,抗战后失火烧掉)登高,皆成过眼烟云。十多年后才师从韩寿萱先生,系统地学习博物馆学。

1951年赵迅分配到北京文物组工作,参与筹办过几次出土文物展。5年之后发掘定陵,出土文物急切要求保护。于是1957年文物组请市第二轻工业局协助解决化学保护工作,二轻局派化学工程师祝福祥负责化学保护试剂的研制和应用。祝工是他从事文物化学保护工作的启蒙良师,此后化学保护石刻成为他的业务方向之一。市文物局成立后,将全市的重要石刻文物,全部进行过一次常规性保护。

1961年第一批国保单位公布,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进行“四有”调查。为此国家文物局举办了一期古建测绘班,由于在学校时有莫宗江先生所教画图的基础,他参加了学习并取得了理想成绩。1979年市文物局成立后,设置了古建修缮处,他被任命为首届副处长(正处长暂缺),在任期间,经手修缮的重点项目有德胜门箭楼、东南城角楼、五塔寺塔、孔庙等。在古建修缮的实践过程中,曾撰写过一些考证和辨伪文章,发表于各报刊、杂志上。

1976年,海淀区正白旗38号发现了“题壁诗”。有人把它和曹雪芹联系起来,并在香港发表文章,误导海外学人,纷起指责北京不重视有关《红楼梦》的文物。市革委宣传部项子明部长责令文物部门撰写反驳文章,他文章写毕,经国家文物局陈兹德处长审阅,又经多数知名红学家和《红楼梦》版本学家



的修改后,也在香港发表,争论一时平息,效果相当理想。通过此事,结识了红学界诸多前辈,对清代的人物事迹发生了浓厚兴趣,后来海淀区皂荚屯出土多方墓志,经过整理考证,出版了康熙朝词人纳兰成德的专集,跻身于纳兰研究的行列。

1981年晚些时候调回文物工作队,不久任队主任。1984年,随同梁丹副局长,去西欧文明古国奥地利进行文化交流,在这个“绿化之乡、教堂之国、音乐之邦”确属开阔了眼界,对比之下,颇能发现我们国家的痼疾和不易改变的原因。回国后,共同发表了该国文物、博物馆方面的介绍文章。

1987年他和彭思齐副局长、房山区段汝廉副局长组成考察团前往西德考察石刻文物的保护。当时德国应用丙烯酸材料,已经能使朽坏的石刻经过处理,经受得住锤砸,经破坏性试验,证明可以保持3-5百年有效。回国后,将操作过程、设备和用材资料,翻译出来,曾在刊物上发表。

1987年退休后,社会活动渐多。如应邀到北京的大专院校(北大一分校、民族大学等)授课、辅导毕业生论文及到国图、首图、市文保协会、局下属单位等组织讲座等。期间,也兼任不少文博单位的顾问。在1997年东岳庙的大修工程中,从内部构件和工程做法、用材上,脉络分明地解决了元、明、清的断代,这是以前建筑史家们在书本上难于说明的问题。此外主要参与整理、改正、增删和继续完成书刊,如《北京名胜古迹辞典》(修订版)、《北京名胜古迹图话》及《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等。

密云县大唐庄墓群区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密云县文物管理所



2. M15 出土铜镜



3. M6 墓室



1. M15 墓室



M94:4 白瓷鼎



M14:13 铜盆



M12:2 陶俑



M15 出土青釉瓷器



M14:14 瓷瓶

(彩三)

国家体育场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M3:1 陶罐



M7:1 瓷罐



M8:3 木珠



M8:1 银簪



M8:4 铜扣



M5:2 铜烟锅

北京文博



目 录

2007年第2期(总48期)

文物工作

- 北京历史名城中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及其意义
——对总体规划修编后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探讨之六
..... 孔繁峙(5)
-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王玉伟(11)
- 北京市近年来文物保护工作成果显著 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15)

考古简报

- 密云县大唐庄墓葬区发掘简报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密云县文物管理所(19)
- 国家体育场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2)

文物研究

- 晏公祠、法海寺和弘教寺考 王晓静(24)
- 正阳门箭楼千斤闸机械结构探秘 夏明明(32)
- 北京河畔家园建筑工地一号墓出土之八卦青砖 李华 邹晓天(36)
- 以清代诰封碑为例浅析诰封文的文体特征 王萍萍(38)
- 吉祥寓意的清代玉佩饰 宋彦丽(45)
- 颐和园内的仙山琼阁——治镜阁 李 妍(50)

晚清善扑营和纪式太极拳 宋鹏远(56)

北京史地

明长城“北京结”防线的形成及布防策略 陈倩(60)

隐于闹市的记忆——记朝阳门外九天普化宫 陈巴黎(70)

从历史遗迹看北京国子监孔庙历史上的两次大型修缮工程 邢鹏(74)

皇史宬漫谈——从嘉庆《重修皇史宬记》说起 高智伟(81)

文物保护

不同材质文物温湿度环境的探讨 何海平(89)

中西方文物修复对比之异同 王金生(94)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 2007 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杨康明(97)

封面:圣若瑟教堂(东堂)

封底:大圣若瑟怀抱小耶稣塑像

封二、彩插一:文物局专家榜

彩插二、三:密云县大唐庄墓葬区发掘简报

彩插四:国家体育场墓葬发掘简报

封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部分介绍(一)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任:宿白 副主任: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平 马法柱 王丹江 王玉伟 巴爱民 刘建业 刘超英 杨玲 张展

宋大川 陈平 陈旭 吴梦麟 姚安 赵其昌 晋宏逵 徐伟 高凯军

郭小凌 崔国民 舒小峰 韩永 韩扬 温桂华 葛英会 傅公铤

主编:张展 副主编:陈晓苏 编辑部主任:韩建识

本期责编:韩建识 陈倩 高智伟 美术编辑:宋世华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

BEIJING WEN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2, 2007

Contents

CULTURAL RELICS WORK

- Protec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uildings in Historical Famous City of Beij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the Sixth Discussion on Protection of Beijing Historical Famous City after Compilation of *Collectivity Programming* by Kong Fanzhi(5)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Beijing
..... by Wang Yuwei(11)
-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Work in Beijing in Recent Years
..... b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15)

ARCHEOLOGICAL REPORT

-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Graves Districts in Datang Zhuang, Miyun County
.....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Miyun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19)
-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Graves in National Stadium
.....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22)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 Study on Yangong Temple, Fahai Temple and Hongjiao Temple
..... by Wang Xiaojing(24)
- Research on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the Hoisting Gate in the Arrow-Shooting Watchtower of Zhengyang Gate by Xia Mingming(32)
- On the Eight Diagrams Blue Brick Unearthed in Tomb No.1 in Building Site of Hepanjiayuan in Beijing by Li Hua,Zou Xiaotian(36)
- Analysis on Literary Form Characteristics of Tablets Inscription on Conferment of

Honorary Titles by Imperial Mandate—A Case Study of Tablets in Qing Dynasty

..... by Wang Pingping(38)

Jade Pendent of Qing Dynasty with Auspicious

Meaning by Song Yanli(45)

Zhijing Ge: A Jeweled Palace in Elfand's Hills of

the Summer Palace by Li Yan(50)

Shanpu Y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Ji's

Taijiquan by Song Pengyuan(56)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Defense Line's Formation and Defense Organization's

Tactics about Beijing Knot of Great Wall of Ming Dynasty by Chen Qian(60)

Memory Hidden in Busy Street—on Jiutianpuhua Gong

outside the Chaoyang Gate by Chen Bali(70)

Study on Two Large Reparations in the Imperial College and Confucian Temple's History through

Historical Sites by Xing Peng(74)

Discussion on Huangshicheng—Beginning with *Records on Rebuilding Huangshicheng* of the Jia Qing Reign

..... by Gao Zhiwei(81)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To Probe into the 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Environments for Cultural Relics in Different

Materials by He Haiping(89)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Relics

Rest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 by Wang Jinsheng(94)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1st Quarter of 2007)

..... by Yang Kangming(97)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i Xueqin, Liu

Jim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Kong Fanzhi,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zhu,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Ba

Aimin,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Yang Ling, Zhang Zhan, Song Da-

chuan, Chen Ping, Chen Xu, Wu

Menglin, Yao An, Zhao Qichang, Jin

Hongkui, Xu Wei, Gao Kaijun, Guo

Xiaoling, Cui Guomin, Shu Xiaofeng,

Han Yong, Han Yang, Wen Gui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Vice-Editor-in-chief: Chen Xiaosu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

ment: Han Jiansh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Art Editor: Song Shihua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

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

bjwb1995@yahoo.com.cn

北京历史名城中 近现代建筑的 保护及其意义

——对总体规划修编后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探讨之六

孔繁峙

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是北京近现代历史时期建造的、能够反映城市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这是首次将近现代建筑提到北京历史名城保护的高度，从而使北京历史名城保护的内涵有了新的延伸和扩展。

分布于北京旧城内的各类近现代建筑，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朝晚期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特殊环境下，在古都城市内产生的一种新的建筑模式，代表了北京名城建筑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曾对近代以来北京城市建筑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是北京历史名城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于近现代建筑多是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其建筑年代及特色又与当代建筑较为接近，因此，在建国以来开展的一系列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中，没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在近年来的历史名城保护工作中，在全城众多的历史传统建筑都被动地面对首都城市飞速发展的建设形势下，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更是处于相对滞后的局面，致使旧城内一些有时代价值而没能确定保护级别的近现代建筑，在城市的

建设工程中在逐渐消失着。新修订的总体规划提出的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的理念及对古城历史建筑保护的要求，更加凸显了保存至今的近现代建筑保护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从而使旧城内的近现代建筑在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古都城市近现代建筑的产生与发展

1、历史上西方建筑对古都传统建筑的影响。中国的民族传统建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北京的都城传统建筑更是历经了我国千百年来流传发展而自成系统，在世界上代表了东方历史建筑发展的最高水平。但是，我国传统的古都城市建筑的发展不是封闭的，而是很早就与西方的建筑及文化保持着联系。据历史文献记载，我国唐代的长安城即已发展成为一座具有国际性质的大都市，城市中广泛融汇了印度、缅甸和欧洲等国家的文化艺术，其中印度的佛教建筑及文化对都城建筑曾产生过极大影响，特别是在朝廷的资助下，欧洲国家基督教中的景教曾在长安城内修建了教堂，体现了中国传统都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京古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更是承载了我国都城建设的历史成果。在保持和发

展了都城民族传统建筑的同时，始终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及建筑保持着联系。著名的元代大都城的营建，在发展了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皇宫御苑、四合院、胡同等传统城市建筑的同时，京城内还修建了保存至今的、由当时尼泊尔工匠修建的妙应寺及白塔以及欧洲人修建的多座天主教堂等西方建筑，反映了元代的北京城与西方文化及建筑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发展到明代中期以后，欧洲国家的天主教、东正教更是在京城内广为流传，其教堂建筑不但以其特有的西方建筑形制陆续出现在北京的内城和皇城的四合院区域内，而且还在古都城市内形成了著名的南堂、东堂、西堂、北堂等大型欧式教堂建筑区域。进入清代以后，西方的各种古典式建筑逐步以其独特的建筑布局和丰富的装饰技法以及完善的使用功能，开始深入地影响到当时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在清初以后的皇宫、颐和园内已开始出现欧洲建筑踪迹，特别是在圆明园内已建设并形成了大规模的“西洋建筑”，西方建筑已成为此时的一种建筑时尚。

2、古都城市内近现代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北京古都城市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都市布局及规制严格的传统建筑形制，反映了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完备的封建礼制和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都市的城市建筑都是依严格的封建理念和规范的建筑形制“如法炮制”的。随着清末中国封建帝制的瓦解，封建制度中的等级观念被打破，特别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的新与旧、中与西这两对矛盾的复杂交织的状况下，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型建筑开始冲击历经千百年所形成的城市传统建筑，古都城市的建筑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尤其是随着以钢铁和水泥为代



北平图书馆旧址

表的新型建筑材料及与之相应的新的建筑结构、技术工艺的引进与应用，在北京古都城市传统建筑中，一批前所未有的新型城市建筑开始出现了。如银行、火车站、医院、商场、学校、剧院和新式住宅等等，并成为古都城市这一时期建筑的主导。其建筑特点大致是，初期流行的建筑多是引进西方古典形式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建筑形式以及折衷主义形式，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开明戏院等等；中期以后则多实行民族形式的建筑，如这一时期著名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原北京图书馆以及各种类型的商业、住宅和公共设施建筑等等。这一时期北京城内种类繁多的新型建筑的出现及大量产生，部分改变了古代都市历史建筑的特性，“塑造”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北京古都历史城市从未有过的建筑局面。

3、古都城市近代建筑的种类及分布。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古建研究所对北京近现代建筑的普查和王世仁先生主编的《北京近现代建筑》，结合目前保存状况，可将北京旧城内近现代建筑划分为五大类别：

一是府衙类建筑。有清代末期建于1907年和1909年的清政府的海军部、陆

军部和建于1910年的邮传部、大理院以及建于民国初年的民国国会议场等一批政府部门的办公建筑，其特点多是仿西方的古典建筑形制。

二是各类西方使馆建筑及教堂建筑。这一时期在古城内形成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已发展成为西方多种建筑风格的各国使馆建筑街区。建于上个世纪初期并保存至今的使馆建筑有英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俄国、日本、美国、荷兰等使馆及兵营建筑；此外自民国初年以来，西方教会中的天主教、东正教、耶稣教等兴建的圣米厄尔教堂、亚斯立堂、圣心教堂、基督教青年会等，已在北京古城内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教会建筑群落，这类建筑都呈现为欧洲古典建筑形制；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民族传统形制的教堂建筑，如中华圣公会教堂等。

三是教育文化类建筑。这一时期于旧城内出现的有近代建筑风格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女子师范、汇文学校和法国天主教所建折衷主义形式的圣心、佑贞女中和中西结合形式的天主教圣会法文学校、辅仁大学、中法大学等。近现代文化类建筑有开明戏院、大观楼等一批不同类型的剧院建筑。

四是商业类建筑。在北京历史形成的传统商业区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以一种新的建筑形制先后形成了著名的王府井、东单、前门外等新型商业区，一批新型的商业建筑应运而生。如在前门外传统商业区中保存至今的有西方古典风格的瑞蚨祥、劝业场、谦祥益等商场形制的建筑和欧式的盐业银行、麦加利银行、西方古典式的大陆银行、保商银行、正金银行、花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以及折衷主义风格的北京饭店早期建筑等等，都分布于

东交民巷和前门外的商业区域内。

五是新式宅院建筑。这一时期在京城内涌现出一批欧式和中西结合的新型宅院别墅，如保存至今的有协和医院东单别墅、亚斯立堂别墅等欧式住宅；一批中西结合式的住宅别墅院落也出现在京城传统四合院胡同区域，如保存至今的有宣武门内双合盛啤酒厂资方住宅楼、民国外长曹汝霖灯市口别墅楼和清末通邮大臣盛宣怀小石桥宅院等等。

自清末以来，在京城内以新型建材、新工艺和以新的形制营建的近现代建筑，涉及到古都城市传统建筑的方方面面。从北京历史名城发展史的角度观察，近代建筑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代表了古都城市建筑在近现代时期的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北京传统城市建筑的时代变化。

二、近现代建筑在北京历史名城中的保护价值

近现代时期北京古都城市建筑正处在一个民族传统建筑向当代城市建筑转折的历史时期，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通过引进、模仿西方先进的建筑模式的方式，在古都城市建设发展的进程中，探索着中西建筑结合



清陆军部海军部旧址

的多种民族传统化的途径。

1、近现代建筑在北京名城保护中的历史意义。就近现代建筑的文化性质讲：在沿袭了千百年来的封建都城传统建筑中，近现代建筑是一种具有新时代意义的城市建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文化内容。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以来的封闭社会终于被西方殖民者的枪炮所洞开，西方世界的文化潮流蜂涌而至。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摆脱封建束缚、改变落后状况的一系列探索：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无不反映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及民众对独立、民主和现代化的追求。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碎了长期形成的封建礼教和等级观念，这一时期在古都北京城市中近现代建筑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当时国内的反帝、反封建、追求中国现代前途结合在一起的，更使得此时的城市建筑纷纷突破传统，大胆地引进、借鉴西方的建筑形制，在古都传统城市的各个领域塑造了近现代时期特有的建筑作品。至今这些分布于旧城内的各类近代建筑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古都城市传统建筑文化中，体现了一种探索与时代发展精神。

就近现代建筑的形式讲，曾经历了一个从最初引进、模仿西方古典建筑向折衷形式乃至民族形式的发展过程。从今天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的角度讲，保存至今的近现代建筑，无疑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半叶创造的民族传统建筑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最先大胆地引入了西方建筑文化，在古都传统建筑领域尝试了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与借鉴。特别是在当时西方文化充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期，新生的近现代建筑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在发展中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历史传统，尤其是后期形成的“民族形式”的近现代建筑中，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与中华民族传统建筑的历史渊源及一脉相承。因此，我们应当说，北京古都城市内近现代建筑的产生，仍不失为是民族传统建筑在进入

近现代时期的一次创新与发展。

就近现代建筑的内容讲，其建筑的发展种类涵盖了古都城市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当时的外城、内城、皇城，还是皇宫御苑、府邸宅第、商业娱乐、教育文化等各类城市建筑中，都可以看到近现代建筑的踪影。可见，当时的社会及国人，在求变、求新、求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某种改革意义的近现代建筑，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文化变革，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革新一同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一度成为古都城市建筑发展的时代潮流。

近现代建筑的产生与形成，第一次改变了有史以来北京古都城市由中国历史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模式，最终促成了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单一传统建筑格局的逐渐消解，悄然改变着古都传统城市的历史特性，使古都城市的社会生活步入了近现代社会的前沿。

2、近现代建筑是北京历史名城整体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自元代大都城营建后，历经明、清以来的发展变化，古都的城市建筑呈现和保持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系列，近现代时期，是古都城市建筑经历的一个转折的重要阶段，是近代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及古都城市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期。此时在古都城市内产生的城市建筑，具有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过渡的性质，它不同于自元、明、清以来形成的那种自成系统的民族传统的都城建筑，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伴随着西方强大的外来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和刚刚起步的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建筑。它记述了近代时期古都城市从历史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进程，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古都城市建筑的发展状况及特殊的建筑风格，其影响作用不仅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是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需要在今后北京历史名城保护的具体工作中，提高对近现代建筑保护的認識，切不可将近现代建筑特别是“西方古

典”式建筑看作是与北京名城保护没有关系的“舶来品”。应当把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欧式及西方风格建筑，特别是中西结合及“民族形式”的建筑，视为北京历史名城在近现代历史时期产生的都城建筑，就如同将圆明园中的西洋建筑看作是中国历史建筑一样。今天我们在对古都城市建筑保护的认知上，更不应把各种西方风格的近现代建筑看作是中国民族传统建筑的附属，或者是古都传统建筑的一个种类及分支。应当明确，在北京历史名城实施整体保护的今天，近现代建筑与古都历史传统建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保护价值。

3、近现代建筑在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中的当代意义。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与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对历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离不开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和借鉴。近现代建筑正是处于上个世纪初期的历史城市向现代城市发展的转折时期的城市建筑，其建筑的形制与风格，对古都历史传统建筑及都城建筑格局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对当前历史名城的保护和首都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近现代建筑探索了古都城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保存传统与发展创新。特别是在当时反对封建落后，追求现代生活的社会环境下，新生的城市建筑并没有放弃本民族辉煌而深厚的建筑文化传统，仍能创作并建造出一批具有民族传统风格，及西方建筑风格的近现代建筑。如旧城内保存至今的老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协和医院等一批优秀的建筑，都是既保留了民族传统风格，又体现了现代与发展，至今对我们研究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仍不失其重要的启发作用。在首都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古都城市千百年形成的辉煌的民族建筑文化，是首都发展现代建筑创作的重要源泉，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名城整体保护规划的要求，新时期的古都城市建筑必须继续坚持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旧城内的建筑应该既是现代的，同时也是

传统的，从而使北京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古都文化城市。

二是，近现代建筑最先尝试了民族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结合的途径与方式，使这一历史时期的古都城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留有近现代建筑的“痕迹”。从历史发展的广义角度讲，在北京名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于近现代历史阶段产生的无论是西方早期古典建筑，还是以后出现的折衷形式和民族形式建筑，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一种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目的展开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能为当今提供某些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发展中的国际大都市，对外开放及吸收外来文化的深度与广度，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未有的，这就更需要我们站在比以往历史上更高的视角，在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与首都城市的建设中，准确地把握西方建筑的借鉴及中西建筑的结合方式，更为理智地引进、吸收西方国家的建筑文化，以发展具有北京名城传统特色的现代城市建筑。

三、近现代建筑在北京历史名城发展中的保护思路

不能否认，在以往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在历史名城保护的观念上或多或少地存在重历史传统建筑而轻视近现代建筑的偏见。所以我们以往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存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以往的保护工作中，无论是对近现代建筑个体，还是对近现代建筑街区的处理上，都没能从古都城市的一个时代的整体上对近现代建筑给予应有的重视，致使在建国以来很长一段建设时期内，忽视了对北京古都城市内近现代建筑的保护，以致造成近现代建筑存量大为减少和出现了某些方面的历史“空白”。新修订的总体规划，第一次从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的高度，对古都城市历史上的近现代建筑给予了科学的定位，从而将近现代建筑纳入到北京历史名城保护的范

畴。

为确保名城整体保护规划的落实,在今后的历史名城保护工作中,应综合考虑研究近现代建筑在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中的具体措施与工作部署,需要详细制定近现代建筑管理、保护的具体标准及实施办法,逐步加大对全市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工作力度:

一是,在全市开展的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中,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市近现代建筑的存量和保存现状。在以往开展的传统建筑普查的基础上,以区县为单位,结合区域性的危房维修、改造项目,逐区逐片地对近现代建筑进行调查和认定,详细记录建筑的保护和使用状况,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市近现代建筑的普查专项档案,对有保护价值的近现代建筑,在危房维修改造中,应等同于四合院建筑加以保护。

二是,重点保护好代表不同发展阶段的近现代建筑。北京古都在历经了长达半个世纪近现代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后,曾先后出现这一时期不同阶段建造的“西方古典式”、“折衷形式”和“民族形式”等各类建筑,分别代表近现代城市建筑的不同类别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在这一时期向现代建筑逐步转变的发展过程,有着历史时代的价值。应分别对上述不同阶段和不同种类的代表性建筑采取保护性措施,并适时提交专家认定后,按程序公布为市(或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是,要保护以近现代建筑为主的整体街区及原有建筑,如东交民巷使馆区、前门外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等近现代建筑区域,应采取整体保护的措施。由于这些街区内近现代建筑在后期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应制定街区长远整治、恢复及保护的规划,特别是通过长期的整治、恢复工作,逐步恢复街区原有的建筑景观。如东交民巷使馆区,在保护好现存的比利时、美国、荷兰、日本、英国等国使馆现有建筑的同时,采取整治、恢复的方式,逐步消除历史上其他国家原有使馆旧址上的后期

建筑,按照街区历史原貌和各国建筑特色,恢复历史上各国使馆原有的沿街建筑。如占用俄国使馆旧址的单位等,前几年在文物部门的建议下,曾结合单位使用需要,依历史上俄国使馆的建筑形制,以恢复使馆沿街建筑的方式,修建了单位的管理用房,既满足了单位使用的需要,又局部恢复了沿街的原有的建筑。如按此办法坚持数年,就完全可以使街区的历史建筑面貌得以恢复。

四是,研究和制定近现代建筑的维修保护标准,以保护和延续近现代建筑的历史原貌。当前对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近现代建筑的维修保护问题,已不再是文物保护的主要矛盾,今后保护的突出问题将显现在分散于各处的区级以下的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工作上。其中最突出的将是没有被列入保护级别而被居民占用的近现代建筑的保护问题。对这类建筑的保护,需要有关方面加强管理,特别是在政府部门、使用单位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与配合下,不断地落实相应的维修资金,才能最终实现对全市近现代建筑的保护目标。

北京历史上产生的为数众多的近现代都市建筑,在古都城市的部分区域初步塑造了近代都市的城市特性和时代风格,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及重大事件的风云际会,是透视北京近代历史发展及其政治文化的重要窗口,同时,也对首都城市当代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当前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的意义上看,近现代建筑产生初期的原始意义及其建筑特有的时代价值,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不断的扩展,其历史作用也被赋予了更丰富、也更为重要的涵义,这无疑将会为北京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承接和借鉴的历史资源。

注:在此专题的调研及学习中,特拜读了北京古建研究所老所长王世仁先生编的《北京近现代建筑》一书,受益匪浅,特此致谢!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王玉伟

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有 3000 多年的建城史,800 多年的建都史。现存各类不可移动文物 3000 余处。其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天坛、颐和园和十三陵等 6 处,文物建筑总面积近 500 余万平方米。

2000 年以来,北京市不断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分别对近 200 余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维修、加固和保护。总体来说,修缮涉及的范围较以前增大,其绝大多数属于正常的维修保养、抢险加固和确保文物真实性因素存在的保护性修复。同时也纠正了在以往修缮过程中,少量的因不正确的干预对文物安全造成潜在隐患的做法。

为使以上工作在中国与世界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法规、公约和宪章规定的原则下顺利实施,北京市在国家文物局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指导下,在遗产保护理论与

实践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一)保障措施

1、在 2002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基础上,2004 年,公布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2、2005 年,为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确保文物安全,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文物建筑装修暂行标准及管理规定》。

3、北京市政府分别公布了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十三陵世界文化遗产的专项管理办法,并正在制定故宫专项管理办法。

4、北京市已经划定并公布了全部 6 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包括缓冲区)。

(二)法规依据

1、相关法规与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威尼斯宪章》、ICOMOS《木结构历史建筑保护原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及中国文化部《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及《北京市文物建筑装修暂行标准及管理规定》等。

2、保护规划

各遗产地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9-1-1条的精神,加紧推进文化遗产地保护总体规划的修订和编制工作,以此为基础,各遗产地分别制定文物建筑修缮(分步实施)的详细规划。

目前,北京文化遗产地的保护维修正是按照既定计划分年度逐步实施的,从而避免因政治和经济及庆典等因素对正确修缮程序、工期、质量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3、履行各项审批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规定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7条关于管理机制的要求,文化遗产修缮设计方案和工作程序严格履行工程报批和竣工备案程序,涉及世界文化遗产重大项目及时通过国家文物局向世界遗产中心备案。不仅文化遗产修缮质量得到保障,也使其周边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4、完善组织管理制度

遗产保护项目推行施工公开招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经费管理使用审计制度和修缮竣工档案验收备案制度。切实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进一步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和社会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热情。

二、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二十一条:“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修缮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2-2-1条“现存的实物必须是历史上遗留的原状,包括始建时完整的状态,历史上多次改建后的状态 and 长期受损后残缺的状态”的要求,对于少量缺失部分的恢复或去除后代增添无保留价值的部分时,必须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并经专家咨询机构评估,严格遵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第3-3-2条的各项规定。

(一)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力求最少干预

1、加强检测、及时保养。传统的木构建筑更具脆弱性,坚持对可能的病害部位日常监测至关重要。首先关注日常的管理,防微杜渐,发现问题及时保养,这是最少干预的最佳良策,各遗产地均应将文化遗产的监测列入日常管理的范围,并使之成为方案论证、评估的重要依据。

2、分析评估、准确判断

对现状深入调查,对病害认真分析,对病因准确判断。对早期病害,通过监测未继续发展的(如地震瞬间造成的损坏,地震后结构稳定,未发现继续恶化的),均以现状维护保护为主,不刻意追求任何形式和任何时代风格的统一,以最大可能保存不同时期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二)坚持能加固就不更换的原则

古建筑的维护加固坚持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与可区别、可逆性的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赞成以“一劳永逸”、“彻底解决”和“风格统一”为借口随意扩大干预范围,增加干预程度的做法;不赞成文化遗产科学保护规律之外的各种因素影响正确保护程序及进度的做法。

(三)将科学研究贯彻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始终

1、建立科研机构。《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为:“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考证,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此,各遗产单位都已成立和正在建

立自己的设计、研究机构,以确保进一步提高各遗产地的保护水平。如故宫不久前成立了故宫古建筑保护研究中心,表明各遗产地对遗产保护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

2、以科研为基础,现场观测、勘查为基本手段。坚持以现状调查、专业咨询机构专家论证评估为依据,制定修缮计划和设计方案。

3、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加强遗产保护。充分、合理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文化遗产的监测。同时,在文化遗产的抢修加固中积极探索,在最大可能保存真实历史信息的实践中应用先进科技的成果。

(四)将展示发挥文物古迹价值作为遗产保护工作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中国文物古迹准则》第4-1条的要求,在实施对建筑本体保护的同时,除充分考虑解决可能存在或已出现安全隐患的因素外,还要考虑建筑功能(功能延续、功能中止、功能改变等)的不同情况,力求使保护措施更加科学、合理(如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古民居等,虽因它们的属性不同,但在历史和现实中同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等非物质因素),更有利于发挥其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作用。

(五)加强宣传、公众参与是做好文物保护的重要因素。从文化遗产管理利用到社会集资保护,充分说明遗产保护得到了一切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在修缮中充分考虑了使用者和游人的需求及影响,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支持。

(六)做好记录档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6-1条要求修缮工程特别关注记录和档案管理,尤其对于缺失严重部分,要按照《威尼斯宪章》关于“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的原则,注意在相关构件和记录档案上做好各项标识与记录。工程完工后及时出版修缮工程实录。

三、修缮案例研究

(一)油漆彩画

1、作用。油漆彩画是中国木结构传统建筑的重要元素,具有很强的装饰作用,是建筑等级、建筑艺术的生动体现,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同时兼具一定的防护功能。

2、特点。由于自身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使之难以长久保存,特别是室外彩画更是如此。北京现存建筑外檐彩画绝大多数已经为清代以后重新绘制,且保存状况较差,自然风化致使许多彩画起甲、粉化、脱落。特别是近代重新绘制的部分彩画,材料工艺较差,现状破损更为严重,许多已改变了历史原状,不能反映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文化内涵,应该在修缮中恢复历史原状。

如故宫中轴线建筑群与天坛祈年殿院古建筑群的外檐彩画,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问题,这也是在修缮设计和专家论证中决定重新绘制的重要原因。修复的彩画将更加体现历史的真实性和皇家古建筑群的文化内涵。但对于内檐保存较好、年代较早的旧彩画均以修为主,全面保存。

3、具体做法

(1)旧彩画现状保存。目前修缮中一般只做除尘、加固,原则上对局部已经脱落部分原状修复,色调上与环境相结合。新做部分要与旧彩画有所区别并做适当标识。室外部分一旦损坏都比较严重。对于早期有价值的彩画,必须以修为主,加固保护。对于近代绘制部分有价值的且保存状况较好的也应维修、保存。

(2)重做彩画。对于十分残破、工艺质量较差,绘制年代晚的非原状部分彩画,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重新绘制,恢复历史原状。

(3)案例分析

例1:颐和园长廊彩画,虽然主要是70年代所做,但因格局较为完整,现状较好,可通过维修继续保持较好状态。因此本次修缮全部采取修补、加固,原状保存。对于历史上已经脱落、失色,加固后仍难以保存以及近代绘制的彩画因部分使用非传统

材料、非传统工艺,且已改变历史原状的,在做好记录、做出小样后,按历史原状重新绘制。修复中充分尊重传统,但不刻意仿旧。对于替换下的部分,有代表性的都要留存、保护。

例 2:天坛神乐署,在修缮中对内外檐旧彩画,尽管年代较晚、存量较少,仍予以维修保存。

(二)建筑屋面

中国古建筑屋面,一般用瓦件防水,泥灰铺瓦,强度较低,特别是底层望板极易糟朽。因此,绝大部分古建筑屋面实际上不可能长期保持安全状态,必须进行经常性的保养与维修。具体做法:

1、对于保持较好的屋面,通过除草、捉节加垄进行保养。如天坛祈年殿屋面,没有进行任何扰动。

2、对于部分损坏可能会造成渗漏的,采取局部重新揭瓦或局部挑顶做法。如故宫神武门屋面等。

3、对于较难通过局部维修解决渗漏并严重影响功能发挥的,在不得已情况下采取挑顶做法。这种做法只有故宫武英殿因梁架出现严重安全隐患才进行了挑顶。

4、在做好全部记录情况下,原状维修加固予以修复。对于屋面瓦件,要求按拆卸时编号顺序原位使用,必须更换的残损瓦件,复制时要保证原规格、原色调、原材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烧制时标注制造年代。对于维修后可继续使用的瓦件,按传统做法维护加固后继续使用。如颐和园在修缮中十分注意记录档案的管理,保存了大量照片资料。

(三)大木架结构

中国古建筑多为木构,整体性、安全性、抗震性特点突出,但早期建筑的包砌部分,因潮湿、虫蛀等原因造成构件糟朽而危及建筑整体安全。因此,对建筑经常性的检查,及时的加固维修、排除险情、修补更换不能承载整体结构、丧失结构功能的木构的做法是必要的,具体做法:

1、对所有木构优先考虑保护、加固和

维修。主要包括:剔除病害部分,进行防腐处理后原材、原样修补,如木柱墩接、修补梁头、檩件上皮等。如对太和殿后檐已糟朽的角柱下部采用墩接方式处理,以保留尚存的原构件。

2、既最少干预,又要考虑环境的影响。修补后不能保证消除安全隐患的,在对外观不造成大的影响并具有可逆性的基础上,采取附加柱支撑、拉接等方法解决安全问题,以确保原构件得以继续保存。

3、对于维修加固、支撑和拉接仍不能解决结构安全隐患,且险情逐渐发展的,不得已情况下方才考虑更换。更换下来的旧件不能继续使用的予以登记记录。其中有保存价值的作为文物收存。新换构件应与旧件材质相同,做法、工艺不得改变。替换后的构件要在适当位置钉牌或题记等以标明更换年代,以示区别。

总之,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充分认识到以《威尼斯宪章》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奈良真实性文件》、ICOMOS《木结构历史建筑保护原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 15 届 ICOMOS 大会达成的《西安宣言》为基础,各国根据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手段多样化的理论与实践,将有利于促进文化遗产保护措施更加合理、科学及更有利于一切利益相关者。目前,在多元文化传统背景下,这些理论已成为世界各国探索保存与延续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不断深化的正确途径。

我们期望本次会议及形成的文件,将有助于中国乃至亚太地区迫切需要就东方木构体系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东方木构建筑所承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审美价值诸问题,得出更为具体、统一的意见。

(注:此稿为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代表北京市文物局在 2007 年 5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市近年来文物保护工作成果显著

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

2007年6月9日迎来了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回顾2000年以来，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并成功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切实践行了“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三大理念。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近年来在文物保护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近年来北京地区文物建筑修缮工作成果



故宫太和门西虎原状

2000年，市委、市政府做出三年投入3.3亿元，对重点位于“两线、一街、一区”^①内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进行抢险修缮的决定。市委、市政府又于2003年做出五年投入6亿元，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决定，按照“整治两线景观、恢复五区风貌、重现京郊六景”^②的保护思路，对部分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进行了抢险修缮，使全市文物建筑的保护状况得到

明显改善。目前“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接近尾声，全市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果卓著。主要体现在：

一是有效地缓解了历史欠账，一批文物建筑得到抢救和保护。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来修缮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39处，修缮面积近33万平方米，天坛、颐和园、周口店遗址、先农坛、十三陵、历代帝王庙、孔庙、国子监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得到抢修，缓解了我市文物建筑年久失修的局面。



故宫太和门西虎现状

二是消减了部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存在的严重安全隐患。从2005年起，北京市每年从“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专项经费中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解决文物保护单位存在的安全隐患。三年来，先后消减了太庙、钟鼓楼、戒台寺、潭柘寺、正阳门、德胜门箭楼等66个单位100余处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

三是有效地推动文物保护单位的合理



修缮前的明十三陵德陵三座门



修缮后的明十三陵德陵三座门

利用，一批不合理占用文物建筑的单位搬迁腾退，成果突出。据统计，市政府为两项计划共投入专项资金 9.3 亿，带动各区县和相关单位配套资金 50 多亿元，搬迁不合理占用单位 880 余个，居民 14200 余户，为抢险修缮和合理利用创造了条件。

四是恢复了部分旧城历史景观，一批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实现对社会开放。通过对不合理占用单位的搬迁腾退及文物保护单位违章建筑拆除、文物建筑修缮和环境整治，恢复了菖蒲河、南中轴线、后门桥等历史人文景观，建成了莲花池、元大都土城、明城墙、东皇城根等遗址公园，修缮开放了袁崇焕祠、纪晓岚故居、历代帝王庙、天坛神乐署等一批价值高、知名度大的文物建筑，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据统计，文物保护单位修复后重新或扩大开放的有 58 处，修复后新开放的 41 处。



南正遗址二区 M17 出土文物(东汉)



陶狗



铜带钩

南正遗址三区 M17 发掘现状及部分出土文物(东汉)调工程，文物保护先行”的指示。

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物保护工作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对于抢救和保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确保南水北调工程的顺利实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是依法行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伟大实践，也是贯彻文物工作方针、宣传和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重要机遇。第三，因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而进行的大规模、多学科、高层次的文物抢救会战，既是对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总体水平的检验，也是向公众全面展示文物考古事业辉煌成就的一次很好的机会，必将大大促进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and 整体水平的提高。

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自 2005 年 7 月 15 日始，2006 年 9 月 20 日结束。勘探面积 272 万平方米，完成发掘面积

二、近年来北京地区考古工作成果

近年来，北京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在基建工程建设过程中抢救和保护了大批出土的地下文物，特别是完成了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及奥运场馆建设工程中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1、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

中央领导及北京市领导高度重视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南水北



六间房出土瓷器(清代)



皇后台出土瓷器(辽金)



飞碟靶场项目保存完好的明代石室墓

16360 平方米，共发掘遗址 8 处、墓葬 125 座、窑址 13 处及灰沟、灶址等其他遗迹，出土文物时代跨度为战国、汉、唐、辽、金、明、清，出土了陶器、石器、铜器、玉器、瓷器等大量各类文物。

其中丁家洼遗址是北京地区首次系统发掘的春秋时期燕文化居住生活遗址，填补了东周燕文化以往考古发现的空白。遗址内涵丰富，为东周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具体的资料，也使学界对于东周燕文化面貌的认识更加深入。

2、奥运场馆建设文物保护工作



飞碟靶场项目明代石室墓墓门



飞碟靶场项目明代石室墓内供桌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各奥运场馆的具体情况，按照“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工作方针，北京市文物局与原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制订了阶段性的工作方案，由北京市文



瓷罐

M130 出土玉带

飞碟靶场项目部分出土文物

物研究所负责实施。目前，已圆满完成了保护、抢救文物的工作。

2004 年至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工作人员以科学的工作态度和规范、严谨的工作作风，先后对 10 余处奥运场馆及配套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调查和发掘工作，分别为五棵松篮球馆、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会议中心、数字北京大厦、奥运村工程、五棵松棒球中心、飞碟靶场等。

截至目前，勘探总面积已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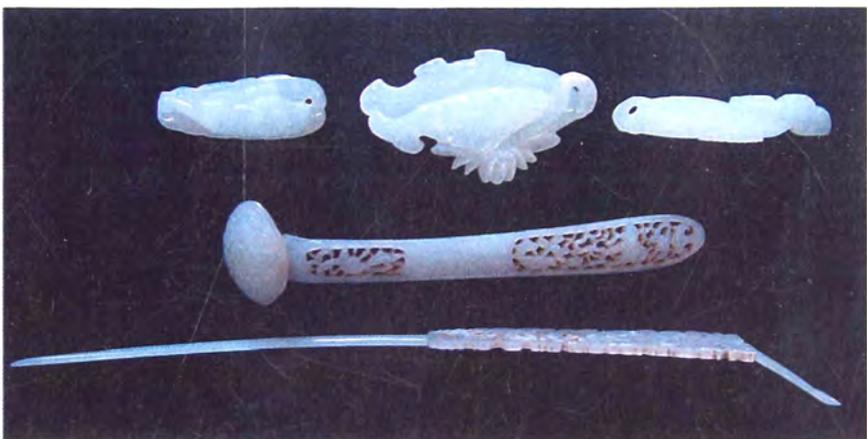


飞碟靶场项目出土金器

150 余万平方米，清理发掘汉代至明清时期古墓葬 700 余处，出土了可整理复原的文物 1500 余件，包括各时期瓷器、陶器、铜器、饰品等，这些为我们研究汉、辽金至明清等各个时期北京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上述奥运场馆主要集中在朝阳区大屯、洼里及海淀区五棵松等地区，地下文物以明清时期中小型古墓葬为主。这些考古工作和出土的文物，为我们研究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研究北京地区汉代至明清时期墓葬习俗、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对探讨北京地区区域文化、北京城市发展史等问题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目前，北京市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修复、研究，对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整理，以充分发挥文物的研究、教育、展示作用。通过各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和努力工作，做到了在保护好文物的同时，很好的配合



五棵松体育中心清墓 M5 出土玉器

了奥运工程的顺利实施，充分体现了“人文奥运”的精神。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近年来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批文物建筑得到抢修，消减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安全隐患。修复后的文物建筑得到了合理利用，其中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对社会开放，旧城内部分历史文物景观得到恢复。在南水北调、奥运场馆等基本建设工程中抢救和保护了大批的地下文物。

北京市社会经济及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赋予了文物保护工作新的课题，给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为此，市委、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正在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制定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中、长期规划，使北京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水平再上新台阶。



国家体育场出土瓷器

①两线：指中轴线、朝阳门—阜成门沿线。一街：指国子监街。一区：指什刹海风貌保护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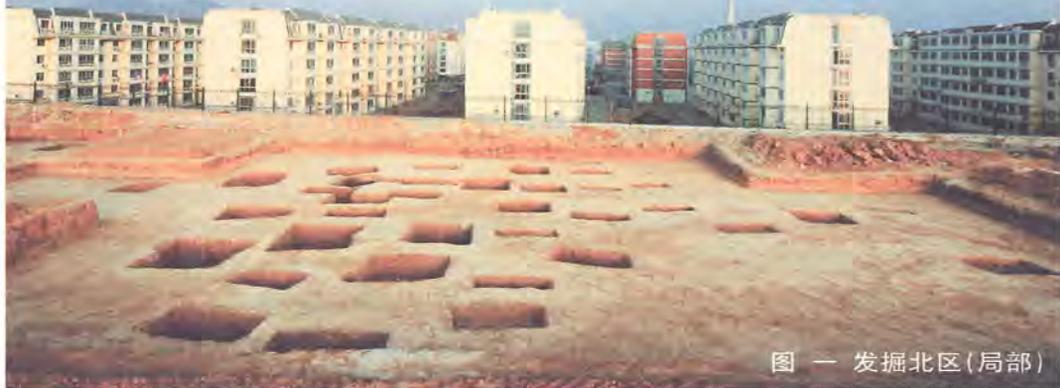
②五区：指什刹海风景区、国子监古建筑游览区、琉璃厂传统文化商业区、明清皇城景区、古城垣景区。六景：指西郊风景名胜区、北京段长城风景保护区、帝王陵寝保护区、京东运河文化带、宛平史迹保护区、京西寺庙景区。

(执笔：刘保山)

密云县大唐庄墓葬区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密云县文物管理所



图一 发掘北区(局部)

一

大唐庄墓葬区位于密云县城关镇大唐庄村东南。为配合新景家园小区工程建设,2007年1—3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密云县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根据墓葬的分布情况将发掘区分为南、北两区(图一、二),共清理汉、唐、辽、金、明、清等各时期墓葬122座,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二

汉代墓葬仅发现1座(M97),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正南北向,墓内未发现人骨架,清理随葬陶器4件。

唐代墓葬清理56座,按其形制、规格可分为大、中、小三类。最大者通长约20米,例如M96(图三)。虽均经盗掘,部分墓葬仍出土有陶器、瓷器等遗物。墓葬的棺床

有直尺、折尺、“凹字”形三种形制。墓砖所砌的窗棂、门扇、柱础、斗拱等仿木构较有价值,为了解唐代的建筑形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中一座后室呈拱券门状墓葬(M106)在北京地区较为少见。M106位于南区中部偏东,正南北方向,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层。墓口距地表深0.50米。该墓平面呈长方形圆角,由墓道、墓门、前室、后室四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墓门的南侧,呈长方形斜坡状。墓道南北长3.66米,东西宽0.72—0.86米,墓道口距墓底深2.02米。

墓门位于墓道之北、前室之南。墓门高1.38米,宽0.74米,进深0.86米。距墓门底高0.94米处起券,拱券门高0.44米。墓门之砌法为二平一侧,拱券门上部用平砖相互错缝而砌。

前室位于墓门之北、后室之南。平面呈长方形圆角,南北长2.63米,东西宽2.25—2.80米,残存高1.78米。四壁用二平一侧砌法。前室内有棺床,棺床东西长



图三 M96

2.80米，南北宽1.22米，高0.38米。棺床边为平砖砌法，棺床内铺地砖，为东西错缝平铺。

后室位于前室北侧，平面呈长方形。后室门高0.76米，宽0.52米，拱券门。后室南北长2.06米，东西宽0.54-0.74米，残存高0.68米，用平砖相互错缝砌成(图四)。

辽代墓葬多属辽代晚期，共清理8座，可分为双室、单室两种。单室墓葬的形制均较小，例如M58(图五)。从墓室壁面的残留情况看，许多墓葬当时有彩绘，现已漫漶不清。

辽墓依墓室的平面形制区分，又可分为六角形、八角形、圆形、方形圆角等形制。其中，八角形、六角形墓室，在北京乃至长城以南地区是较少发现的，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当时的生活习俗具有重要联系，为了解当时契丹族的生活情况提供了



图四 M106



图五 M58

宝贵的依据。

M15位于北区中部偏东，方向为正南北方向。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墓口距地表深0.80米。该墓由墓道、天井、墓门、前厅、厅门、墓室六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六角形。

墓道位于墓门的南侧，呈长方形斜坡状。南北长7.8米，东西宽0.72-0.92米。墓道口距墓道底深3米。

墓门位于墓道之北、前厅之南。墓门正视呈长方形，门总高2.62米，宽2.92米。墓门上部有三个斗拱。斗拱高0.44米，宽0.32-0.76米。左右两边各为一斗三升斗拱，中间为斗拱重叠出跳(图六)。拱券门位于墓门中部，门高1.48米，宽1.04米。顶部用南北侧砖拱券，拱券高0.27米。门边用两平砖一侧砖相互错缝砌成。墓门内封门砖，高1.48米，宽1.04米，用南北向平砖相互错缝砌成。墓门之左右两边各有一根由立柱砖砌成的砖柱，高1.82米，宽0.06米。拱券门的上部有两个门簪，呈正方形，边长0.14米。墓门的東西两侧砖的砌法为两平砖一侧砖砌成。墓门的上部为平砖相互错缝砌成。

前厅位于墓门北侧，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84米，东西宽1.76-1.88米，高1.98米。顶部用立砖砌成穹窿顶，高0.56米。厅的壁砖砌法为两平一侧砖相互错缝砌成，



图六 M15墓门



图七 M34

厅壁上部用南北向平砖相互错缝砌成。

厅门位于墓室南侧，南部与前厅北部相连接，正视呈长方形。高 1.16 米，宽 1.02 米。顶部为拱券，用侧砖相互错缝砌成，起券高 0.18 米。门边用两平砖一侧砖相互错缝砌成。

墓室位于厅门北侧，呈六角形，顶部已塌。南北长 2.9 米，东西宽 3.1 米，残高 1.32 米(彩二:1)。墓室壁用南北向侧砖相互错缝砌成。壁与壁之间有 0.20 米左右的空间，空间内有木板腐朽的痕迹。墓室底部铺有地砖，砖的铺法为东西向错缝平铺。墓室北部有一石棺，棺内有烧骨。随葬品出土有陶器、瓷器(彩三)、铜器(彩二:2)等。

清理金代墓葬 3 座，均为单室墓(彩二:3)。

明、清时期墓葬共清理 45 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一墓一棺、一墓二棺、一墓三棺、一墓四棺(图七)四种形制。随葬的陶罐、瓷钵、饰品、铜钱等为了解当时的民俗提供了重要实物。

其它时代暂不明者 9 座。

三

大唐庄遗址所清理之墓葬，年代跨越了唐、辽、金、明、清等几个主要时期。墓葬形制本身及墓葬所遗存的随葬品，是解决北京东北部地区唐代以降考古学文化编年的重要资料。

大唐庄地区以前也曾有过发现唐代墓志的报道^①，本次发掘又取得了重要收获。同一区域内出现年代如此衔接的墓区，这在北京地区是较为少见的，从而证实千年来白河流域就是适宜人类生息的场所。

密云县位于北方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冲，在中国文明缔造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此次大唐庄墓葬的发掘，对了解民族间的迁徙、融合、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陈康：《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北京文博》2006 年 1 期。

(执笔：李华、郭京宁、祝自详、郭峰、刘长河)



图二 发掘南区(局部)

国家体育场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建设中的国家体育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北辰东路西侧，东邻凯迪克大酒店，南临北辰花园别墅区，西为新奥公司体育场配套工程 B1 区，北为中一路(图一)。2004 年 7 月 14 日至 7 月 24 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该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墓葬 10 座，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 墓葬形制

本次发掘清理的 10 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以下依埋葬特点，将各墓形制分类加以叙述。

1. 搬迁墓 2 座。编号分别为 04GTC: M1、M3。

M1: 位于发掘区北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300°。长 2.8m，宽 1.5m，深 2.5m。因搬迁破坏，棺木大小不明。

M3: 位于发掘区中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0°。长 3m，宽 1.02m，深 2.5m。棺木已朽，棺迹长 1.84m，北宽 0.62m，南宽 0.5m。

2. 单棺墓 7 座。编号分别为 04GTC: M2、M5、M6、M7、M8、M9、M10。

M2: 位于该发掘区西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270°。长 2.4m，宽 1m，深 2.2m。骨架一具，头向西，仰身直肢。棺木已朽，仅残存朽木痕迹，棺迹长 1.7m，西宽 0.55m，东宽 0.38m。

M5: 位于发掘区西部，其东北角打破 M6 的西北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215°。长 2.2m，南宽 0.9m，北宽 0.8m，深 2.5m。骨架一具，头向南，仰身直肢。棺木已朽，棺迹长 1.62m，南宽 0.6m，北宽 0.38m。

M6: 位于发掘区中部，其西北部被 M5 东北角打破，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0°。

长 2.7m，宽 1.6m，深 2.1m。骨架一具，头向北，仰身直肢。棺木已朽，棺迹长 1.8m，北宽 0.66m，南宽 0.6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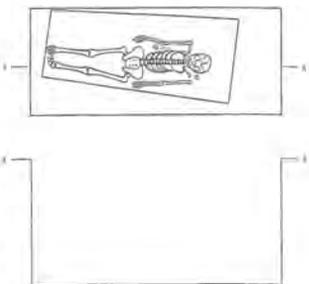


图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

M7: 位于发掘区南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0°。长 2.4m，北宽 1m，南宽 0.9m，深 2.3m。骨架一具，头向北，仰身直肢。棺木已朽，棺迹长 1.7m，北宽 0.6m，南宽 0.52m。

M8: 位于发掘区南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0°。长 2.4m，宽 1m，深 2.3m。骨架一具，头向南，仰身直肢。棺木已朽，棺迹长 1.8m，南宽 0.8m，北宽 0.64m(图二)。

M9: 位于发掘区东北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290°。长 2.4m，宽 0.9m，深 2.3m。骨架一具，头向西北，仰身直肢。棺木已朽，棺迹长 1.8m，西宽 0.6m，东宽 0.52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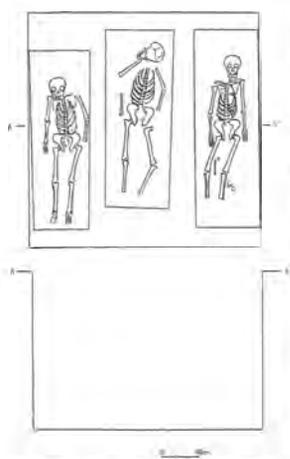


图二 M8 平剖面图

M10: 位于发掘东南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50°。长 2.4m，宽 0.8m，深 2.5m。骨架一具，头向东，侧身曲肢。棺木已朽，棺迹长 1.75m，东宽 0.5m，西宽 0.4m。

3. 三棺墓 1 座。编号为 04GTC: M4。

M4: 位于发掘区北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270°。长 2.5m，宽 2.5m，深 3m。骨架三具，头向西，仰身直肢。棺木已朽，北



图三 M4 剖平面图

边棺迹长 2.1m, 宽 0.7m; 中间棺迹长 1.9m, 西宽 0.75m, 东宽 0.7m; 南边棺迹长 1.9m, 西宽 0.66m, 东宽 0.6m (图三)。

二 随葬器物

出土的随葬器物共 16 件(所出铜钱按 1 件计), 有陶器、瓷器、银器、铜器、木饰等。现分别介绍如下。

1. 陶器 2 件, 均为罐。

罐 2 件。M3:1, 器形较小。泥质红陶, 口沿至上腹部施黄绿釉。侈口, 圆唇, 短束颈, 上腹微鼓, 下腹弧收, 平底。口径 10、底径 7、高 10cm (图四:1; 彩四)。M9:1, 器形较小。泥质灰陶。侈口, 尖圆唇, 折沿, 束颈, 上腹外鼓, 下腹斜收, 平底。口径 10.1、底径 6.8、高 10.3cm (图四:2)。

2. 瓷器 1 件。

罐 1 件(M7:1)。白瓷。直口, 方圆唇, 斜颈, 圆肩, 上腹外鼓, 下腹弧收, 平底。口径 7.9、底径 8、高 12.2cm (图四:3; 彩四)。

3. 银器 1 件。

簪 1 件(M8:1)。簪体扁平弯曲, 上饰花朵、枝叶纹, 中间为一只飞舞的蝴蝶, 簪首作花朵形。长 18.4cm (图四:4; 彩四)。

4. 铜器 8 件, 有簪、扣饰、烟锅、钱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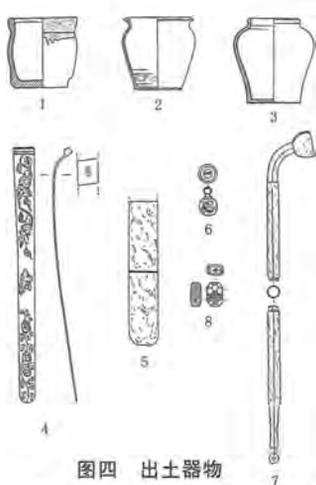
簪 1 件(M8:2)。簪体宽扁, 无纹饰, 簪首残。长 10.4cm (图四:5)。

扣饰 5 件(M8:4)。体呈圆球形, 素面, 顶部为环状。长 2cm (图四:6; 彩四)。

烟锅: 1 套(M5:2)。整体为铜质, 由烟锅、烟杆、烟嘴三部分组成。烟锅圆形, 烟杆剖面呈环形, 中间有孔, 孔由锅到嘴渐细, 烟锅与烟嘴分离, 中间用藤木连接, 便于清除烟油垢, 烟嘴端头呈圆帽形。烟锅直径 1.9cm, 烟

杆长 16cm, 通长 22.95cm (图四:7; 彩四)。

钱币 11 枚, 有大清铜币、乾隆通宝。圆形, 方孔, 宽缘, 对读。大清铜币 4 枚。直径 2.8cm。乾隆通宝 7 枚。直径 2.4cm。



图四 出土器物

1. 陶罐(M3:1) 2. 陶罐(M9:1) 3. 瓷罐(M7:1)
4. 银簪(M8:1) 5. 铜簪(M8:2) 6. 铜扣饰(M8:4) 7. 铜烟锅(M5:2) 8. 木珠(M8:3)

5. 木饰 4 颗。

木珠: 4 颗(M8:3)。形状、大小相同。通体黑漆, 委角长方形, 上有圆形穿孔, 体用贝壳饰花叶纹。长 1.75、宽 1.2cm (图四:8; 彩四)。

三 结语

此次发掘清理的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十余件, 从器物形制来看, 出土的大部分器物如陶罐、瓷罐、银簪、铜烟锅等与国家体育馆^①、新奥公司体育场配套工程^②出土的同型器物相同。综合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等方面, 此批墓葬应属于清代的墓葬。

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 所清理的 10 座墓葬均为中小型墓葬, 墓主人身份不高。该批墓葬的清理, 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北京地区清代墓葬的认识, 为研究清代墓葬的形制特点及其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国家体育馆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2006 年 4 期。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新奥公司体育场配套工程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2007 年 1 期。

(执笔:张智勇、张治强、刘凤亮)

(绘图:刘坠生)

晏公祠、法海寺和弘教寺考

王晓静

一、晏公祠、法海寺现状

1、晏公祠现状

从团城演武厅西面南正黄旗村中的路沿山势先向北行,进而折向西南,前行大约1500米,路旁有一龟趺,再向前行约100米,有一停车场,沿西边的石阶而上,为一山坳,山坳中有一片密林掩映的平地,南面为山谷,隔山谷与对面山脊上的法海寺相望;北面依山,晏公祠就掩映在此处的密林和荒草之中。晏公祠现存地面建筑有二座,东面稍偏北处,为“停云岩”,有石室三间,坐北向南,北面依山而建;西面为地藏殿,亦为三间,坐北向南。地藏殿和“停云岩”之间有一片瓦砾堆,当为原来建筑的遗迹。

“停云岩”石室的顶部坍塌,上面长满了灌木,无从推测其样式。石室正中为一券形门,东西各有一券形石窗。门券上方嵌一石匾,阳刻“停云岩”三字,正书。东面石窗上方阴刻“邀月洞”三字,正书,西面石窗上方无字。

进入石室,内有二石墙将石室分为三间,中室东西墙上各有一券形门通往东西二室,石室内部的墙壁、地面和拱形天花板均为石砌。东面券门上镌“三省斋”,西面券门上镌“四知堂”,均阴刻,双钩正书。中室北面石壁下方有一拱形石龕,龕内壁上依稀看见刻有文字,已无法辨认。石龕上方整面石壁均刻有文字,但漫漶严重。石龕上方正中有一边框浮雕云龙纹的长方形石刻,石面剥蚀,仅能辨认出一个“箴”字。石龕左



法海寺现有大门



祠石殿

上方即西边，刻有《尚书》中的一段文字：“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道。”

三省斋即东室的北壁下方亦有一拱形石龕，龕壁镌刻有文字，亦漫漶。石龕上方的石壁上亦整面刻满了文字，剥蚀严重，无法辨认。石龕上方正中石壁有一长方形青石，青石左右两边各镌一线刻人物，侧身拱手相对而立。青石中间部分凿出一长方形凹面，凹面亦剥蚀较甚，依稀看见线刻人物三人，正中人物较为高大，南面而坐，头戴官帽；两边人物较小，长袍宽袖，头戴幞头，亦侧身拱手相对而立。线刻人物上方横题一行文字曰：“西□□□际遇之志”。

四知堂即西室北壁镌有圣旨一则，虽部分文字漫漶，基本可读，内容如下：

“敕镇守陕西太监晏宏「近该众部议覆」所奏大勢夷虜入套「住牧今年六月间拥」众深入固原地方分「散抢掠尔等调□□」各将官分布兵马我「□□□」联络远近相「□□□」追剿斩获首「级共六千□百一十三颗」夺获□马夷器数多「我军全胜而还虜众」大挫边方底宁□见「规画督将领致□」大捷朕□嘉悦「尔等升赏荫录兹」降敕□厥以旌而劳「尔其钦承之故敕」嘉靖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圣旨下方石壁密密麻麻刻满了文字，较圣旨文字小，漫漶严重。

停云岩石室西南为地藏殿三间，坐北朝南，南临山谷。殿亦石砌，顶已毁，四面石壁尚存。殿南面中间有一门，东西各有一扇方形窗。门上石额阳刻“地藏殿”，落款阴刻“大明正德壬申”（1512年），均正书。

地藏殿南面和东面外墙石壁上满布文字，其中有年款题记四则，其余文字当是后面序文中提及的晏宏所得三册道统书中内容，由此亦可知停云岩石室内所刻文字亦为道统书中内容，线刻人物当是据晏宏得到“圣贤图像书一册”镌刻的古圣贤图像。

南墙东侧外石壁刻题记二则：

其一，南墙东窗东侧刻有序文一则，记述了建祠的缘起和兴建、竣工的时间，落款“羲皇之世”当是晏宏太监的号。序文部分文字漫漶，文中叙述晏宏得到“圣贤图像书一册”，“即出道统书三册，予拜受如至宝”，于是“鸠工于正德壬申之□，落成于□之秋”。

其二，在南墙东窗与门之间，刻“大清康熙四年二月吉日重修”题记一则，文字亦



晏公祠停云岩石室

漫漶。

东墙外石壁刻买地文书二则：

其一，“山场人蒋某买于晏清同晏暹供奉古□□”，落款为“正德八年二月二十□日”。

其二，“买与锦衣卫中所擎盖司百户晏清同晏暹供奉古圣庙为香火地”，“正德九年十月初四日”。



地藏殿前西侧，有一龟跌仆地，头残，石碑不知何处。龟跌西有一株古松，树干中部为空心，并有火烧痕迹。

沿地藏殿前的小路西行上山不远，见一古井，井已干枯，井口石砌，井内壁为青砖砌成。再西行约30米左右，有一处突出的巨岩，上锈线刻人物像一幅，与前面石室中的线刻人物图像风格类似，其旁有石刻题记一则“正阳门外小桥东，三条□□到此”。书法拙劣，当是近人游览此地时胡乱涂鸦之作。摩崖石刻往西不远处，还有一个雕刻精美的汉白玉石方座。

2、法海寺现状

从晏公祠下面的公路再南行百米左右，就到了矗立于万安山山脊之上的法海寺。晏公祠和法海寺之间原有山谷相隔，现在新建的公路将二处连接起来。

法海寺建于山脊之上，坐西朝东。从公路西侧的山坡上去向西，是一片长满了茂密的黄栌和其他灌木的平地。这里地势高敞，视野开阔，站在此处四面望去，山上山下的景致一览无余，诚可谓登临佳处，想必书中记载的观景亭应建于此处。平地西面有一座基本完整的大门，无门额，门前两尊汉白玉蹲狮，均仆地，门两边的石墙已部分坍塌。据记载，法海寺的山门在山下一里处，那么这座门便不能称作山门了。

法海寺内的建筑已基本不存，只残留

有石阶、殿基、柱础及部分石墙瓦砾。进大门的第一个院内，有夹杆石两座，石碑三通。南碑为“敕赐法海禅寺碑记”，清康熙五年(1666)三月一日立，龚鼎孳撰文，卫周祚正书，额题篆书，耿有德、耿重德刻。北碑为“敕赐万安山法海禅寺十方碑迹”，清康熙五年(1666)三月一日立，卫周祚正书，额题双钩篆书，慧枢行地立。二碑均螭首方座，座雕龙，碑身边框亦雕龙。

往里走，在一座宽阔的石阶前，立碑二通：南碑为“敬佛碑”，碑阳大字书“敬佛”二字，其上篆书“御书”，旁小字“为万安山法海慧枢和尚书”。清世祖福临正书，额双钩篆书“敕赐法海禅寺碑”，清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十六日立，碑阴刻“西天东土历代佛祖图”，额篆“永垂万古”。碑螭首方座，座雕龙。北碑为“法海寺告示碑”，清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立，碑阳汉满合璧，碑文正书，额题双钩篆书“敕谕”。碑阴刻四至，额篆“法海源流”，方首方座，碑首、座及碑身边框均雕龙。

再往里走，在一座建筑的遗址上，有青石石碑一通，仆地，碑文首题“天下一教教纲”，部分文字漫漶，无年款，读碑文，当是民国前后所刻。

再往里去，便是法海寺的后山了。后山上有摩崖石刻数处。在一巨岩上方，刻“弘教禅林”四个遒劲雄浑的大字，其左题“一庵书”，字体较小，无年款。“弘教禅林”题刻右下有一庵题诗一首：“春山梵刹青天半，楼阁峥嵘北斗齐。曲迳盘空环翠色，登临扫石记留题”。一庵题诗右稍偏上为四明徐暘题诗一首：“登山与临水，人在白云深。一曲南风畅，悠悠太古心。”四明徐暘书”。竖刻，正书。字径约2厘米。该巨岩左下方，题有“念佛”、“壁观”、“迴光台”。巨岩最下方，有一个石窝，其内岩壁上题“眠云窝”、“返照岩”。

从巨岩向北，在两处较小的岩石上，一刻“眠云岩”，一刻“大震超地禅师寿藏”。

从后山北面下来向东，又有一巨岩，上题“翠屏”，落款“震翁题”，震翁应是前面

“大震超地禅师寿藏”摩崖石刻中提及的大震超地禅师。“翠屏”题刻再向东不远处的岩壁上刻“片石孤云”四字,其右书“潜地拙书”,其左书“于万安山”。

从法海寺出来,门前有一条不过一米的窄窄的石板路,向东穿过茂密的黄栌树丛,再东,石板路被公路截断,越过公路而东,石板路延伸了一段,变为石子路,顺山势略向东北方向而下,通往晏公祠和法海寺之间的山谷谷底,在谷底与一条从西北而来的小路汇合,一直向东通往山下,现在路尽头为某部队所在地。据翟连学《北法海寺山门考》^①记载,某部队院内的石台,就是法海寺山门遗址。

从谷底的岔路口向西北行,应当是通往晏公祠的老路,不远处有一座残破不堪的石拱桥,过了石桥,便是新修公路陡峭的路基,过去的小路已无踪可觅。从此处攀登上公路,即是明代风格龟趺的发现地,往西即晏公祠下面的停车场所在地,该龟趺很可能为晏公祠旧物。

二、法海寺、晏公祠及弘教寺的相关史料记载与考辨

法海寺与弘教寺在历史上有前后继承关系,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晏公祠比

邻而居,明代的《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清代的《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及民国时期的《琉璃厂杂记》等都有相关记载,但其中不无错讹、混淆和相互矛盾之处。笔者经过数次实地调查,又翻阅相关史料,试图对有关史籍中错讹、混淆和相互矛盾的记载加以考辨,以期厘清事实,并勾勒出法海寺、晏公祠及弘教寺的历史轮廓。

1、晏公祠

考

晏公祠的历史是比较清楚的,从前面在晏公祠发现的石刻题记和买地文书可知,晏公祠是明太监晏宏得到“圣贤图像书一册”和“道统书三册”,于正德七年(1512年)二月买地,开始兴建,落成于“□之秋”。正德九年(1514年)十月初四日,又购置了香火地。由刻于停云岩西室壁上嘉靖六年(1527年)的圣旨可知,至嘉靖年间,晏宏还在经营。后来在清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又重修过。

关于晏公祠的名称,几则题记中没有提到晏公祠,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最早提到晏公祠的是明代的蒋一葵,在所著《长安客话》记载“弘教寺之旁有岩,俗称晏公祠”。^②晏公祠既是俗称,那么其本名是什么呢?在两则买地文书中一次提到“古□庙”,一次提到“古圣庙”,“古□庙”应该就是“古圣庙”,而晏宏建庙的目的在其序



法海寺“敬佛碑”

文中说是“可以宅群圣神也”，推知这里初名“古圣庙”，但却没有流传开来，至迟在万历年间，即《长安客话》成书的时候，晏公祠的俗称已流传开来。

晏公祠的建筑格局，《帝京景物略》的记载非常详尽，“祠，正德中晏长侍忠所立。过涧，石桥，过桥石门，曰道统门。石殿三楹像皆石。上像，三皇五帝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诸圣贤。右像，周程张朱诸大儒。壁五石龕，一龕标一经名，维以藏其经。殿外一石亭，亭壁列钟具、干戚、钱镞、弁裳之属，一如五经，以便治经者。左龙马，马毛旋，五十五数具，一如河图。右雒龟，龟甲四十五数具，一如雒书。东堂三楹，壁列忠臣龙逢以下，孝子曾、闵以下，右图而左书其行事，以告观者。凡石像所形勒，浑然茂朴，中国古初制也。非汉以后西域像法，务金色为好，务变相为幻也。堂后，累石为洞，洞壁标先儒格言及咏道诗，几理性之半，以待游者观感省发”。^④据前面实地调查知，涧已无水，石桥犹



法海寺“弘教禅林”石刻

存，道统门已无觅处。“石殿三楹”，指地藏殿，殿外一石亭，即现移至北京石刻博物馆保存的“道统香火殿”，也已不全。东堂三楹，现为瓦砾堆。“堂后，累石为洞”即停云岩。《帝京景物略》载晏公的名字为“忠”不知来源何处，《长安客话》只载“讯之乃武庙时中贵晏公造也”，笔者从停云岩西室壁上摩刻的圣旨上提及“敕镇守陕西太监晏宏”，推知晏公名“宏”。

2. 法海寺考

法海寺内现存的碑刻四通，一为清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十六日立顺治帝御笔题写的“敬佛碑”，一为清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立“法海寺告示碑”，一为清康

熙五年(1666)三月一日立龚鼎孳撰文的“敕赐法海禅寺碑记”，一为清康熙五年(1666)三月一日立“敕赐万安山法海禅寺十方碑迹”。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筑杂录》载：“这圆拱门洞是石砌的。东面门额上题着‘敕赐法海禅寺’，旁边陪着一行‘顺治十七年夏月吉日’的小字。”^④

从上述碑刻可知，法海寺的开山祖师为“赐紫沙门传临济正宗叁拾貳世嗣法报恩法海开山第壹代慧枢行地”。清世祖于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十六日为慧枢亲书“敬佛”二字，同年夏月吉日又御笔题写法海寺山门门额“敕赐法海禅寺”，同年五月，还下敕谕即法海寺告示碑保护法海寺。可见清世祖对法海寺和慧枢很重视。从清世

祖为法海寺赐额和下敕谕保护的情况看，法海寺应当建成于顺治十七年，其开始修建年代应稍早。法海寺寺名据《日下旧闻考》：“本朝顺治十七年修建，改今名”。^⑤又，成书于明崇

祯八年(1635)的《帝京景物略》记载此地为弘教寺，法海寺应是利用弘教寺旧址修建而成，顺治十七年改名法海寺。

《日下旧闻考》第1695页又载：“法海、法华二寺前后互相连属，相传为宏教寺遗址。本朝顺治十七年修建，改今名为法海寺，门上有小塔，门内为关帝殿。约半里为法华寺”。《日下旧闻考》有关法华寺的记述，经查阅其它文献和实地踏勘，与法海寺的情况几乎雷同，《日下旧闻考》提到的法华寺的四通碑就是前面提到的法海寺的四通碑，其中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立的《法海寺告示碑》碑阴记载法海寺四至“东至山门塔，南至龙泉岭，西至主山顶，北至香山

岭”，因此《日下旧闻考》提到的所谓法华寺其实就是法海寺，不知《日下旧闻考》关于法华寺的记载源于何处。

“大震超地禅师寿藏”摩崖石刻，无年款，在《法海寺告示碑》碑阴刻有“弟子超圣、超妙”，超地禅师很有可能是慧枢和尚的超字辈弟子。

3、弘教寺考

法海寺后山巨岩上一庵书写的“弘教禅林”摩崖石刻和摩崖诗刻可说是证明弘教寺存在的仅有的实物例证了。

在文献方面，一些明人的文集、诗集以及笔记等书中提供了有关弘教寺的简略记载。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第58页：“（门头）村多精蓝，西尽有弘教寺。寺有石桥鱼池，不及碧云寺；前有流泉亭，亦似碧云兰亭意，然俱就荒矣。”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267页中峰庵条载：“弘教寺宅山阳，门水阴。两涧右会而桥，桥边而门，门冠塔三尺，弘教寺门也”。

明余有丁（1527-1584）《文敏公文集》：“有宏教寺，寺在山脊，东上一阁宣庙曾驻蹕于此”。^⑥

明袁中道（1575-1630）《珂雪斋集》：“宏教寺有亭可眺，亦有乔松怪石，佛像清古，为山中第一。”^⑦

明宋彦《山行杂纪》：“香山南为门头村。村后为万安山，山门上建白塔为弘教禅林。入门为大神通塔院。寺前为平台，宽三四十丈，有亭据其阳。寺中殿宇亦高敞。”^⑧

明沈榜《宛署杂记》：“弘教寺赐经一藏，正统年颁”。并记载“以上各教谕俱与大隆善寺同”^⑨。

《日下旧闻考》中弘教寺均作“宏教寺”，应是避清高宗弘历讳而改。

从上面记述可知，弘教寺位于门头村西，山门上建有高三尺的塔，山涧上有石桥，寺建在山脊，寺前为平台，这些情况与前面有关法海寺的文献记载和实地踏勘的情况基本一致，由此也可推知法海寺的前

身为弘教寺。

从前面文献载“东上一阁”、“有亭可眺”、“有亭据其阳”等记述亦可知，弘教寺寺前的平台上有流泉亭，寺内有石桥鱼池。从宣德帝曾驻蹕于此和正统年间曾颁赐大藏经（即《永乐北藏》）的记载，可推知弘教寺在明代宣德正统时期较为兴盛，也是当时北京地区较为重要的寺庙。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永乐北藏》是以御赐的方式颁行的，并有《藏经护敕》。因此凡迎请《北藏》的寺院，需建藏经楼以珍藏之，同时立碑将《藏经护敕》垂示永久”^⑩。《宛署杂记》也提到弘教寺的《藏经护敕碑》与大隆善寺相同。可见，弘教寺当初应当立有《藏经护敕碑》，惜现已无觅处。

但至迟在《长安客话》成书时期即万历年间，弘教寺已荒废了。

明代著名诗人王稚登（1535-1612）有多首“弘教寺”的诗，“树里山门破，萧然无四邻。青松多结子，白社不逢人。已慨经千劫，何因问六尘。不留陶令醉，知是远公贫。”（《长安客话》，第58页）“先朝行殿作禅宫，黄屋青山本是空。闻道一人曾驻蹕，山僧不敢住当中。”“宣皇在日寺新成，万乘亲来寺里行。芳草也知无玉辇，秋风秋雨满阶生。”（见《日下旧闻考》，第1697页）。王稚登的诗透露了有关弘教寺修建情况的重要信息，“宣皇在日寺新成，万乘亲来寺里行”，可知弘教寺落成于宣德时期，并且宣德帝曾经驻蹕于此，与余有丁的记载吻合。“树里山门破，萧然无四邻”句，可知诗人登临时，寺已荒废了。

朱彝尊的《曝书亭集》（《日下旧闻考》，第1696页）载其西山宏教寺题壁：“都城西山宏教寺，正德间中贵晏忠所造，寺累石为门，曰道统门”。之后关于石殿、石亭、东堂的记载与《帝京景物略》的记载基本一致。又记：“按元史，中书省臣言：养给军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宏教寺，赐永业。今遗迹无考。观晏忠祠石像礼器制度浑朴，不类明时所凿。且元于儒释初无分别，疑寺即宣文宏教之遗址，晏忠特修饰之尔。”根据

前面的实地考察和对弘教寺、晏公祠和法海寺相关史料的考证,可知朱氏是把晏公祠和弘教寺弄混了。前面已述,晏宏建祠的缘起是“得圣贤图一册”和“道统书三册”,并有当时的买地文书为证,《长安客话》也记载“讯之乃武庙时中贵晏公造也”,由此可知晏公祠的建造者是晏宏毫无疑问,而非仅“特修饰之尔”。“观晏忠祠石像礼器制度浑朴,不类明时所凿”的说法也值得商榷,据“羲皇之世”的序文记载晏公祠石像是据得到的圣贤图像书所凿。但朱氏关于宏教寺为元世祖所建大宣文宏(《元史》作“弘”)教寺之说为我们提供了弘教寺建寺历史的一个观点。

4、一庵考

“弘教禅林”摩崖石刻的撰书者一庵是何许人也?该摩崖石刻虽没有年款,但书写的年代应当是在法海寺建成的清初之前,该地称为弘教寺的时期,那么一庵应为明人或主要生活在明代。“弘教禅林”摩崖石刻、一庵摩崖诗刻和四明徐暘摩崖诗刻位于巨石崖壁的上方,“弘教禅林”题刻右下方为一庵诗刻和四明徐暘诗刻,四明徐暘诗刻较一庵诗刻稍偏右上,“弘教禅林”四字字体很大,很醒目,并占据了该巨石崖壁的中心位置,二诗刻的字体远小于“弘教禅林”,需走近才能看到。从三者的布局来看,其摩刻年代似应相距不远,四明徐暘摩崖诗刻摩刻的时间不应早于“弘教禅林”。在一些传记资料和人名词典中没有查到四明徐暘的生平,国图藏《真武庙碑》拓片(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闰四月十三日立石,原址在朝阳区大屯村),其碑文为四明徐暘正书并篆额,四明指浙江绍兴的四明山,两位四明徐暘籍贯相同,名字相同,并都在北京活动,为同一人的可能性很大。那么由此可断定一庵题刻的年代在明正统前后,即明前期。

《东里文集》^①收录有其撰文的《僧录司右闾教一庵如法师塔铭》,明河编《补续高僧传》卷第四、第二十二也有关于一庵的记载。^②一庵(1352-1425)名一如,字一庵,号

退翁,浙江上虞人。精通《法华经》,姚广孝称“两浙一人”。永乐十二年被召校大藏经,奉命辑禅宗语录,后有辑法华科注等书,屡授僧录司右闾教,洪熙元年三月示寂于京师海印寺,年七十四。

一如是明初有名望的高僧,参与了编纂《永乐北藏》,在北京活动过相当长的时间,是有可能去过弘教寺并留下题刻的。“弘教禅林”的书法遒劲雄浑,与一如的高僧身份也相符,一如很可能是“弘教禅林”的书写者一庵。若果如此,“弘教禅林”的摩刻时间应在永乐十二年后至洪熙元年之间,那么也就是说弘教寺在这期间已经存在了,对照王稚登诗“宣皇在日寺新成”,永乐和宣德之间的洪熙年号只有一年,很可能弘教寺始建于永乐年间,而落成于宣德年间,抑或弘教寺的存在更早,如朱氏所说,为元世祖所建大宣文宏教寺,宣德年间又加以重修。

5、弘教寺和法海寺门塔考

值得一提的是弘教寺和法海寺都有门塔。

弘教寺:

明宋彦《山行杂纪》(《日下旧闻考》),第



《平郊建筑杂录》中收录的法海寺门塔照片

1696页)载:弘教寺“山门上建白塔为弘教禅林。”

《帝京景物略》第267页:“门冠塔三尺,弘教寺门也”。

《琉璃厂杂记》^①第146页:“寺旧为弘教禅林,山门上建白塔,在明已然,不知始何时。”

法海寺:

《日下旧闻考》第1695页:“前为法海寺,门上有小塔,门内为关帝殿”。

《琉璃厂杂记》第146页:“有门,白塔峙其上,额曰‘敕赐法海禅寺’,顺治十七年重建。后番书‘俺巴得摩乌室尼渴毕麻列红发咤’。塔砖筑,基七层。法像环刻,塔正面亦嵌佛。门洞州石皆绘彩佛菩萨像、梵宝、云气、海波诸状。其下左有青石,镌梵书所译汉字类咒语。右一石镌檀越张辅、沈荣等数十人名。”

梁思成、林徽因1932年11月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4期《平郊建筑杂录》一文的第二部分《法海寺门与原先的居庸关》^②,较为详细地记述法海寺的门塔:“这圆拱门洞是石砌的。东面门额上题着‘敕赐法海禅寺’,旁边陪着一行‘顺治十七年夏月吉日’的小字。西面额上题着三种文字,其中看得懂的中文是‘俺巴得摩乌室尼渴毕麻列红发咤’,其它两种或是满蒙各占一个。”该文对门塔也做了详细描绘,门塔石砌,为覆钵式塔,并附有两张照片。并指出其与原先的居庸关过街塔相类似,对研究居庸关过街塔的原状是重要的材料。

可惜法海寺门塔已毁,据翟连学《北法海寺山门考》,某部队院内的石台,就是法海寺山门遗址。

过街塔和门塔是从元代才开始出现的。由于元朝大兴喇嘛教,大建喇嘛塔,过街塔和门塔上的塔也大多为喇嘛塔即覆钵式塔。最为著名的是建于元代的居庸关过街塔即云台,现塔已毁,仅存高台。

弘教寺门塔据明宋彦撰《山行杂纪》载“山门上建白塔为弘教禅林”,白塔一般为

喇嘛塔,弘教寺门塔很可能为喇嘛塔。《帝京景物略》载“门冠塔三尺,弘教寺门也”。据《平郊建筑杂录》记载,“东面门额上题着‘敕赐法海禅寺’,旁边陪着一行‘顺治十七年夏月吉日’的小字。”从《平郊建筑杂录》一文登载照片看,法海寺门塔为覆钵式,其高度比下面的券门要高一些,肯定不止三尺。由此可推知法海寺门塔应建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法海寺门塔与弘教寺门塔又有何关系?《帝京景物略》也只是大略的记载,若其记载不准,法海寺门塔会不会是弘教寺门塔的遗存,或以弘教寺门塔原样改建或新建而成呢?

耐人寻味的是弘教寺和法海寺均为禅寺,为什么两寺门塔的样式却均为喇嘛塔呢?弘教寺门塔又建于何时呢?会不会是元世祖所建大宣文宏教寺的遗存呢?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①胡玉远主编:《燕都说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463页。

②(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58页。

③(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270页。

④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2页。

⑤(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695页。

⑥⑦⑧《日下旧闻考》,第1696页。

⑨(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第220页。

⑩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57页。

⑪(明)杨士奇:《东里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7月第1版

⑫《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⑬周肇祥撰:《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版。

⑭《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第22—24页。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

正阳门箭楼千斤闸

机械结构探秘

夏明明

正阳门箭楼千斤闸(图1),是北京乃至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大的千斤闸,主体结构完整。因千斤闸部分辅助结构件缺失,以前对正阳门箭楼千斤闸升降原理、机械结构的研究,尚付阙如。另一个原因是近现代以来正阳门箭楼千斤闸处于“休眠”状态,开启的千斤闸长期固定在城台中,其顶部闸槽被一特制的长形木箱封盖,后又连同“绞盘”基座,长久被压在一楼大厅的木质“舞台”之下,只有部分较高的千斤闸辅助结构外露。因工作关系,笔者近期多次到现场进行考察,凭借这些外露的辅助结构的遗迹、遗痕,反复进行考察、实测,对其原状和功能、使用原理、机械结构,进行初步

的探索,并有新的发现,抛砖引玉,以便及早地揭开谜团,发掘这一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

正阳门箭楼千斤闸始建于明朝初期,闸门为铁皮包实木,布满加固铁钉,闸门宽6米,高约6.5米,厚度9厘米,重约1990公斤。开闸时,闸门升至门洞以上城台内闸槽中;关闸时,闸门从闸槽中平稳落下,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

正阳门千斤闸当年主要是用于城市防御功能。正阳门俗称前门,对于前门大街上的这两座城楼建筑,很多人都曾听到过这样的解释:“挨着前门大街的那个楼子是前门,挨着毛主席纪念堂的城楼是正阳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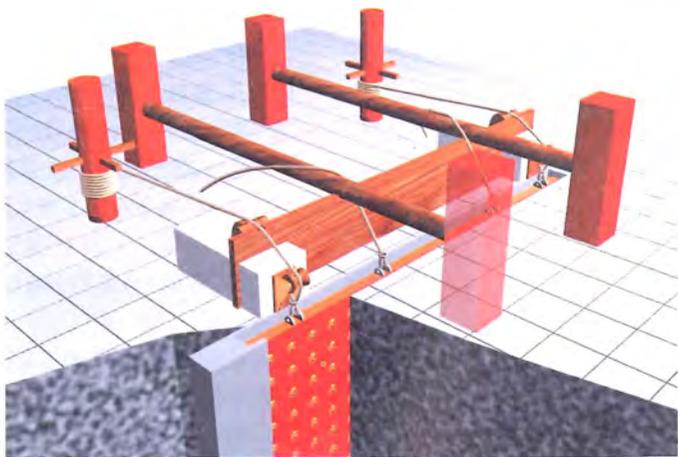


图4 箭楼千斤闸效果图



图1 箭楼门洞内顶部的闸槽

图2 支撑石



图3 支撑石前端立面中的滑轮固定槽

此言差矣！正阳门是一组防御建筑的总称，并不单单指某一座建筑。也就是说今天现存的这两座建筑，南面的是正阳门箭楼，北面的是正阳门城楼。“四门三桥五牌楼”解答了这个问题。过去的正阳门是一圈瓮城连接着箭楼、城楼，东、西闸楼“四门”。四个城门皆下有城台，上有门楼。箭楼门洞和瓮城左右的两个闸楼门洞（俗称洞子门）都装有“千斤闸”，是紧急情况时可以迅速落下的闸门。瓮城是为防止从城内出兵或从城外退兵时，在开启城门过程中敌人随之杀入的一组城防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108米，东西宽88.65米，瓮城墙体与城垣略同。出兵时，将城楼门关闭，打开箭楼门让士兵冲出瓮城；退兵时，士兵进入瓮城后关闭瓮城门，如有追兵随之冲入，即在瓮城内予以消灭，然后再开启城楼门，让士兵入城。瓮城里面是空场儿、庙宇和铺舍。箭楼上设有许多用来朝外射箭、打炮的窗口，使城门更加易守难攻。正阳门箭楼是内城九门中惟一设门洞的，它还是礼仪之门，平时不开，专供皇家车辆出入。其它人只能在解除宵禁后从城楼和瓮城两侧的闸楼进出。

正阳门箭楼千斤闸结构与运作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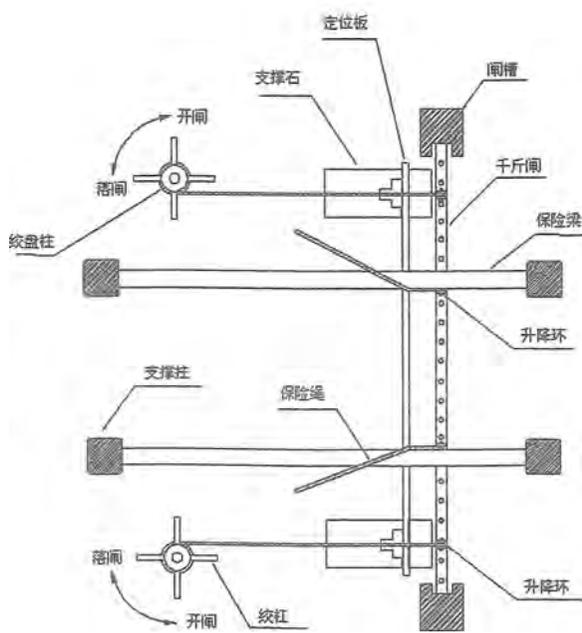


图5 箭楼千斤闸平面图



图6 箭楼一层南墙内的保险梁洞槽

理相当科学。箭楼门楼一层有一对显而易见的千斤闸主结构——绞盘柱，每根绞盘柱自一层地面向上1米处，有2个绞杠插孔，是“十”字绞杠轴心。闸槽顶部即位于2个绞盘正南2.18米处，闸槽长6.2米。2个绞盘正南方通向闸槽之间各有一块“支撑石”（图2），“支撑石”南北长1.29米、东西宽0.61米，高0.66米。这次发现“支撑石”前端（南侧立面，正好位于闸槽上方）有“滑轮固定槽”（图3），“支撑石”上面有“定位板固定槽”和“绞绳滑动控制结构固定槽”，“支撑石”一石三鸟，千斤闸主结构就是依托它完成了垂直升降力到水平绞力的转换。形象地说，一对千斤闸“主绳索”，从闸槽内升降至“支撑石”前端的滑轮，垂直绳索运动通过滑轮向正北方向转折成基本水平的绳索运动，又通过“支撑石”上的定位板“缺口”等装置与绞盘柱连接，人工转动绞盘发力，进行千斤闸的升降。

但这并不是千斤闸机关的全部，它还有一对辅助结构——2根保险梁和保险绳。保险梁位于2根绞盘柱内侧，南北长3.05米，东西间距2.6米，每根保险梁的直径是19厘米，南北方向跨在闸槽上方1米的位置上。原先处于使用状态下的闸门顶部应有2对（4个）升降连接环：1对主连接环用于绞盘绳索（间隔5米左右），1对辅助连接环用于连接2根保险绳，对应在2根保险梁垂直下方（间隔2.6米左右）。当绞盘工作时，为防止主绳索逆向滑动，可通过人力控制保险绳，避免闸门失控骤然降下；在闸门经常使用期，当提升闸门到位，保险绳可辅助主绳索进行双保险固定——将保险绳拴在保险梁上。这种结构也为更换绳索提供了必要条件。目前门洞闸槽内有顶闸木板，闸门连接环有钢筋穿过卡在顶部闸槽上，将闸门长久固定。

绞盘工作原理和保险绳工作原理如示意效果（图4）所示。

上述辅助结构现已不存，仅以“遗迹、

遗迹”为据（图5）。“支撑石”有一道东西方向的石缝，宽度5.5厘米，这是放置长约6米、高约1米、厚5厘米的“定位板”的卡槽。“定位板”对保险梁还起到了加固作用，2根保险梁与“定位板”相交处紧密结合。每个支撑石卡槽北侧长形石上有12厘米深石槽一个，紧接其北又有一个南北呈长形、深5厘米的浅石槽一个，它们都是安装“绞绳滑动控制结构”的槽位，该结构为木质，对主绳索起到了必要磨擦作用（以防快速滑动产生卡门），其顶部略高于定位板“缺口”底面，主绳索通过它与支撑石前端偏下方的滑轮连线，而“缺口”则控制主绳索不发生左右位移，避免从滑轮上滑脱。“保险梁”遗迹分别在“绞盘柱”内侧2根承重柱、以及门楼南侧的墙内方柱上呈现：这4根柱子南北对称各有一个直径19厘米、深度15厘米、距门楼一层地平面97厘米的“保险梁洞槽”（图6），是用于插装2根保险梁的。

与正阳门千斤闸的使用原理相接近的文物遗存并不多，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南京中华门千斤闸属于文物遗存的主要是“闸槽”；西安城垣南门瓮城千斤闸是根据考证复建，其原理和北京正阳门箭楼千斤闸近似；苏州盘门“水陆闸门”亦为复建，其“千斤闸”工作原理是在一对“绞关石”上安装一对辘轳，运用辘轳原理来完成其千斤闸的升降，有意思的是，千斤闸门的顶部除了一对固定辘轳绳索的连接环外，还有另一对连接环，可能由于辅助结构在复制过程中不完整，虽然现场看不出这对连接环的具体连接结构，但对其连接功能的方向是比较明了的：这应该也是起到保险功能的一对连接环。由此也可以佐证北京正阳门箭楼千斤闸门顶部有2对即4个连接环的历史状态。

千斤闸辅助结构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令人拍案叫绝的聪明才智。

（作者为正阳门管理处馆员）

北京河畔家园建筑工地一号墓出土之八卦青砖

李 华 邹晓天

2004年2月11日—2月17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在北京市海淀区农科院蔬菜研究中心河畔家园建筑工地,发掘清理了四座古代墓葬。据发掘清理确定:一号墓、二号墓、三号墓为清代墓葬;四号墓为辽金时代墓葬。八卦图象青砖即出于时代为清之一号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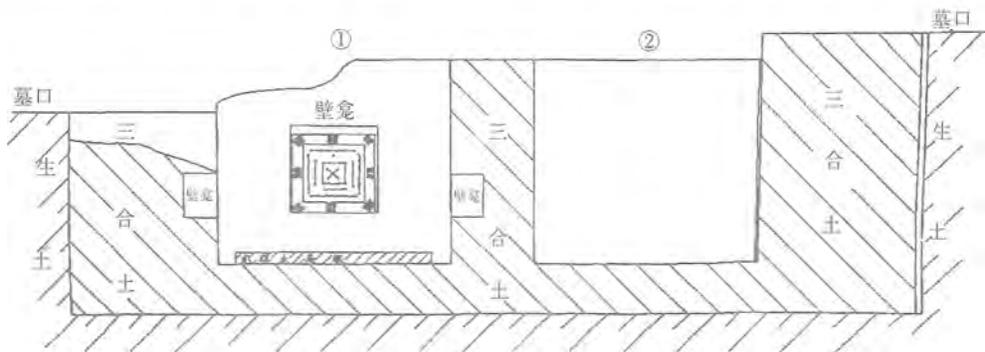
一号墓,由于是在施工方用机械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已破坏十分严重。经对残存部分发掘清理后发现,该墓为一座南北方向的土圹木椁墓。墓呈四方形,由三合土墓圹及东西两个墓室所构成,三合土墓圹又建于竖穴土圹之内,该墓为合葬墓。

八卦图青砖发现于一号墓东侧墓室之内。该墓室亦为南北走向,墓室南北长3.38米、东西宽1.44米、残深1.36米,墓室内棺槨已遭破坏,仅残存墓室北端四块木挡板及墓底南端八块木椁底板。在距墓室南壁0.63米之东西墓壁上,各有一相对应壁龛,龛长0.2米、高0.28米、深0.21米,下距墓

底0.31米,亦为三合土打筑,龛内空无一物。墓室南壁中部,下距墓底0.67米处,有一长0.57米、高0.57米、深0.1米壁龛,三合土打筑,内置一长0.54米、高0.52米、厚0.09米的八卦图象青砖(见图一)。

八卦图象青砖上并无文字,而只有以红色画出的八卦图样(见图二)。因此,我们认为此大青砖似乎不应属“墓志”类,而更像是一件与风水定位有关的实物。

据明人徐师曾所著《文体明辨·墓志铭》一书载,墓志始于汉之杜子夏。其书云:“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歿,则后人之为之铸器以铭……如《宋公叔鼎铭》。至汉杜子夏,使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按杜子夏名邳,西汉哀帝时人。为人有德望,性刚直。咸哀间外戚丁、傅两家专权。邳被举为方正,敢直言,未拜而卒(事见《汉书·杜邳传》),后人为之勒石埋铭。东汉以后,此风更盛,文字也自成一格,即所谓“墓志体”或“志铭体”,形成一定格



1-3 <B-B>
图一 墓室南剖面图

式，后人因之更相沿袭而成制度。其制多以正方两石，一刻志文，记述其人的世系、姓名、爵里、行事、寿年、卒葬日期及子孙概况等；一刻铭文，褒赞其人之德行功业。志文皆用散文，铭文多用韵语或直接用诗赋。后，两石文面相合，平埋于圻前三尺之地，以防日后陵谷变迁，得以据志辨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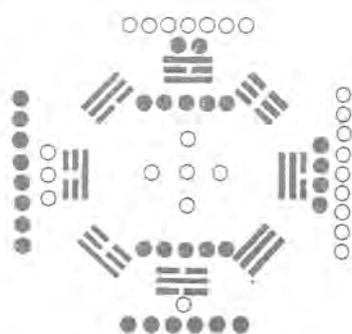
亦有较简单的，仅于墓前立石刻文，称为“墓碑”。如：汉赵嘉立石例。据汉赵歧《三辅决录》载，有赵嘉其人，年三十余岁，有重病，久治不愈，愤而告其家人曰：“……天不我与，复何言哉。聊立一圆石，树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民，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转录自清人张英等辑《渊鉴类函》卷一八三《冢墓》）。

由上可见，不论是立碑，或是埋志，其共同之处，都是刻以文字。而一号墓出土的这方大青砖，却未刻一字，而仅有图像。所以，它既不像立于墓前刻文记事的墓碑，亦不似双石相合，平埋墓内的墓志，孤石一方，究竟作何用途呢？

观此砖上图像，与清人李光地所著《启蒙附论》之“后天卦配河图之象图”完全相同。（见图三）则此砖图样当属“河图”、“洛书”之类，属“讖纬”学或“图讖”学范畴。

所谓“讖纬”，就是指一种预言吉凶得失、治乱兴废的文字与图记。相传“河图”、“洛书”是由龙马背图，灵龟负书，出于黄河、洛水，故属纬书之类。《隋书·经籍志》一，著录有纬书十三部，九十二卷。据《志》称，其书始于前汉，并云人谓为孔子立纬及讖，以遗后世，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

但因该书文辞浅俗，不类圣人旨意，疑



图三 后天卦配河图之象图



图二 出土的八卦青砖

为后人伪造，其书不行。至王莽以符命篡汉，光武帝刘秀以图讖兴汉，讖纬之书，遂盛行于世（参见《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光武帝纪》）。后因农民起义亦借讖纬为号召，故历代帝王皆禁毁之。至隋炀帝即位，更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自此之后无复再有其学。

但是，讖纬之书可以烧毁，而人们趋吉避凶的思想、占星问卜的积习却很难根除。所以到了元朝，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诏依儒学、医学之例，于诸路设“阴阳学”，置阴阳学官，并于府、州、县各设教授一人，命有司选堪粗通阴阳之人，送学训诲。凡天文、地理、星命、占卜、相宅、相墓诸术，悉需精通，称为“阴阳

生”（参见《元史·选举志·学校》和《明史·职官志》）。此种以阴阳生看风水，相宅相墓之制，一直相沿至近世，尤其是农村，盖房起坟，仍要请阴阳生占问，而这种会看风水之人，近世称为“阴阳先生”，至今仍然存在。只是近世阴阳先生用以测定方位的工具，已为近代科学仪器——罗盘。再早一些的人们定方位，仍是“文王后天八卦方位图”，即：乾西北；坎北方；艮东北；震东方；巽东南；离南方；坤西南；兑西方（参见朱熹《周易本义》）。但只见记载未见实物，终不明究竟。

一号墓出土的这一方八卦方砖，我们以为它可能就是当年为此墓测风水、定方位的实物。墓即依靠其定了吉位，便将其慎重地造龛供奉于墓室之前，以祈正位永远，并起到镇墓避邪之用。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还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基建考古室业务人员）

以清代诰封碑为例浅析诰封文的文体特征

王萍萍

诰封碑是采用碑刻的形式,刊刻皇帝颁赐爵位诏令的碑刻。目前北京地区见于文献资料的清代诰封碑刻300有余,成为我们研究其文体可供依据的原始材料。笔者因工作的关系,接触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的一些诰封碑,故尝试着以馆藏清代诰封碑为例,从文体学的角度对其做初步的探讨,期望对这种形式的碑刻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诰封碑文由诰封文转化而来,可看作是诰封文变换了载体后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研究诰封碑的文体也就是在研究诰封文的文体。对于文体,其构成因素是文体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从整体层面结构上看,文章的内容题材、结构安排、表现手法、语言形态等是表层结构,即文体的特征;文章所反映的时代、民族、阶级、场合、风格等是深层结构,即文体的形成因素。我们研究诰封文之文体也不例外,既要探讨其表层结构的文体特征,也要了解其深层结构的形成因素。本文从文体特征以及形成因素两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一、清代诰封文的文体特征

诰封文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程式化的内容段落

清代诰封文在内容上的三段落叙述方式:

1.叙述诰封目的。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说明国家封官授爵是承袭古圣明之制,是治理国家的方法;第二,表明给建功立勋的人封官授爵体现了帝王对臣属的优渥和恩宠。这一部分内容大多以骈文写成,有馆藏品为证,有以下几种叙述类型:(1)“褒忠表义,昭代之良规;崇德报功,圣王之令典,特颁恩命,以奖勤劳”;(2)“贻取孙谋,忠尽职世传之泽;绳其祖武,恩荣昭上逮之休,忠厚之道攸存,激劝之典斯在”;(3)“国家思创业之隆,当崇报功之典;人臣建辅运之绩,宜施锡爵之恩;此诚古今之通义”;(4)“枢府崇班,锁钥重河山之寄;中台出镇,封疆资节钺之勋;允嘱重臣,式甄劳绩”;“持纲秉宪,良臣奏节钺之勋;履顺思庄,淑女着珩璜之范;芳型无忝,茂奖

宜加”;(5)“国有爪牙之选,克宣力于旂常;朝颁纶綍之荣,必勤思于水木,用褒先世,以大追崇”,以上几种类型的叙述分别见于博博尔代、卓罗夫妇、额楚、勒保夫妇、海色夫妇等诰封碑中。

2.说明所赐爵位及受封原因。这一部分先说明被封人名讳和受封任职爵位,然后述及其为人品格,赞颂其能力才干。特别是对在征战中建立功勋的官员,则更多地叙述其英勇善战和所立的功劳,并由此而“晋膺显



农泰诰封碑

秩”。这种碑刻尤以清初为多,《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中所收刊刻清顺治十四年(1657)颁发的诰封文就有 18 件。馆藏品中有四件刊刻了顺治十四年的诰封文。以罗铎浑诰封碑为例,叙述了其在围锦州、攻山东等战役中的功绩,因此在崇德八年十月初四日赐名八图鲁,受封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再如索尼诰封碑,叙述了索尼自从跟随其父邵色榜什从哈答国投诚以来所立战功,详细叙说了他在围锦州、征北京等战役中保护顺治帝和肃亲王的英勇。并因此在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拜他喇布勒哈番超升为三等阿思哈哈番。

3. 历述受封人员官阶的升迁。一般从初任开始叙述,直至“今授”而止。如博博尔代诰封碑历数其七任职官;农泰诰封碑历数其六任职官;胡尔哈诰封碑也历数了其五任职官。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勒保夫妇诰封碑,竟历数其二十任。

综上所述诰封文在内容上基本以三个段落表述,体例可概括为:

1. 表述皇帝推恩封官的目的,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句式起始。
2. 点明受封人新封官阶及名讳,歌颂其功德,叙述其受封依据。
3. 依次累列受封人各次受封官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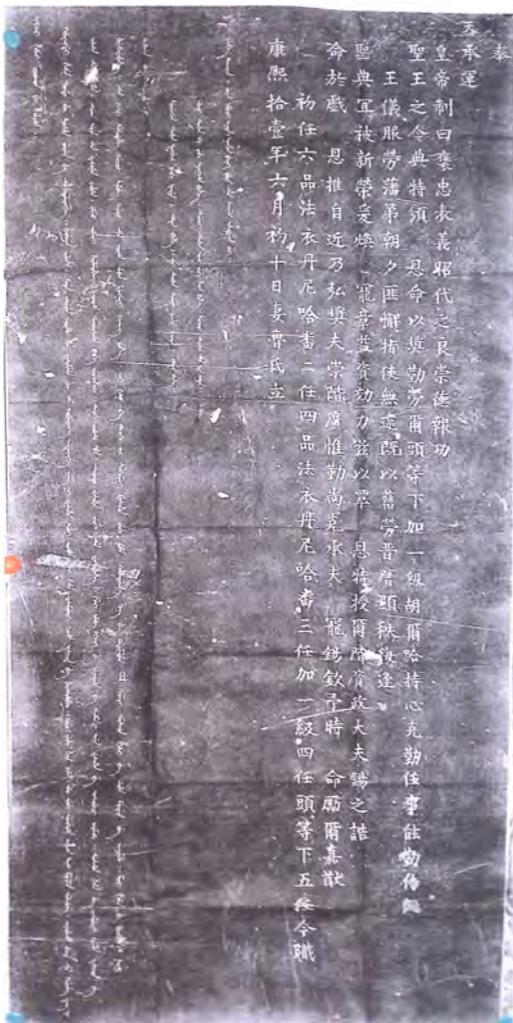
按照这一体例,诰封文文种的撰写,在内容和段落上形成了程式化和固定化的特征。

(二) 固定化的格式

1. 固定化的段落句数。顺治十年(1653)对诰封文全文所用文辞,甚至将文中所表达的三个部分所用句数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可以下表列出: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严格的缮写规定,

	起始句数	中间句数	结语句数
一品官诰命文	六	十四	六
二品官诰命文	六	十二	六
三品官诰命文	六	十	六
四、五品官诰命文	四	八	四
六、七品官诰命文	四	六	四
八、九品官诰命文	二	四	二



胡尔哈诰封碑拓片

使诰封碑文在叙述文辞和段落句数上出现了雷同。像博博尔代碑、胡尔哈碑、农泰碑的起始为六句,中间事实十四句,结语六句。对照上表,所赐诰封文皆为一品官诰命文。而穆哈达夫妇诰封碑则有所不同,碑文的起始四句,中间事实六句,结语四句,所授为六、七品官诰命文。

2. 固定化的骈散相间用文。在整篇诰封碑文中,骈文与散文使用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形成了骈文(表皇帝推恩封官的目的)——散文(点明受封人名讳及新封官阶)——骈文(歌颂受封人功德)——散文(叙述受封依据)——散文(累述受封次数及官阶)的相对固定模式。这种模式读起来

韵律起伏,雅俗相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诰封文的美感。

3.固定化的“抬头”书写。古文的书写格式是自右至左、自上而下的竖行排列,还要遵循“尊亲”的道德规范,所以在文字缮写中凡涉及尊贵、尊长等字样时,都要按一定格式,提格或提行书写,也就是断行,不得紧接上文连书,而应抬写,以示别异,这种格式称之为抬头。在皇帝颁发的制诏类下行文中这种格式更为突出,在诰封文中逾格一字(出格、三抬)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首题“奉天承运”中的“天”字,因为要逾格抬写,所以“奉”只一个字就要独占一行,后面的“天”字要断行,另起一行并逾出一格书写,表达的是对“上天”的尊崇,是“君权神授”思想的体现。这种逾格书写体现在诰封文中遇有“太祖”、“上帝”、“圣母”等字都是逾格抬写。此外在提到皇帝庙号,如“太祖”、“太宗”、“世祖”等也都要逾格一字。上二格的有“皇帝”、“圣王”、“圣典”等字。

(三)套式化的用语

诰封文因为在内容和格式上的规范化,也就导致了在用语上出现了套式化的现象,表现在三个方面:

1.起始句的用语。因是皇帝颁赏授爵,所以诰封文皆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起始,意为尊奉上天的命令,承受兴盛的时运。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更正殿名》:“按太祖‘奉天’二字,实千古独见。……故祖训中云:皇帝所执大圭上镂‘奉天法祖’四字;……以至臣下诰敕命中,必首云‘奉天承运皇帝’”,^①这说明了“奉天承运”作为帝王颁布“诰”、“敕”的专用套语始于明太祖初年,此后相沿为帝王诰敕命中的套语。清朝承接了明代诰封制度,反映在诰封文中也一并继承下来,这种现象在清代凡由皇帝御批的下发公文中也存在。因此清代诰封碑中的首题句几乎均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套语。

2.叙述诰封目的用语。馆藏中有几例是完全相同的套式化用语,举以下二例说明:



卓罗夫妇诰封碑拓片(残)

(1)“朕惟尚德崇功,国家之大典;输忠尽职,臣子之常经。古圣帝明王,戡乱以武;致治以文。朕钦承往制,甄进贤能,特设文武勋阶,以彰激劝。受兹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抚众。智以察微,防奸御侮,机无暇时。能此则荣及前人,福延后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罗铎浑、索尼、胡理布)。

(2)“褒忠表义,昭代之良规,崇德报功,圣王之令典,特颁恩命,以奖勤劳。”(博博尔代、穆哈达、胡尔哈、农泰)。

3.封赠官阶的用语。根据馆藏诰封碑总结出以下几种类型。

(1) xxx(姓氏)尔原系xxx(原任官阶),xxx(受封赠原因),故赐名xxx(赐名名称),授为xxx(新官阶)。(罗铎浑、胡理布、索尼)。

(2)“尔xxx(原任官阶)xxx(姓氏),xxx(受封赠原因),兹以覃恩,特授尔阶xxx(新授官阶名称),赐之诰命。于戏!恩推自近,乃弘奖夫崇阶,业广惟勤,尚克承夫宠赐。钦予时命,励尔嘉猷。”(博博尔代、胡尔哈、农泰、勒保)。

额楚诰封碑与上述形式相似,略有变化:“尔xxx(官阶名称)xxx(姓氏),xxx(人



额楚诰封碑拓片

品才能的赞语),欣兹庆典,以示褒嘉:尔先xxx(受封原因)登进授为xxx(原受封官阶),又累授为xxx(官阶),又因xxx(受封原因)之故,由xxx(官阶)升为xxx(官阶),今特授尔阶xxx(新官阶)。弘奖忠贞,茂勋树德。

(3) 尔(xxx),xxx(受封原因),兹以覃恩,特授尔阶xxx(官阶名称),赐之诰命。钦予时命,励尔嘉猷。(穆哈达)

(四) 满汉文字的同用

清代诰封碑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在

文字使用上几乎都用满汉合璧。清代人关后规定,满文与汉文同为国家法定的使用文字。在碑刻中满文由左向右书写,汉文由右向左书写,两种文字并列书写,不分尊卑、主从,所以称为满汉合璧。在清代的碑刻中,大多是满汉合璧的文字形式,一般左为满文,右为汉文,内容是一样的,没有分别。这种情况到咸丰以后才有所改变,由于同治、光绪、慈禧都不懂满文,在行文中逐渐改为使用汉文。满汉文合璧现象说明了清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后,有意接受汉化,但又不会轻易放弃满族文化的心理,诰封碑文的满汉合璧正是民族文化交融变化过程的例证。

除此之外,从碑的形制上,虽说不属文体范畴,但与文体在等级制度上则是相通的。按照清代礼制,碑刻在形制尺寸、纹饰样式上的差别是以碑文内容来决定的。螭首龟趺为一品以上官阶所用,馆藏品中巴尔达奇、孔有德、博博尔代、杜尔户贝勒、鄂齐尔、阿克善、索尼、哈兰图、胡理布、卓罗夫妇、额楚、阿淑、农泰、杨廷璋、勒保夫妇等碑就是螭首龟趺座,与其所授品阶是相符的。麒麟首为二品官阶所用,四至七品圆首方趺。罗铎浑碑虽残失碑座,但其碑首所雕麒麟正是二品官阶所用。而穆哈达夫妇诰封碑为圆首雕麒麟、龟趺,对照其诰封文用语应为六至七品官阶,却使用了二品官阶的碑石形制,有可能是越制所为。碑的形制纹饰反映了清代诰封制度等级的严格,在客观上也为辨识碑主品级提供了便利。

对诰封文文体形式特征进行的研究,是为了进一步追究这种文体的形成究竟受到了哪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对诰封文文体的形成因素作以下分析。

二、清代诰封文文体的形成因素

(一) 文种性质的影响

诰封文作为一种实用性公文,是皇帝专门用于封官晋爵的一种特殊公文,它始

终代表的是“王命”。在确定了这一性质后,被称为“诰命”和“敕命”的公文在文体形式上也就有了与其他任何文种不同的特殊的特征,决定了在用语、称谓、格式、制作、载体等诸方面,无不打上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思想的烙印。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在用语上,使用了“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覃恩特授”、“特颁恩命”、“恩推自近”、“赐之诰命”、“钦予时命,励尔嘉猷”、“世袭罔替”、“赠”等词汇,并几乎形成了诰封文中必用或专用用词。

2、在称谓上,因为行文的主体是皇帝,所以是“王命”、是“圣旨”。行文主体的严格限定,在其称谓上也就有了特定的名称使用。因此在诰封碑文中,皇帝自称使用“朕”、对皇太后称“圣母”、先王称“圣王”;而对下则称“臣子”、“尔”等极富皇权思想的称语。

3、在格式上,公文文种的性质决定了其外在“形式上的程式性和规范性,……一篇完整的公文结构及每个部分在载体上所处的位置有一定之规。不具备一定的程式,内容再好,也不成其为公文”^②。也就是说公文文种形式的特点就在其程式性和规范性上,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程式”或“特定的格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诰封文体具有了特殊的程式化的内容段落、固定化的段落句数格式、固定化的骈散相间用文、套式化的用语等程式性现象的出现。

4、在抬头书写上,清代公文的抬头制度比起前代的规定更为明确和严格,不但明确规定哪些字抬头,而且规定抬写几格,根据抬头的位置,可分为一抬(上一格)、二抬(上二格)、三抬(出格)和平抬(与文平齐)。如“本内称‘朝’,称‘国’,称‘宫殿’者,上一格;称

‘皇帝’,称‘上谕’,称‘旨’,称‘御’者,上二格;称‘天地’,‘朝庙’,‘山陵’,‘庙号’,‘列圣谕旨’者,逾格一字(即出格)。”^③诰封文中固定化的“抬头”书写格式正是这种规定的具体体现。

5、在制作载体上,清代对诰敕文样式的制作有严格规定;诰敕文要用专制的“比较贵重的丝织物制成,为卷轴格式,分为苍、青、黄、赤、黑五种颜色。其案头和轴头也严格按等级区分。一品云鹤锦,妇人云鸾锦,俱玉轴;二品狮子,夫人鸿(鹩),俱犀轴;三品、四品瑞荷,淑人、恭人芙蓉,俱抹金轴;五品瑞草,宜人四季花,俱角轴;六品、七品,安人、儒人,俱葵花,乌木轴。具有升降龙盘绕”^④。我们现在眼见各品级的诰封原文的机会不多,但诰封碑文是转换了载体后,诰封文的再现形式,在其形制纹饰的雕刻制作中也同样反映着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清史稿·志六十八·礼十二》对品官勒碑有严格的规定:“公、侯、伯螭首高三丈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麒麟首,三品天禄辟邪首。四至七品圆首方趺,首视公、侯、伯处递杀二尺至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杀二寸至二尺

四寸止”^⑤。正是这些规定对诰封碑的形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碑之形制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文体,但作为文体的载体,与文体之间的相互吻合,也可看作是碑刻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碑制的形制我们完全可以窥见清代对于官品等级的森严。

(二)封赠制度的影响

封赠是封建王朝推恩王臣官员,把爵位、品阶授予本人、妻室、父母的制度。存者为封,死者为赠。清初的封阶名称屡



博博尔代诰封碑

有变迁,到乾隆时分文阶、武阶,基本成为定制。清代诰封碑文的使用是为封赠制度的推行而服务的,文体的形成必然受到其制度的影响,表现在:

1.品级设置层次多,清时对京内外文官、武官的实授品级设置,分为九级,每级又分“正”、“从”合为十八级。散官品阶比照实授也为十八级,两者合计的品级设置共为三十六级。在诰封文的行文中根据所授官阶品级高低的不同,对所用用语与句数做了严格规定,是形成诰封碑文体固定化的段落句数格式的重要依据。

2.对现任官实行考核制度,《清会典事例·吏部·封赠》记:“封赠品秩,顺治初年定:覃恩及三年考满,例给封赠。”^⑥制度中所说“三年考满”,即每三年对现任官员考核一次,考核合格后就可按规定给以封赠。按这种定制,再加上清代庞大的官僚机构,每年会不断有官员得到晋升封赠。

3.覃恩封赠是指皇帝广施恩泽于王公、大臣,按古圣王之制凡遇国家庆典往往诏敕全国,颁布圣恩,按制进行封爵赐官。《清史编年·第一卷》载:“顺治八年十二月:顺治帝福临亲政,御太和殿,诸王群臣上表行庆贺礼。本日颁诏大赦。……诏内‘合行恩赦事宜’凡十六款,主要有:恩封王公、封赠官员”^⑦等款。又如“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顺治帝尊其生母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福临即位时尊为皇太后,至是加尊号,……。十一日以上尊号礼成,颁‘恩诏’于全国”^⑧。在罗铎铎诰封碑中,就载有“太祖武皇帝功德配祀上帝,礼成,念诸旧臣世效劳绩,故由三等阿达哈哈番升为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袭罔替。顺治七年三月初六日,天下大定,仿古圣王之制,上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礼成,由二等阿达哈哈番升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大婚礼成,亦仿古制,加上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尊号礼成,由一等阿达哈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世袭罔替。”索尼诰封碑文也对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顺治帝尊其生母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礼成后所授升迁进行了记述:“由

二等京奇尼哈番超升为三等伯,世袭罔替。大婚礼成,亦仿古制,加上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尊号礼成,以尔忠义之臣,由三等伯超升为一等伯世袭罔替。”又胡理布诰封碑也载“太祖皇帝配祀,上帝礼成升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上圣母皇太后尊号礼成,加一拖沙喇哈番。大婚礼成,加上圣母尊号礼成,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袭罔替。”以上三例是覃恩封赠制在诰封文中的体现。

4.封赠制度除对受封官吏本人封赠外,还推封其家室。“顺治五年定,一品封赠三代”,^⑨即一品高官可追赠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连同妻室就共四代了。海色夫妇诰封碑就是一例证。海色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班第之曾祖,班第因在平定准噶尔时,“得上嘉许,着赏给世袭子爵,后在平定伊犁中因内叛,陷于贼中……力不支,遂各自尽”^⑩,死后按诸封赠制度其子巴禄袭诚勇公爵,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均得追赠共三代。清会典还记:“二品、三品封赠两代,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八品、九品封本身而止”。^⑪对被封赠之夫人按夫或子孙之品级所获称号也做了详细规定,即“正从一品曾祖母、祖母、母妻,各封赠一品夫人。正从二品祖母、母、妻各封赠夫人。正从三品祖母、母、妻各封赠淑人。正从四品母、妻各封赠恭人。正从五品母、妻各封赠宜人。正从六品母、妻各封赠安人。正从七品母、妻各封赠恭孺人。正从八品母封八品孺人。正从九品母封九品孺人”。^⑫穆哈达夫妇诰封碑中记:“尔穆哈达嫡妻王秦氏,……兹以覃恩,赠尔焉淑人。”说明穆哈达受封为通议大夫,其妻封为“淑人”是按照三品官的诰封制度执行的。

5.封赠制度中对于有功官员或因公殉难官员的子弟还可以“荫袭”得官,甚至“世袭罔替”。所谓“世袭罔替”是指爵位之承袭,不再按照代数的限制,永远承袭下去。在诰封文中,常有所授官阶为“世袭罔替”者。如:索尼诰封碑文载“所得一等伯,外授为一等公,世袭罔替”。胡理布诰封碑记:

“升为三等阿达哈番世袭罔替”。

6.清代在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朝也曾因经济等原因实行捐官制度,更使官员机构臃肿庞大,对捐官人员也要照例颁发诰封文。这也不能不说是造成前面所述诰封文形成固定格式样本,照样抄填的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有清以来,涉及受封赠人员的范围不断扩大,比起以前的任何一代都更为广泛,而且也更为频繁。这种情况必然会对诰封文文体造成影响,直接反映在诰封文的文体上就是格式化、套式化的用语。因此在康熙十年(1671)时,始设了诰敕房,专司校勘和收发诰敕。凡汉票签处撰拟的诰敕,由诰敕房审核,缮定正本,按定式刊刻存储,凡用时交中书科填写,经诰敕房校阅后,用宝颁发。使诰封文真正成为了固定化、格式化的文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诰封文在诰封目的用语、封赠官阶用语等方面形成了千篇一律,没有变化的样式。

(三)民族时代的影响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诰封文是使用满汉两种语言文字刊刻,是清代碑刻的重要特征,反映了历史时代的特殊性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接纳的需求。满汉文字合书是满族统治者一方面接受汉化,融合民族差异,维护其统治地位所采取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不愿放弃其少数民族自尊、特权的心理。所以在我们所见之诰封碑文中几乎都用满汉两种文字合璧,在诰封碑中以满汉两种文字刊刻,是清代碑刻有别于其他时代碑刻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也使清代诰封碑文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民族的烙印。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公文文种性质、清代诰封制度、民族时代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诰封文在文体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

和特点,在整体上表现出了形式主义的呆板格式、陈词滥调的浮言套语、冗长无实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尊君抑臣的文体特征。

通过对清代诰封文文体特征所做的梳理,对这种文体特征的形成因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清代诰封文文体特征的研究过程涉及到文体学、石刻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由此也突显了清代诰封碑在文体特征上的特点。这种突出的特点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相联系,因此而成为我们研究其意义的所在。尽管我们今天已很少接触到这种文体的载体,但散存于田野和收藏于博物馆的诰封碑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对于诰封碑碑文的讨论研究,促使我们在了解清代诰封制度历史的同时,引申为对清代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研究的关注,这无疑是因为文体的研究而带来的更为广泛的收获,也因此而证明了文体学的研究有着广阔的领域。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2月第一版,46页。

②李昌远、王焕运主编:《中国历代公文通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绪论”,8页。

③丁晓昌:《古代公文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511页。

④刘雨樵:《公文起源与演变》,档案出版社,1988年,38页。

⑤《清史稿·志六十八·礼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一版,2723页。

⑥⑨⑩⑫《清会典事例·吏部·封赠》,中华书局,1991年4月第一版,831页。

⑦史松、林铁钧:《清史编年·第一卷·顺治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78页。

⑧《清史稿》卷二一四,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一版。

⑩《清代七百名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年6月第一版,824页。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员)

吉祥寓意的清代玉佩饰

宋彦丽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崇玉、尚玉闻名的民族，中国也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回顾中国历史，精美独特的玉器几乎伴随着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每个阶段，这在世界诸民族的发展史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早在中华文明萌芽之初，玉器就被赋予了极其神秘的

色彩，人们将其作为祭神、事神、通神的礼器，成为祭祀天地神灵的“神物”和宗教神权的象征。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玉器除了作为礼器之外，还被上层统治阶级用作陪

葬、装饰、仪仗等，成为权力、财富及社会地位的标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西周以来“比德于玉”的思想，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比附于玉器。一时间“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学说应运而生，玉器也成为有德君子的化身，玉德观念广为流行，佩玉之风大行其道，玉佩饰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发达的阶段。随着时代发展，玉器的用途越来越广，实用性越来越强，一度被理学家道德化的玉器，逐渐开始走入现实社会，成为上层社会以及文人雅士佩带、观赏、把玩的艺术品。长期以

来，儒家思想赋予玉的许多美德，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并深深地融入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

清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的高潮时期，随着新疆和田玉的大量开采和输入，琢玉行业空前发达，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

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对玉器的需求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当时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如意图案，成为玉器特别是玉佩饰的主要装饰题材。

吉祥寓意图

案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美术形式，它除了具有传统图案的装饰功能之外，又加入了浓重的人文色彩，画面中寓含着各种祈祥祝福的内涵。传统吉祥图案的寓意主要是借用象征、转喻、谐音等比附的手法，构成具有某种吉利意味的装饰纹样，它完美地将吉祥语和图案结合并统一起来，代表着传统的民风民俗。例如用鹤、鹿、松、桃、灵芝等象征长寿，用牡丹象征富贵，“鱼”与“余”谐音，寓意“有余”，“蝠”与“福”谐音，寓意“有福”等。

早在宋元时期，我国的瓷器、玉器等工艺美术作品上就开始采用吉祥如意图案



青玉“福寿三多”佩(正)



青玉“福寿三多”佩(背)



青玉“福寿双全”佩

作为装饰，经过不断地演进发展，于明清时期逐渐勃兴。特别是入清之后，各类工艺品上的装饰纹样几乎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图案所寓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画面的组合也越来越复杂。清代玉佩造型丰富，装饰题材广泛，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象征长寿、富贵、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图案。

1、青玉“福寿三多”佩 长7.3、宽5.6、厚0.7厘米。佩饰为椭圆形，中心呈圆饼状，一面上方雕刻一只蝙蝠，下方是一枚寿桃，另一面刻“福寿三多”四个字，外廓采用镂雕技法雕刻枝蔓茂盛的缠



白玉“福在眼前”佩

枝葫芦。蝙蝠的“蝠”与“福”谐音，因此古人将其视为代表好运与幸福的吉祥物，桃子代表长寿，“葫芦”与“福禄”谐音，葫芦藤蔓绵延，结果累累，籽粒繁多，人们以其象征子孙万代、多子多福。这三种吉祥物组合在一起就寓意“福寿三多”。此外，在中国传统吉祥寓意图案中还常常用佛手、桃和石榴组合成“福寿三多”，以“佛手”寓多福，以“桃子”寓多寿，以“石榴”寓多子孙，亦称“三多图”，清代最为流行。

2、青玉“福寿双全”佩 长5、宽3.7、厚0.6厘米。佩饰呈长方形，上方是



青玉“长宜子孙”佩(正)



青玉“长宜子孙”佩(背)



白玉“传榴百子”佩(正)

一只蝙蝠，蝙蝠展开双翼紧紧抱着两枚寿桃，寿桃下面是双钱。在这一组吉祥图案中，蝙蝠代表“福”，桃子代表“寿”，双钱与“双全”谐音，合起来就是“福寿双全”。我国古代双数还具有“多”的含义，因此，双桃和双钱象征着“多寿”和“多财”。除了“福寿双全”外，这件玉佩巧妙的图案组合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蝙蝠怀抱寿桃可以寓意“福寿满怀”；寿桃下面的双钱寓意财源不断；蝙蝠与铜钱组合还寓意“福在眼前”。

3、白玉“福在眼前”佩 长5.8、宽4.1、厚0.6厘米。佩饰呈椭圆形，中心雕



白玉“传榴百子”佩(背)

琢成一枚汉代五铢钱，外圆内方，刻有“五铢”二字。五铢钱两端各有一只蝙蝠，双翼展开，抱住钱币。“五铢”是汉代通行的货币，是财富的象征，“钱”又与“前”谐音，因此蝙蝠怀抱铜钱寓意“福在眼前”。此外，两只蝙蝠还表示能得到双倍的好运气。

4、青玉“长宜子孙”佩 长5.9、宽4.2、厚0.5厘米。佩饰中心部分为圆饼形，一面雕刻葫芦图案，另一面刻“长宜子孙”四字。上下各雕两条夔龙。葫芦多子，枝蔓茂盛，“蔓”与“万”、“蔓带”与“万代”谐音，因此常常出现在寓意家



白玉“年年有余”佩



青玉“吉庆有余”佩



白玉“堆金积玉”转心佩(正)



白玉“堆金积玉”转心佩(背)

族绵延、万代兴旺的吉祥寓意图案中。在玉器上雕刻吉语文字，汉代已有先例，东汉出土的刚卯、玉璧等佩饰以及一些陈设类玉雕艺术品上经常出现吉语文字，流行的吉语有“长宜子孙”、“长乐”、“延寿万年”等。汉代铜镜上也常铸有“家势富昌”、“宜子孙”、“大富贵”、“大吉祥”等祝福吉语。

5、白玉“传榴百子”佩 长6.8、宽4.7、厚0.9厘米。佩饰呈长方形，额首镂空雕对鸟。正面雕刻折枝石榴和蝉，成熟的石榴露出饱满的石榴子。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在民间被视为家族兴旺、儿孙满堂的象征。将其用作装饰，取其多子多福、绵延不断的吉祥寓意。石榴的“榴”与“留”谐音，故称“传榴百子”，也叫“榴开百子”。

6、白玉“年年有余”佩 长7.4、宽4.9、厚1.3厘米。佩饰呈椭圆形，采用多层镂雕的技法，雕出两条肥胖圆润的鲇鱼。鲇鱼首尾相连，其中一条口衔灵芝。鱼的形象作装饰纹样，早已见于原始社会的彩陶盆上。商周时期的玉佩、青铜器上亦多有鱼形。鱼与“余”谐音，隐喻富裕、有余。“鲇”与“年”谐音，两条鲇鱼组成的图案就称作“年年有余”。灵芝的形状与“如意”相似，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与鲇鱼组合还有“年年如意”的含

义。

7、青玉“吉庆有余”佩 长6、宽5、厚1厘米。佩饰采用镂雕技法，上方为磬，下方是两尾体型肥硕的鱼，鱼与磬之间用勾卷的变形云纹相连。“磬”与“庆”、“鱼”与“余”谐音，故称“吉庆有余”。这种图案的完整组合一般还应当有戟，“戟”与“吉”谐音，古人认为戟能避邪，磬为喜庆奏器之一，鱼是富余的象征，组合起来就是“吉庆有余”，寓意生活幸福、美满富裕。

8、白玉“堆金积玉”转心佩 长5.6、宽5.3、厚0.8厘米。佩饰总体呈圆形，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外部为环形，阴刻三角形纹饰，额首雕刻云纹。内部呈圆饼形，采用镂雕和阴刻技法雕出童子推车的图案，车上满载着象征财富的钱币和财宝，两面的中部刻有“堆金”、“积玉”字样。内外两部分由转轴连接，可以来回转动，故又称“转心佩”。“堆金积玉”出自唐代李贺《昌谷集·嘲少年》诗：“堆金积玉夸豪毅”，寓意金钱满载，金玉多的可以堆积起来，形容占有的财富极多。

9、青玉“欢天喜地”佩 长7.6、宽4.1、厚0.6厘米。佩饰呈长方形，中心部分为圆饼状，一面雕刻花卉，另一面刻“欢天喜地”四字。佩饰上方采用镂雕技法雕刻一只身体盘曲的獾，下方是一只展



青玉“欢天喜地”佩(正)



青玉“欢天喜地”佩(背)

翅回首的喜鹊。獾为寒带动物，体形大小如狐狸，头尖、吻长，体毛呈灰色。因为“獾”与欢乐的“欢”字谐音，故玉雕佩件中常会有獾的形象出现。喜鹊在民间普遍认为认为是能报喜讯的吉祥鸟，因此也经常出现在吉祥寓意图案中，如两只鹊儿面对面叫“喜相逢”；双鹊中加一枚古钱叫“喜在眼前”；喜鹊站立在梅枝上叫“喜上眉梢”。这件玉佩上面是獾，下面是喜鹊，寓意“欢天喜地”。

10、碧玉“鸣凤在竹”佩 长7、宽3.9、厚1.1厘米。佩饰呈竹节形，正面采用浮雕手法雕刻一只凤凰，凤凰作回首状，单足站立在一块玲珑剔透的太湖石上。佩饰右侧采用镂雕技法雕刻一株翠竹，翠竹拔地而起，茂盛的竹叶覆盖在佩饰顶端。竹子四季常青，充满生机和活力，生命力顽强，所谓“未出土时已有



碧玉“鸣凤在竹”佩

节，待到凌云更虚心。”古人把竹子的生物特征总结并升华成为一种做人的美德，把竹之节、空心和做人的气节、虚心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竹子“宁折不弯”的豪气

和“中通外直”的度量，成为坚贞和高洁的象征。据《庄子》一书记载：“凤凰栖梧桐，饮礼泉，食竹实。”栽竹引凤，竹茂盛则凤凰至，凤凰至则吉祥来，哪里有翠竹，哪里就会有凤凰。“鸣凤在竹”之典，当出于此。

玉不琢不成器，清代玉佩饰正应了琢玉行业的一句名言：“玉必有工，工必有意，意必吉祥。”聪明智慧的琢玉艺人用各种寓含吉祥的具像物品，将人们追求健康长寿、幸福吉祥的美好愿望完美地表现出来，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含蓄、细致以及至善至美的本质。

(作者为河北省民俗博物馆馆员)

颐和园内的仙山琼阁——治镜阁

李 妍

一、所谓仙阁 在水一方

颐和园西部水中有一个神秘的孤岛，岛上没有任何牌示标注，只有巨大的建筑残件和高达三四层楼高的围墙。有人猜测，这是心狠手辣的慈禧太后关押宫女、太监的地方；也有的说这里关押过光绪皇帝……

翻开地方志，不难发现孤岛原有的名字——治镜阁。“治”是治理的意思，“镜”当明察讲，它是乾隆时期清漪园里就有的建筑。到慈禧修建颐和园时，这里已经荒置。（如图1）

乾隆皇帝为这座建筑取名“治镜”，可謂是煞费苦心。他一方面赞赏周围平静的

湖水如同镜子般宁静，同时又引经据典，劝诫自己以及子孙不要因为玩乐而误国。

不过，他没有想到100多年后，这样一座孤悬湖心的建筑躲过了1860年英法联军的战火，却躲不过慈禧的“破坏”。1886年，慈禧重修颐和园时因为财力匮乏，无力修复治镜阁，便将因年久失修而破败的治镜阁“肢解”了，把阁上部分木石构件拆下去营建万寿山前的建筑，此后，这座水中幻城变成了一座荒岛。晚清至民国的数十年间，治镜阁两重城墙外面包砌的城砖也逐渐被附近的农民拆走，只剩下了现在看到的夯土墙芯了。（如图2）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要在湖中心建造这样一个建筑呢？

先秦两汉时代，道教在中华大地上萌



图1 荒岛—治镜阁



图2 岛上现状

芽，^①他们关于海外仙岛的传说引起了帝王极大的兴趣。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不仅如此，仙山上还有长生不死之药。后人在《列子·汤问篇》中曾将“三神山”发挥为“五神山”：“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府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弦九野之水，尺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州，五曰蓬莱。”

不管到底是三座仙山，还是五座仙山，反正为应验这个传说、寻找到山上不死之药，从燕昭王开始，就不断有帝王派人乘船入海寻找。其中，动静最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到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乘船下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却一去不回返。后来秦始皇得不到灵丹妙药，只好通过仿建这种神仙般的景观来满足对神仙居所的向往，对长生不老的渴望和对立地成仙的幻想。

渐渐地，人们总结出了一套造园、布局模式——“一池三山”，并将它引入皇家园林的建造。这里的“一池”说的是构建一片开阔的水域来象征东海，并在水中堆出三个小岛，分别代表东海上的三座仙

山。“一池三山”不仅寓意非凡，同时也美化了园林景观。水中的岛屿及岛上建筑物不仅可以遮蔽视野，分割水面，也可以增加湖面的意境深度，让开阔的水面在局部上富于变化。（如图3）

二、北京的“一池三山”

想要感受这种“一池三山”的园林文化，可以在现存的皇家苑囿中去寻找，去探究。北京的颐和园、圆明园、北海公园以及承德避暑山庄都有反映这种“一池三山”的景观。

北京“一池三山”的建造模式最早见于保存下来的最早的皇家园林遗址——鱼藻池，当时水上建有“蓬莱阁”和“蓬莱殿”^②等寓意神仙居所的建筑，虽然在形制上不是完整意义上“一池三山”的格局，但对“蓬莱神话”的模仿已经非常明显。

旧时三海又称太液池，是逐渐形成的一片很开阔的水域。李临淮在《太液秋风》中说，“金氏太液池位于中都宫城以西的同乐园内，园中湖水与琼林苑内鱼藻池相连，统称西华潭，即太液池。”今天我们看到的三海实际上是包括了北海、中海和南海。辽时，北海、中海最早是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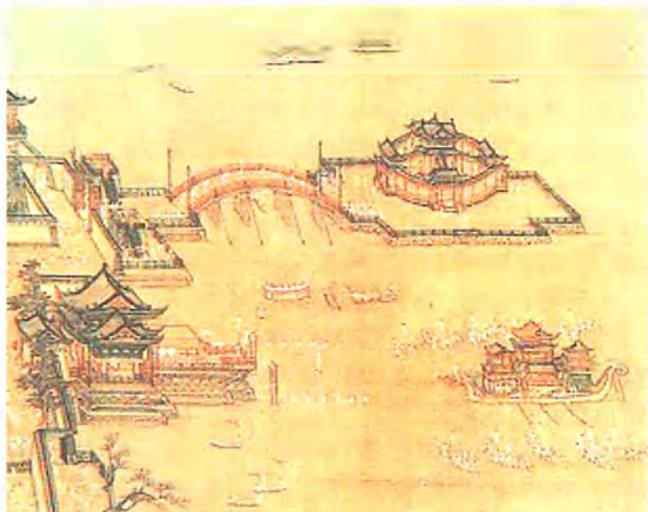


图3 水中仙岛示意图

低洼地带，由于引入西山泉水，开始形成湖泊。金代时开辟了中海，并在这里修建离宫——太宁宫，明初时又开凿了南海，终于形成了完整的三海水域。后来“三海”中也出现了水上三仙山，它们是象征瀛洲的“团城”、象征蓬莱的“琼华岛”，以及象征方壶的“犀牛台”。

这三座“仙山”历史悠久。就拿今天北海公园的标志性建筑“白塔”所在的琼华岛来说，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辽时它被称为“瑶屿”，这是古代一座神山的名字，金代改称“琼华岛”，元代改叫“万寿山”，也叫“万岁山”，明清时又改成“琼华岛”。依据蓬莱仙境的含义，元代时岛上还曾建有广寒殿，意喻嫦娥仙子住的广寒宫，元世祖在位时经常在殿中大宴群臣。

而象征“瀛洲”的团城，原是辽代挖太液池时用泥土堆成的一个小岛，后来成了金代修建的太宁宫的一部分，称作“瑶光台”，是皇帝祭天的场所，当时团城还是一处独立的岛屿。元代改称“瀛洲”，以象征神山。传说，这是忽必烈为了压住金人的“王气”，命人在金人祭天的圆台上修建了仪天殿等建筑。到了明代，仪天殿被重新修缮，并改名为承光殿。明嘉靖时再次重修，并改名为“乾光殿”，到清朝康熙修缮这里时，又改回了“承光殿”。

到了清代，“一池三山”模式在皇家园林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帝王们不仅注重保护、修缮紫禁城附近的三海景观，更是在西郊打造更大规模的“一池三山”。

在圆明园福海景区内，有一处叫做“蓬岛瑶台”的景观，反映的也是“海上仙山”的蓬莱神话。虽然现在福海景区已经看不出昔日幻境，但还是基本维持了“一池三山”的格局，与本文提到的其他几处“一池三山”不同，圆明园中“三山”之间的距离比较近，而且还有木桥相连。^⑤其实，福海只是圆明园中最大的湖，也是全园的中心。福海一名，是道教文化与“一池三山”很好的结合。道教宣扬修

道成仙，追求超凡脱俗的“仙境”，并将其视为实现得道成仙理想的修炼地。《韩非子》中说：“全寿富贵之谓福。”一个“福”字已经概括出了人生的终极追求，就算是帝王到此也可以满足了。^④

虽然这些“一池三山”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已经认定这种模式只能在皇家园林中出现，是皇家“专利”，是封建皇权的象征。

三、治镜阁——“一池三山”神话的延续

颐和园的前身是清漪园，由乾隆皇帝建造。在修建清漪园之前，“一池三山”的造园手法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如果说西苑三海中的“一池三山”是靠近皇城的“天上人间”，那么清漪园的“一池三山”则可以看作是它的姊妹篇。“一池”指的就是昆明湖，曾经有人分析说它象征着寿海，而外形像一个寿桃的万寿山则意喻福山，正取了福山寿海之意，颇有几分道教文化中人间仙境的意味。

严格说来，“寿海”并不是完整一片，它是由三块水域——大湖、西湖和后湖组合而成。以西堤为界，西堤以东的湖水称为大湖，也就是最大的那片水域，西堤以西的湖水再由堤岸分隔成南北两个水面，南面稍小的为小西湖（也称养水湖），北面较大的称为西湖（也称团城湖），也是治镜阁所在的湖面。在每一块水域中又分别有一座小岛镇守着，它们分别是象征蓬莱的南湖岛、象征瀛洲的治镜阁以及象征方壶的藻鉴堂。

治镜阁，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完工，是三“仙山”中最后完成的。治镜阁与万寿山上的佛香阁、南湖岛上的涵虚堂三阁鼎立，成为清漪园中的三个制高点。仅就高度来说，治镜阁可称的上是清漪园内的第二制高点。而且当时三山五园连成一片，治镜阁在其中是个承前启后的连结点，重要位置显而易见。（如图4）



图4 京畿水利图卷(部分)

根据档案资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治镜阁是多么雄伟、壮丽。它是一座圆形城堡建筑，城堡的圆形基座分内、外双层城墙，显得十分厚重。外城墙的四个城门上分设临水码头。外城墙与内城墙之间有水相隔，之间只用石桥将内、外城墙相连。外城墙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设城门，而门上的题额也是按城门对应周围的景色所题的：南为鬲风图画，北为蓬岛烟霞，东为秀引湖光，西为清含泉韵。内城墙同样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设城门，门上也有题额，分别是：南华秋水、北苑青山、辉朗东瀛、爽凝西岭。^⑤巧妙的是，这组题额已经暗示了它们的方位。不仅如此，这些题额也分别咏赞了四周风景。像“清含泉韵”、“爽凝西岭”，实际上就点出了治镜阁西面的玉泉山脉和甘甜的泉水。再如“北苑青山”，则点出了治镜阁北面郁郁葱葱的万寿山。

外城墙顶部四面分别建有一座观景敞亭，四座观景亭之间又有六十间游廊连成一圈。这样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遮挡了部分内城的建筑，外人不容易从远处看清楚内城的构造，使建筑愈显神秘。

治镜阁最核心的部分是建在内城圆底

座上的一座三层高的十字形楼阁。阁从下至上分别悬挂着乾隆书写的“仰观俯察”、“得沧州趣”和“治镜阁”三方匾额。楼阁四面各建一座牌楼，南面东西两侧则对称建两座四方攒尖观景方亭。（如图5）当年一层、二层放置的是皇帝专用的地平、宝座、宫扇以及字画等珍贵物品，三层则供奉铜胎佛像及大量的木贴金供器。

治镜阁建好后，乾隆曾前后八次登阁，并得意地赞咏这座位于水中的城堡式建筑，他在诗中反复阐明建造治镜阁的含义。其中以乾隆五十年（1785）的《题治镜阁》表达的最为完整。其诗曰：

“湖中峙城阁，向题曰治镜。
是盖有二义，申之以斯用。
一曰镜古治，善政与恶政。
一曰镜今治，敬胜及怠胜。
敬则其政善，民安与俗正。
怠则其政恶，君骄而臣佞。
敢不戒其怠，犹恐驰兹敬。
求治忌太速，亦足滋为病。
无逸而有为，永言励吾行。”^⑥

皇帝用人造的景观环境来扣典故，无非是要提醒自己以史为鉴、明察政事，治国安民不要懈怠和骄傲。

讲到这里，您可能已经了解了颐和园西面孤岛的来历。那么，这座恢宏的建筑有什么实际功能呢？让我们通过与治镜阁相类似的一些建筑来探究这个有趣的问题。

1、军事演习的瞭望台

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将清漪园内的水面命名为昆明湖。实际上这里边还含有一

个历史典故。相传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为了征服昆明国，在长安开凿了一个操练水军的大池子，取名为“昆明池”。乾隆皇帝化用这个典故，是不是也要在昆明湖上操练水军呢？

乾隆皇帝在建好昆明湖后，曾在江南一带招募水手，并在昆明湖上操练水师。正像《日下旧闻考》中记述的那样，“设战船，仿福建广东巡洋之制，命闽省千把教演。自后每逢伏

日，香山健锐营弁兵于湖内按期水操。”^①

而从外形上看很像治镜阁的香山团城，就是在第一次对金川用兵之后，乾隆十四年（1749）秋天建成的。^②这个时间要早于治镜阁的修建时间（1761）。

这个操练制度试行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昆明湖水太浅，更适合供帝王游玩的小船行驶，而不适合大吨位的战船。据说，当年操练水师时，乾隆皇帝曾经登上治镜阁观看。但是，也有资料写他是带着皇太后在现在南湖岛上观看水军操练的。

2、筑城忆征战

我们想要了解治镜阁的用途，还可以去看看北海团城。因为如果硬要做一比较，在北京，只有北海公园内的团城与治镜阁最像，它们都是建在圆台上的城垛式建筑。不过，单就历史来说，北海团城则要比治镜阁丰富得多。

北海团城是一座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同时也是中国皇家园林中仅存的城垛式建筑，享有“亚洲最小城池的美誉”，它在有限的空间内包含了歇山、庑殿、硬山、卷棚等多种我国古代的建筑形



图5 后人绘制的治镜阁建筑造型

制和营造法式。

北海团城在辽代时，原本只是太液池中的一个小岛。金朝统治者把这个岛修成行宫的一部分。后来在元灭金的战火中，建筑面目全非。当元世祖忽必烈回过头来修建大都城，突然追忆起当年在这里指挥打仗的情形，非常感慨。为了纪念当时的胜利，同时也为了纪念那段峥嵘岁月，忽必烈改称这个圆形的小岛

为“瀛洲”，也可能是为了与“赢”谐音。

因为元代统治者来自草原，所以他们修建的这个建筑独具草原景致，^③我们从远处欣赏团城，会觉得它很像水边支起的一个蒙古毡房。而当初忽必烈也是仿照蒙古毡房的样子修建了团城上的主要建筑——仪天殿，这是一座圆形殿宇，重檐圆顶，也称为“瀛洲圆殿”，因此，又称团城为“圆坻”。

联想到治镜阁修建的时代背景是在第一次对金川用兵之后，乾隆皇帝可能也是模仿忽必烈建造“瀛洲”的立意，修建了这个水中碉堡，以纪念那次艰难的战役。第一次金川之役，清政府调动了七省兵力，前后约八万余人的军队，总共用银一千万两以上，最后不过得一个所谓的“受降”名声而已。第二次金川之役，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到四十一年（1776）二月结束，共调兵十二万五千五百余人，耗银六千一百六十万两，米二百九十六万三千五百多石，火药四百二十万一千四百多斤。可见，清政府确实下了大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灭金川土司势力誓不罢休。所以，在大胜之后，乾隆皇帝也觉得可以

松一口气。

3、娱乐观景之所

自古帝王少有不爱享乐的，修建皇家苑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供帝王以及皇室成员娱乐。

虽然一般书里只是介绍治镜阁是观看水军操练的地方，并不像北海团城那样成为了帝王的娱乐场所。但是，圆明园里的“一池三山”——“蓬岛瑶台”的主要入口下悬挂着一块乾隆手书的匾额，叫“镜中阁”，听起来和“治镜阁”大同小异。另外乾隆在这个宫门上建造了一座塔楼，这个塔楼就是福海水面的最高点，是观赏福海景色的绝佳之处。每年端午节的时候，会在福海上举行龙舟大赛，而乾隆皇帝与皇太后就是在这里观赏水上龙舟大赛的。^⑩

所以，笔者猜想，当初乾隆在清漪园里操练水军，本质上和圆明园中的龙舟大赛没什么区别，主要还是供自己玩乐。而且，治镜阁还是清漪园内的第二制高点，仅次于佛香阁，而且它比佛香阁更接近水面，也就贴近自然美景。

4、歇脚的中转站

乾隆时，三山五园连成一片，治镜阁处在其间，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景观。虽然治镜阁离玉泉山还有一段距离，但却像是与远山形成一体。正如明代造园家计成所说的，“借者，园虽别内处，得景无拘远近。”把远景纳为园中一景，增加了园林的景色变化。^⑪

在修建治镜阁之前，乾隆还曾对三海进行扩建，我们现在看到的北海团城大致是乾隆十一年（1746）重新修缮后的样子。北海团城与治镜阁，两处景观都运用了杭州西湖及扬州瘦西湖相互对景、借景和配景的烘托手法，吸收了集锦式园林建筑群的布局手法，即园林景物之间的承接、转折、过渡，使之造成有起点、转折达到高潮进入结尾的造园手法布局。

据说，乾隆皇帝很喜欢北海团城，当

他主持隆重的祭礼或者朝贺之后，就会来这里更换礼服和歇脚。同样的，每次往返玉泉山与万寿山之间，乾隆都能经过治镜阁，这里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临时歇脚的一个中转站。

这就是笔者基于治镜阁的地理位置以及建筑特点对其使用功能的一些推测。不管颐和园内的治镜阁到底做什么用，笔者相信能够把它修复起来对保持“一池三山”格局有重大意义。因为从这种颇具神话色彩的园林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帝王对“长生不老”千古追求的园林价值。颐和园内的治镜阁不仅仅是一个水中的孤岛，它是整个“福山寿海”大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支点，也是传递中国古代园林文化的一个重要桥梁。

①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37页。

②李建平：《北京最早的皇家园林遗址——鱼藻池》，《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③王威：《圆明园》，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7页。

④殷伟、殷斐然：《中国民间俗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颐和园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54页。

⑥孙文起等著：《乾隆皇帝咏万寿山风景诗》，北京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448页。

⑦（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1391页。

⑧胡玉远主编：《京都胜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第2版，第140页。

⑨白珍珠、李振西：《北海》，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⑩刘阳：《昔日的夏宫》，学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80-81页。

⑪陈从周：《园林清议》，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82页。

（作者为颐和园管理处耕织图讲解员）



晚清善扑营和 纪式太极拳

宋鹏远

“虎势熊风，眼大眉浓，身高膀阔正年轻，因此上本旗保送善扑营。绊子巧手快腰活桩儿稳，又搭着保养操持，齐砖拧秤。你看他练成举鼎拔山力，定戴皇家的孔雀翎。”这是一首至今流传在相声和曲艺界的单弦岔曲的曲词，通过对词中那位入选清代善扑营的年轻勇士的赞扬，或许使人还能感受到一些清朝所特有的摔跤扑户们的英姿，以及那个时代在旗人中的一种尚武精神。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一切皆已随着历史的车轮而变成了今人的无限遐思。本文旨在通过记述晚清善扑营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旧事，以及对一套很少流传于世的纪式太极拳的介绍，希望使更多的人了解到我国传统武术遗产方面的一些内容。

一、满族摔跤与善扑营的历史考证

自从关外旗兵的铁骑踏入中原以后，清朝的统治者历来不敢忘记骁勇武功在他们的祖先们创立江山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旗人崇尚练武术，这在老北京人里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然而旗人所练习的武术，与汉族人固有的传统武术还有所区别。不论是在旗营里的武艺操练还是在旗人的体育娱乐活动中，最具普遍性的当属满族的摔跤。摔跤在清代又称撂跤、相扑，特指清代满族的传统摔跤运动。如爱新觉罗·瀛生在他所

写的《老北京与满族》中说到“满族人带武架子”，^①指的就是练习撂跤基本功所养成的架势。对于擅长此技的八旗军士，清廷曾作为单独的善扑侍卫加以单独管理。此外又特设善扑营，来承应以演练撂跤、射箭、骗马等技艺为主的特殊军营。然而关于善扑营建营的时间，在史料上并无明确记载，已无从考证。但从一些零散的条目中，还可见撂跤以及善扑营发展的梗概。首先《光绪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初年定……善射鹄、善强弓、善扑等侍卫，各有专管，统在三旗额内，均无定额。”说明在清顺治初年就已设有善于相扑的专职侍卫官职。其次，同书“健锐营训练条”又载：“乾隆十七年（1752）定……逢三、七日演相扑、过马、骗马、三枪、舞鞭、舞刀、射箭。”“道光二十一年（1841）准奏，健锐营裁撤撂跤八十名。”^②可见在乾隆时期，相扑、射箭等技艺曾专门由以今天团城演武厅为中心地，驻扎在沿香山山麓一带的健锐营八旗军士定期进行操演。在道光二十一年后，才从健锐等营中单独调拨撂跤手八十人开始设立善扑营。此外在《清史稿》康熙八年（1669）部分中也可见到相关的文字记述：“上（康熙）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候补侍卫）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掎而繫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③这段史料描

述了年轻的康熙皇帝凭借自己特选并进行了“扑击”训练的“拜唐阿”而一举擒拿住了“乱政”大臣鳌拜的前后过程。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爱新觉罗·玄烨作为少年天子的魄力与勇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相扑跤手在那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我们今天在《清会典事例》中并不能找到有关善扑营的专载，以及《清史稿》因在民国时期由多人仓促编纂成书而具有的不精准性，所以“康熙擒鳌拜”这个历史事件仅可作为善扑营沿革的一个参考。

作为皇家最高水平的攒跤人才队伍，在善扑营中，又曾设有一等、二等、三等、它希密（又叫侯等儿）等不同级别的扑户（跤手）。^④他们很多都是世家传承，除习练统一的《跤谱》内容外，^⑤基本上又各自承袭家传的独到技艺和练法。经过多年的磨练以至于生死格斗，从而得到最终的职位和优厚的俸禄。由于武功高强，善扑营的扑户们又多承担着在国宴上与蒙古跤手比武以彰显国威、随狩猎出巡的帝王出行护驾、训练旗营中的清兵提高武艺、协助衙门缉拿重案要犯、定期为皇家表演娱乐等任务。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无论是那些高超的绝技，还是当初秘不外传的训练方法，均已成为了历史的回忆。现在只有在一些武术爱好者的口中，还流传着一些相关的佳话。

二、晚清后期的武术兴衰

通观我国的武术发展历程，清代中晚期至民国初年，可以说是我国民族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诸如“上三门”之称的“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相继从传统的中华武术中独立门户、问世成型。伴随着一大批武林宗师的出现，也为世人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武术理论（性命之学）和更具效果的独特练法。那些在今天说起来也堪称为惊人的神奇绝技，在那处于冷兵器战争收尾期的时代，理所当然的首先受到了清朝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于是这些门派开创

者们的授徒活动，在最初几乎全部是在王公贵族、社会高层的范围之内进行。随着知名度的不断飙升和流传范围的蔓延扩大，尤其以我国北方为主的地区就相继出现了习练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的习武高潮。然而更多的真正醉心于武学的武林人士，也早已抛开了固有的门户之见，将各门派的理论精华加以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并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与发展。在当时的武术界，可以说一度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局势。其中，太极拳、八卦拳都进入了清政府的神机、善扑等营，并与其固有的武术发生了融合。而形意拳甚至成为民国时期北平中小学的正规体育教程和东北讲武堂的军官基础武术训练科目。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和枪炮战争时代的真正来临，向来以实战和肉搏为主要用途的中华武术，悲哀而无奈地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全新的社会建设、特殊的政治需要以及后来的十年浩劫，又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中华武术理论因其本身所特有的文化性、哲学性等因素，使得很多老武术家不敢声称自己习武，有些人还经历了抄家和批斗，武术活动在当时的社会上又一度销声匿迹。故在晚清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武术可以说是由短暂的巅峰一落再落，直至跌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

三、纪式太极拳的传承及特点

纪式太极拳就是在上述特殊历史阶段形成的一套流传范围极小却特色极强的太极拳。这套太极拳是晚清善扑营纪寿青先生家传的一套专供皇家跤手演练的太极拳趟路。纪寿青先生，人称纪四爷，是晚清善扑营西营的一等御用扑户，也可以说是善扑营中最后的一代正统跤手。善扑营分为东西两营，各设有翼长，统辖营众。在当时老北京攒跤行的口头语中，就曾流传有“东营搬腿禄、西营纪寿青”的说法。其中“搬腿

禄”为善扑营东营的著名扑户之一，在当时与纪寿青先生同为顶级跤手而齐名。纪先生出身于攒跤世家，其父亲也是善扑营中的攒跤高手。据我们从杨氏太极拳的传承历史及此套太极拳的招式特点等方面的考证和分析，此套纪式太极拳，当是其父亲在杨式太极拳在京流传后，将其学习所得与善扑营跤法有机融合而创立的新趟路。故纪寿青先生从年轻时就习练此趟太极拳。由于将太极拳融入了跤法，使得纪寿青先生的跤术在当时也称得上是赫赫有名。在老北京的语言中，“把式”一词有特指武术大家的意思。故攒跤同行将纪先生的跤术冠以了“把式跤”的尊称，意为其跤术中夹有独到的内功拳术功夫。据说纪先生在跤法上什么绊子（攒跤的技术动作）都会使，什么绊子也都会破。他一生与人比武，除一次由于轻敌而导致了先胜后败的结果外，从未败给过对手，可见其武艺的高超。在清朝末年，纪先生经常入宫为慈禧



清代《塞宴四事图》中的善扑营攒跤

太后作攒跤的娱乐性表演，也曾协助有关衙门缉拿凶狠的飞贼团伙。但清政府倒台之后，善扑营也随之解体，很多善扑营的扑户们从此变得衣食无靠。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们只得另辟门径。据首都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系主任苏学良先生和被誉为“京跤不老松”之称的李宝如老先生合著的《京跤史话》一书记载，有的扑户开始收徒传艺，有的扑户则彻底改行，从事了其他职业。^⑥纪先生也开始开馆课徒，将原本只限于官家能见的一些技艺公诸于世。由于太极拳的特殊锻炼作用，纪寿青先生还曾将

此趟家传的太极拳，教授给身边的一些疾病缠身的熟人与邻居。凡在纪先生的悉心指导之下认真习练的人，其健康水平均在短期内获得了显著的提高。其中就曾有一患有痿症的年轻人，下肢痿弱不能行走，在那个医疗水平相当落后的年代，只能整日躺在炕上。纪先生知道后就让其按照拳术的基本规矩和要领，每天坐在炕上练习太极拳的“云手”等动作，三个月后，这个年轻人便神奇地恢复了健康，能够下地行走了。于是他拜纪先生为师，更加刻苦练习，武艺有了更大的提高，曾一度到天桥宝三的跤场给他们帮场子。可见其太极拳健身祛病的锻炼作用。只是由于生计问题，纪先生当时主要以传授跤法为主，对

于太极拳的教授并不多。此套纪式太极拳以及上述相关的往事，就是通过一位名叫宋春佑的老先生的传承记述才得以流传至今的。宋老先生在幼年时，恰与纪寿青先生同住一院为邻，也是由于体弱多病的原

因，为了强身健体而向纪先生学习了这套太极拳趟路。

此套纪式太极拳的特色在于，它虽然从形式上承袭了传统杨式太极拳的基本要领，但是在具体招式的设计和运用上又作了较大的变形和改造，且从技击技巧的使用角度上更靠近于攒跤技法。从趟路的整体上看，加入了如揉球云手、踏步云手、金鸡抖翎、游鱼分水等特有的招式名目，为其他任何趟路的太极拳所未有。而揽雀尾、倒撵猴、进步搬拦捶、野马分鬃、上步七星等招式，也作了极大的改动，带有明显的攒跤

架势和实用意图。与其他太极拳比较,整体操练起来,纪式太极拳要求练习者脊椎运动的旋转幅度更大,而某些动作若非长期习练难以一步到位。这正可见当时研设此趟太极拳者对于功夫要求的高标准与严格之处。凡习练此趟太极拳,一方面不失太极拳刚柔相济、中正安舒的整体特征;而另一方面,又具有跤术所特有的灵变特色,更能使旁观者有耳目一新之感。

至于纪寿青先生的归宿,则甚属可怜。撂地卖艺对于他来说是绝对难为的事。为了生计,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替人押过镖车,也曾私下收几个徒弟而贴补些许生活,还到南方某武馆去教过功夫。但是历史的变革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个永远无法挣脱的梦魇。青年时代凭着超乎常人的血汗付出而换取来的威风和荣耀,与清朝灭亡后竟要为了衣食而奔波的怒怨与辛劳,两种境遇的天壤之别所产生的极度失衡,无时不对他的身心进行着侵蚀与折磨。他那本来超乎常人的体质最终也无法抵制这种摧残,据宋春佑老先生所知,纪先生在六十岁左右的时候,由于噎膈(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食道癌)而与世长辞了。

四、继承发扬武文化的意义

今天,我国正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位置的不断攀升,我们也即将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的复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的复兴。既有新文化的发展,更有旧文化的继承。中华武术这一代表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与性命之学理论精华的奇葩,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同样具有极其深厚的挖掘空间。以几乎成为我国国拳的太极拳为例,它所向人们昭示的东方古代哲学体系、古代生命科学体系、古代自然科学体系,以及它那拳术经典理论中所涉及的有关中华典籍中的政治、军事、文学乃至玄学、禅理等方面的相关外延,对现在的人们来说知之甚少,而有待于发掘整理

的方面却实在是太多太多。

鉴此,就此套纪式太极拳的继承和发扬工作来说,有着现实意义。首先,它可以填补我国太极拳在整体的流传与发展体系过程中的一个空白分支。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太极拳甚至整体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至今鲜为人知的层面,使人们对于清朝时期汉族和满族固有武术的融合状况得以窥见一斑。还可以通过这趟太极拳看到很多新颖的招式改造,从中开展对太极拳的发展史和拳术理论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为满族传统式的撂跤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与实践技术。就其养生康复作用来讲,这套太极拳的普及推广,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身体素质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中,武术作为一类民族遗产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即将于北京召开的2008年奥运会,武术也被列为了一项特殊的比赛项目。这一切说明中华武术的地位正在被世人重新重视起来,中华武术事业又迎来了一个全面复苏的历史阶段。纪式太极拳的传承与发扬,在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武术的层面上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①爱新觉罗·瀛生:《老北京与满族》“老北京的满族传统体育活动”章,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68页。

②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三章第四节之“善扑营条”,引《光绪会典事例》卷1006、卷1168,学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201页。

③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三章第四节之“善扑营条”,引《清史稿·圣祖本纪一》,学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201页。

④苏学良、李宝如:《京跤史话》,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18页。

⑤爱新觉罗·瀛生:《老北京与满族》“老北京的满族传统体育活动”章,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67页。

⑥苏学良、李宝如:《京跤史话》,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22页。

(作者为北京团城演武厅管理处助理馆员)

明长城“北京结”防线的形成及布防策略

陈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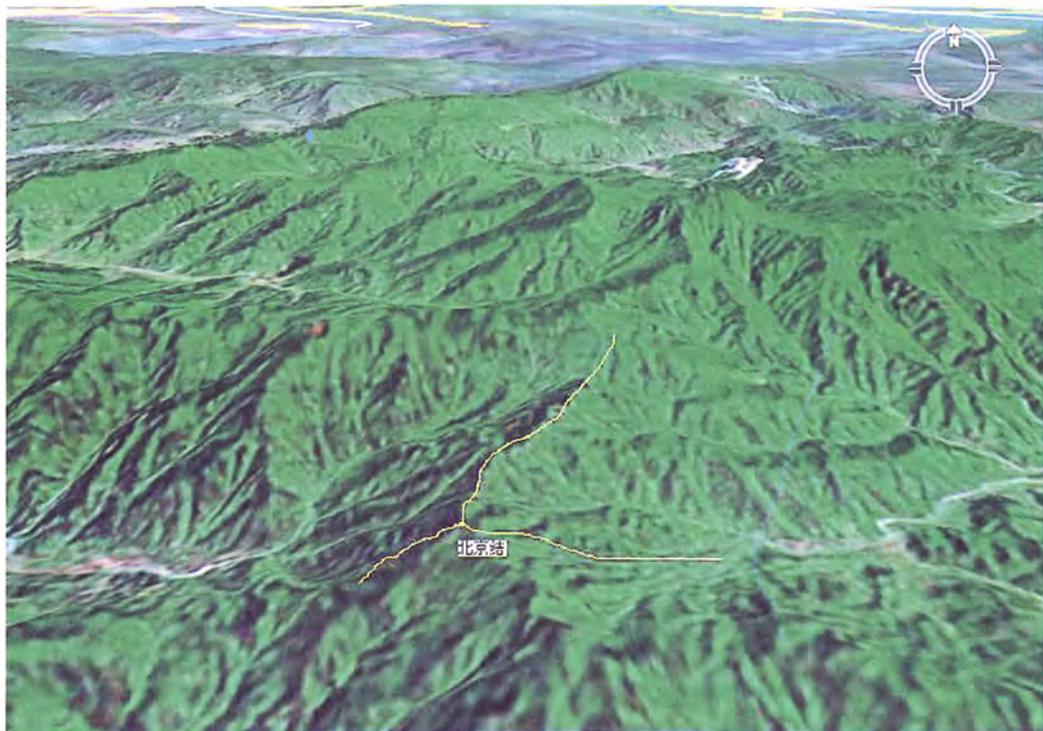
长城横亘中国北部,蜿蜒万里,蔚为壮观。现北京地区长城因在明代毗邻京师,承担拱卫京、陵的双重防务而形成复线及交叉的复杂格局。“北京结”正是这种格局的集中体现,它是北京长城各分支的交结点,代表了北京地区长城的特色,因而有必要对“北京结”进行系统和细致深入的研究。

以前多有专家、学者对“北京结”进行勘察并做相关研究。如最早提出“北京结”的《北京地区长城航空遥感调查》^①,是运用航空遥感技术的手段,从北京长城整体布局上分析,但未做深入探讨。王玲《有关北京长城的几个问题及对万里长城的认识与评价》^②中涉及到了北京结的位置、走向,并从长城看古代防御体系及军事思想,也是从宏观来写北京长城的整体情况,没有细致论述北京结,观点亦与遥感调查报告一致。王宝骏《关于“北京结”长城》^③一文记述

了北京结的分支及明代的修建情况。文中对于北京结分支长城的具体走势的考察仅限于怀柔境内,修筑年代亦集中在明后期隆庆、万历年间。刘兴《明长城“北京结”》^④主要简介北京结的确定地点及其附近长城的三个交汇点与景观。其余涉及到北京结的文章基本上是北京结附近单个敌台的研究,如对九眼楼的考察和研究。此类文章有针对性,但缺乏对北京结各分支的系统整理。笔者认为,目前实地考察中可以看到北京结长城状貌,只是嘉靖“庚戌之变”之后明朝廷对于京师附近长城防线的加固及隆庆年间戚继光督建空心敌台至万历中大量添筑整修的结果,并不能全面反映其早期的修筑情况,因此未必是最本初的形态。以北京结为中心的防线结构应该是早自明代迁都北京并建立皇陵后逐步形成的。仅考虑其地域上的分布状况,或单单以现存



北京结长城走向



北京结卫星照片(自 Google Earth)

遗迹中的城墙与敌台所能直观反映出来的年代背景为依据分析,都不全面,应将北京结置于明长城九镇的建置过程、明朝军队与蒙古军队的对峙与争战历史的较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来分析,并透视其后反映出的明朝北京边务的布防意图。本文试结合前人研究,根据史籍记载和现存遗址及石刻,重新分析这一问题。

一、“北京结”的含义

“北京结”位于今怀柔境内。根据1985年中国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对北京地区长城进行的航空遥感调查,北京地区长城主要分为东西、北西两个体系,在怀柔八道河乡西栅子村旧水坑西南的分水岭上会合,形成临近的南、北两个会合点。南会合点位于东经116度29分38.9秒和北纬40度27分45秒之间,被命名为“北京结点”,简称“北京结”。^⑤长城在此分为伸向西南和伸向东方的两条支线。北会合点位于北京

结向北约两公里火焰山上的“九眼楼”,有伸向北西和西两条支线。

从形制和明朝军事建置上来看,目前确定的北京结并不是长城各支线精确的交结点,这一问题也反映在明后期将领翁万达对北京结附近长城防线漏洞的修补中。如果对北京结的含义进行分析,可以对这一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

“北京结”是对于长城支线位置、建置、材质、层状的高度概括。它体现了四种意义上的分界:内外长城分界,蓟、昌、宣三镇分界,砖石长城与石垒长城的分界,单线长城与复线长城的分界。

1.从防御层次的位置分布来说,北京结是内外长城的分界。外长城、内长城,明人称为外边、内边,或极边、次边。明魏焕《九边考》分析内外边的不同战略地位:明太祖即古会州地设大宁都司营屯等卫,外山联络,与辽东、宣府东西并列为外边,徐达西自古北口东至山海关增修关隘一道为内边。^⑥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翁万达会

宣、大、山西镇巡官议边防修守事宜,以山险的位置分布及临敌的远近来区分内外边:“山西起保德州黄河岸,历偏头,抵老营,……大同西路起丫角山……东抵东阳河镇口台……宣府起西阳河,历中北二路,东抵永宁四海冶,……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险在外,所谓极边也。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至平型关八百里。又转南而东,历龙泉、倒马、紫荆……至沿河口千七十余里。又东北,历高崖、白羊,至居庸关……凡二千五十余里,皆峻山层冈,险在内,所谓次边也。”^②可见外边是从辽东经大宁都司经山势连接宣府四海冶过永宁,西北经独石口,再向西至大同迤西一线,这是直接临近蒙古人的地区。内边是从山海关至古北口蜿蜒向西,过白马关转而折西南,历石塘路、慕田峪,继续西行至黄花镇,历居庸关向西南,接白羊口、沿河口、紫荆关、倒马关,取道山西的平型关迤西一线。内、外长城于四海冶、慕田峪附近的北京结相交在一起。

2. 从明长城九镇的区划建置来说,北京结处于蓟、昌、宣三镇的分界地区。宣、蓟、昌三镇依次建立,逐步形成。宣府镇建于永乐七年(1409)。^③蓟镇据《四镇三关志》所载为永乐二年(1404)建立。嘉靖三十年(1551),分蓟、昌为二镇。^④故蓟、昌本为一镇,后昌镇从蓟镇中分出,专护陵寝。宣府镇依自然地势,将辖区分为东、南、西、北、中五路设防,其东路“自四海冶至靖胡堡”^⑤;其东路之南有南山,“南山者,东路之南也。东路之南则腹里矣,乃亦联城列戍以为边……以其一带之边,为防护山陵耳。据边东起四海冶之火焰山,西抵怀来南之合河口”。^⑥南山应是明嘉靖“庚戌之变”之后在东路之南修筑的一条支线。明臣秦霖论东路起点在蓟、昌、宣三镇分界及南山走向:“东路之界……其壤东接昌蓟,自火焰山起南分,而西南竟合河口,中若四海、灰岭、柳沟、岔道、大山口,垣长二百二十余里,隶之南山参戎焉。”^⑦这是以火焰山九眼楼为起点向北和向西延伸的宣府镇辖下的两条长

城支线:宣镇东路与宣镇南山。蓟镇由山海关西经古北口、石塘岭至慕田峪正关台为界,迤东至莲花池村南的开连口为蓟镇石塘路;迤西为昌镇黄花路,由黄花镇过居庸关、白羊口、横岭直至镇边城。即上文所说内边。北京结东临蓟镇石塘路,西界昌镇黄花路,南至昌平州,北至四海冶宣府地,与宣镇、昌镇分界处火焰山及蓟镇、昌镇分界点慕田峪临近,处于三镇交界区域,可称要冲之地。^⑧

3. 从长城的修建材质上来看,北京结是砖石长城和石垒长城的分界。万历时巡按宣、大御史吴亮的奏疏中曾提到北京结附近的长城材质不同的问题:“接次墩边墙备行该道勘详,臣复躬亲相度。接次墩者,昌镇与宣镇之接界也。墩以南属昌镇,墙高而厚,石脚砖顶,久称长城。惟墩以北……墙卑且薄,更多倾颓。”^⑨接次墩应为昌、宣二镇接界之墩台,可见在当时的官员实地勘察中,已经注意到了由于不同军事区划领属形成了不同形制的长城。

另外据考查,九眼楼南的长城为以条石为基,上层以砖包砌的砖石长城。在靠近九眼楼的地方为毛石码筑长城,多已成石堆状。九眼楼北的长城亦为毛石垒砌的简易石墙,当地称干插边,全部塌成石堆状。^⑩目前北京结附近的长城遗迹因年久倾颓,加之历史上的人为破坏,无法很准确地判断两种形制长城的截然分割点。目前显露出来的石垒长城有可能是砖石长城外面包砖与条石剥落后剩下的石芯墙。但是这个



九眼楼

地区出现两种形制长城的分化是很重要的特征。据遥感调查报告,北京结附近形成了长城宏观上的形制区别:“具有八达岭、慕田峪一带那种结构谨严、气势雄伟的长城到北京结突然中断,继之向北西延伸的均为断壁残垣。”^⑩

4.从长城的层状来看,北京结是单线长城与复线长城的分界。清代顾炎武曾论及这个问题:“慕田峪城……自此以西皆重边,自此以东皆单边。”^⑪对此航空遥感调查报告中有细致描述:“东西向长城体系,在北京结以东,以单层状为主,只在隘口附近才出现环状、多层状;在北京结以西,则比较复杂,除主要隘口附近构筑多层状、环状城墙外,在延庆盆地与北京平原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构筑相互平行的两道城墙,彼此相依,形成完善的纵深防御体系。北西向长城体系,在北京市境内主要为单层状,与前者相比,结构简单得多,两大体系区别比较明显。”^⑫

二、由“北京结”延伸出的四道防线

如前所述,以“九眼楼”为分界点,伸向北西的支线为宣镇东路,向西的支线为宣镇南山。南面的“北京结”,伸向东方的支线从正关台以东至莲花池村南的亓连口,为蓟镇石塘路长城;正关台以西直到西水峪口一带为昌镇黄花路长城,向西南延伸。北京结是长城中的一个枢纽点。^⑬由此我们可

以看到四道防线:

1.宣镇东路:西北支长城由黑坨山向西北经延庆进入河北省,此段为石块堆垒或黄土夯实的土边墙,称为东路边垣。沿线有周四沟、千家店、黑汉岭、刘斌堡等城堡,黑峪口、天门关、营盘口、干沟、曰河堡、金鸡口、黄岭口等关隘。

2.宣镇南山:西支长城向西至海子口、营城、柳沟、岔道,在西拨子镇黄花顶,与八达岭段长城相连接,大都为土夯的边墙,称为南山边垣。沿线有四海冶、永宁卫、柳沟营、岔道城等城堡,四海冶、海子口、十八盘梁、柳沟、小张山口、岔道、八达岭等关隘。

3.蓟镇石塘路:东支长城由慕田峪以东,依次为亓连口关、神堂峪关、河防口关、大水峪关至小水峪关、牛盆峪关、白道峪关、大良峪寨、东水峪关、鹿皮关、西石城关、东石城关、石塘岭,为砖石长城。

4.昌镇黄花路:西南支长城由慕田峪以西,经北京结的关口田仙峪,再依次经擦石口、磨石口、驴鞍岭、大榛峪口、南冶口、大长峪口、小长峪口、黄花镇本镇口、鹁子峪口、撞道口、石湖峪口、西水峪口入延庆,为砖石长城。

三、北京结四道防线的形成

根据文献与长城刻石记载,将北京结四道防线的形成过程列表分析,纵向为时间顺序,横向依次为北京结以西的北、中、

	宣镇东路	宣镇南山	昌镇黄花路	蓟镇石塘路
永乐年间			修建大榛峪口、驴鞍岭口、磨石口、田仙峪寨、慕田峪关、枣园寨口、石城岭口、西水峪口、撞道口、小长峪口、大长峪口、南冶口等17个隘口 ^⑭	修建亓连口、神堂峪、河防口、大水峪关、牛盆峪、白道峪、东水峪、石塘岭、东石城等关 ^⑮
天顺八年(1464)	四海冶堡 ^⑯			
成化二年(1466)	四海冶附近的紧要隘口 ^⑰			
正德年间(1506-1521)	四海冶堡东自镇南墩起,西至永宁界已成规模 ^⑱		石湖峪口 ^⑲	
嘉靖中		筑南山一带土城,东起永宁县东火焰山,西抵保安州东南合河口,置城、设兵驻守 ^⑳	擦石口、贾儿岭口、鹁子峪口、本镇口等4个关隘 ^㉑	
嘉靖二十二年(1543)		修筑永宁大、小红门并柳沟口		

嘉靖二十八年(1549)	四海冶镇南墩,西至永宁尽界……创修石墙,添设墩台。 ^⑳ 四海冶、永宁一带……地势不可乘者,稍为更改,俱创修新墙一道。 ^㉑			
嘉靖三十年(1551)			黄花路边墙 ^㉒	建石塘岭边墙 ^㉓
嘉靖三十五年(1556)		修筑墩台御房,添设守备一员于岔道城。 ^㉔ 居庸东北,自岔道西抵龙爬山止,修隘口及边,筑墩、堡。隘口,设卒把守。修筑大石墙或虎尾小墙。 ^㉕		
嘉靖三十六年(1557)	隆、永新设兵备,宜即以东路割属之。 ^㉖			
嘉靖三十八年(1559)		宣府怀、隆、永宁南山一带,西自合河口,东至横岭止,修筑大墙。 ^㉗		
隆庆元年(1567)				修石塘岭边墙 ^㉘
隆庆二年(1568)		岔道以东自青石顶至四海冶火焰山,修筑墩台于柳沟等处。 ^㉙		
隆庆三年(1569)			空心敌台四十四座 ^㉚	
万历元年(1573)		修南山及中北二路诸边墩营寨 ^㉛		
万历六年(1578)			诸关隘又经不断修缮 ^㉜	密云、怀柔交界处西沙地城段 ^㉝
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1615-1617)		万历年间分修南山边垣 ^㉞	修昌镇边墙 ^㉟	修蓟镇边墙 ^㊱

南三线及东部支线:

从以上修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规律:

1. 明永乐年间修建工程围绕新迁之都城北京周边建内边各隘口,其中,凭借地势险要而建立一批关口,如蓟镇石塘路的石塘岭、大水峪、神堂峪等,及黄花路大榛峪口、驴鞍岭口、磨石口、慕田峪等。

2. 宣府东路外部防线嘉靖三十年(1551)后少有修缮,嘉靖中开始出现南山防线,明后期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着重修建了内边防线蓟镇石塘路、昌镇黄花路、宣府南山。

3. 从形制上看,其中宣府南山为土边、墩台,蓟、昌都是一、二等边墙及空心敌台。

四、北京结长城防线的形成原因及布防策略

根据前述北京结的四种分界、四条防

线的走势及其修建的大致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所见这四条长城防线的交结点并非是明王朝在短时间内为应对战事所构建的军事部署,它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应对客观的军事形势层层累积的结果。下面本文试结合当时的军事形势来论述这几条防线的形成原因及布防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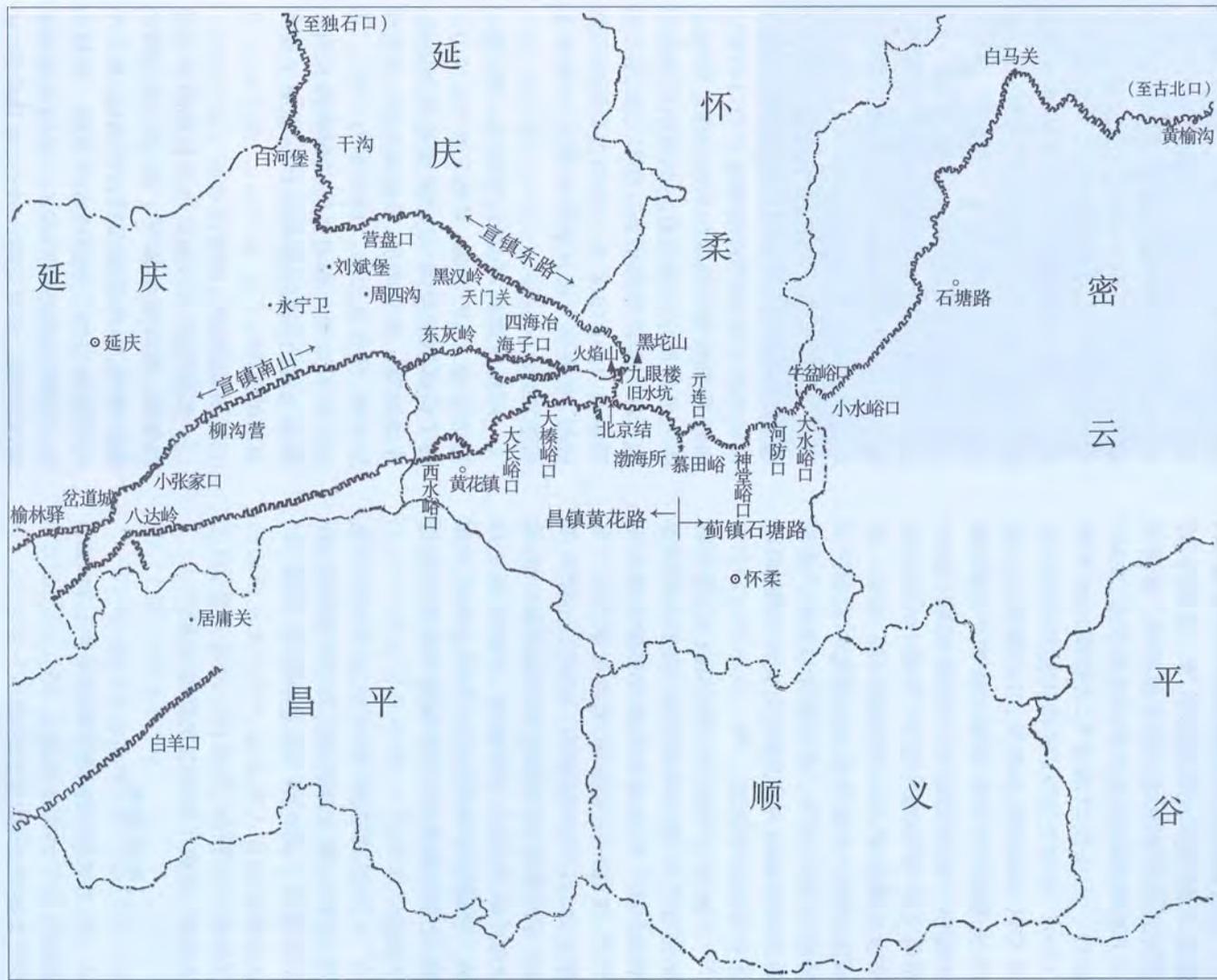
(一) 形成原因

这四道防线分别是在与临近或入侵的蒙古军队对峙争战中逐步建立的。

1. 宣镇东路

明朝初期的军事防御中心在外防陕西、山西一带,后战线东移至宣、大。宣镇为京师门户,成为防御蒙古部族的重镇。宣镇东路是长城总体防务的外部屏障。当时“倾全镇之力以计安东路,顾有甚于镇城与各路。……东路安则南山之南举安也”。^⑤其中四海冶素为蒙古朵颜、泰宁、福余三卫窥伺之地,且其临近朵颜卫左都督花当部落。三卫中朵颜日益强大,花当是其最强大的部

北京结四道防线示意图



明末城“北京结”防线的形成及布防策略

落,因此四海冶为宣府东路要防。诸元裔属部在墙子岭、古北口、白马关以西至黄花镇境外驻牧,正统前尚能畏服,正德以后乍臣乍叛,肆意抢掠,自不朝贡,且对边内虎视眈眈,势难阻御,故而防守之计不可废弛。

2.宣镇南山:自宣德始,明官军懦弱,宣镇以北“盖弃地三百余里”^⑧。宣德间,宣宗弃北边节节退缩,而守独石口。嘉靖年间,“游骑分窥东及永宁川南及岔道、灰岭、柳沟、大小红门诸口”。^⑨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俺答从古北口西黄榆沟入犯,掠怀柔,攻顺义,并长驱南下至通州,分掠昌平、三河,直抵北京城下,侵犯诸帝陵寝。“庚戌之变”后,为防护陵寝、京师,宣府又作“护关缩守之计”^⑩,集中力量加强居庸外围防守。南山防线的出现,应属一种消极防御。宣镇即成为居庸之外直接护卫陵寝、京师之要冲。南山亦日益重要,“修筑南山以安畿辅,诚经国安边大计,宣府目前急务莫有过于此者。”^⑪

3.蓟镇石塘路:明初蓟属内地,北平行都司与辽东、宣府东西联络,但永乐年间置朵颜三卫,内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为大宁都司,其地归三卫占有,蓟遂与蒙兵临。自此宣府与辽东声援隔绝,朵颜三卫阳顺阴逆,为明之边患。蓟镇防线日益重要。“庚戌之变”后,明廷为守护陵寝,于蓟镇别立昌镇,特遣重臣督镇蓟辽,蓟镇边防更加加强,尤其在隆庆、万历年间对长城着力进行了修建。

4.昌镇黄花路:黄花镇正当京师北大门。东别山海,西则居庸,其北切邻四海冶,位置重要。黄花路一线地处险要,渤海所、黄花镇屡遭蒙古军进犯,^⑫因此黄花镇段长城修筑十分精细,关隘设计严谨完备,设三道关防,形成了更复杂的防御体系。

(二)布防策略

在北京结四条防线的形成中,体现了明朝廷如下的布防策略:

1.战线南移、重防内线。

如前所述,南山一线于“庚戌之变”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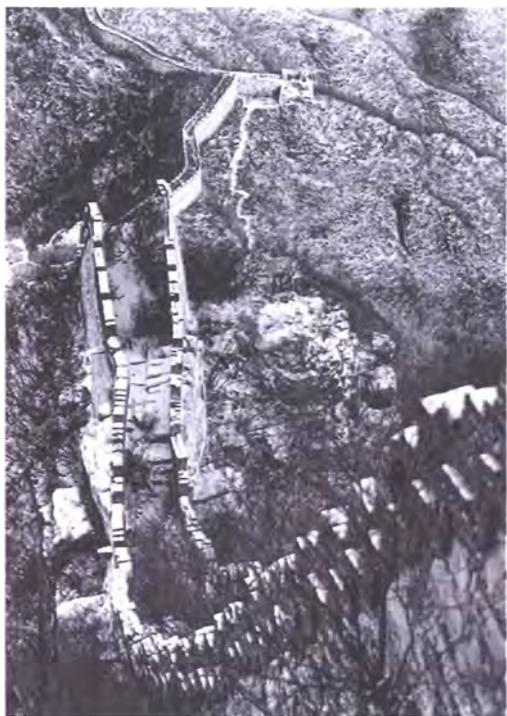
出现,宣府随即成为居庸之外直接护卫陵寝、京师之要冲。南山防线位于延庆之南、军都山之北缓坡地带,南部山脊之上为昌镇长城,关沟贯穿南北,居庸关坐落其间,八达岭口封挡其前。宣镇岔道城与蓟镇八达岭口毗邻,相距仅二三里。“南山一带,实为居庸一带内口屏蔽”。^⑬长城内侧为明陵、京师。若居庸一带失守,蒙古兵骑可于几个时辰内直奔北京城下,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南山内拱京陵,为藩篱重地”。^⑭嘉靖三十六年(1557),总督宣、大、山西侍郎杨顺亦称“南山诸隘口系虏必窥之路”。^⑮因此这道防线为防守重地。

关于战线南移,以前有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述。《论明代北方边防内移及影响》^⑯论述边防南移是明永乐年间为抬升新都北京的政治军事地位而有意为之,且撤藩王守边而令边将守边,以免重蹈建文“靖难之役”覆辙。《明代嘉靖初年北虏寇边与宣大长城战防之探索》^⑰详细考述了当时的蒙古南侵及明将领所采取的战略对策。明初边防内移的策略确属有意,但明中后期却显示了这一策略所贻后患,明廷已无强大的军事实力再向北扩充,因蒙古军队的不断南侵,布防的力量只集中在内边,以作护关缩守之计。

同是在庚戌之变后,因俺答入侵,侵犯明帝陵寝,为护帝陵,嘉靖三十年(1551),特于蓟镇别设昌镇,且对黄花路着力修建,连接边墙。此后隆庆、万历初年间,大量修筑城堡、敌台及边墙。规格多为一等、二等包砖砌石边墙。而北线的宣府东路及南山多是土边。这也从形制的区别证明了南线内防的重要。

2.层层防御、内外结合。

北京结是北京地区几条长城防务形势的缩影,因此集中体现了蓟、昌、宣三镇的布防策略。从布防的总体格局来说,北京结向西延伸出的三条防线宣镇东路、宣镇南山、昌镇黄花路即形成了三道南北遥相呼应的屏障。宣镇东路为外边,直接临敌,山河并险;昌镇为内边,深切腹地,以墙、堡疏



北京结向南俯视

夷。内、外边于北京结相交,形成严整的布防格局。外线宣镇东路是北京的大北门,外扼险要,南山又是内护京陵的重要屏障,昌镇黄花路东至黄花镇,西迄镇边城,直逼陵寝,如同左右翼之卫腹心。一旦失守,京师不保。陵后南山防线之重镇柳沟南控长陵,北镇独石口,东邻四海冶,西临岔道城,又若左右腋之擎后背。翁万达即主张:“内边之修,外边之筑,建议并守,不惮劳也”。^⑤有了这样严密的防御体系,可以分层抵御外敌。

3. 因形制胜、凭据要隘。

北京结长城基本是凭据自然地形修建,以险为障,占据要隘,连成防线,以收易守难攻之效。北京结临近的火焰山地理位置即相当重要:“山当宣、蓟、昌平之要道,登其巅可以望远。……嘉靖中督臣翁万达言:‘黑头山至密云城百五六十里。若为直垣相属,则密云西南至居庸数百里之边皆腹里地矣。’”占据险要之地设防,可依险而节省兵力。嘉靖二十八年(1549)四月,总督宣、大尚书翁万达奏书:“拟于东路镇南墩

与蓟州所属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筑墙仅三余里,可以省百数十里之戍兵。”^⑥明成化二年(1466)七月,吏部郎中刘文上疏说明四海冶及其附近隘口的军事重要性:四海冶之“镇南墩,南接腹里。又一小墩,……上墩一目,只见京畿。”建议修垒其紧要隘口,“则于御守之备,不为无辅。”^⑦2006年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延庆文物管理所共同对火焰山明代营盘遗址进行了清理,可为当时于此地驻防之实证。^⑧

4. 重镇连接、各路互援。

北京结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附近交叉的防线使得各路军事重镇可以贯通呼应,遇有紧急敌情可以互相援助。如“隆庆二年(1568)总督方逢时请筑北路龙门所外边,起龙门所之盘道墩,迄靖虏堡之大衙口”,使得“北路之兵,由此以入援南山,东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独石”。^⑨这里虽不是在北京结的位置,但当时长城各路防线的军事策略由此可见一斑,即各防线战备必然相互贯通,互相支援。宣镇四海冶与昌镇黄花路两大重镇因接界密切相关,乃唇齿相须之地:“惟四海冶内抚属夷,外御强虏,黄花镇后当潜开一小径与四海冶通,以便报警。”^⑩在这种军事互援的思想下,南山之柳沟、榆林两协也进行调整:柳沟居中调度;四海冶为左翼,以防陵东,与黄花镇策应;榆林为右翼,以防陵西,与镇边城策应。“有警则宣镇总兵堵御外边,陵后总兵防守内边,又与陵前总兵联络,于东西红山各口,天寿宛在中央,若泰山而四维之矣”。^⑪连墩、台、堡为墙,重镇相连以互援,正是长城这一军事建筑形式的重要特征。

注释:

①曾朝铭、顾巍:《北京地区长城航空遥感调查》,《文物》,1987年第7期。

②王玲:《有关北京长城的几个问题及对万里长城的认识与评价》,《京华旧事存真》(第二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③王宝骏:《关于“北京结”长城》,《怀柔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④刘兴:《明长城“北京结”》,《旅游》,1995年第1期,35页。

⑤曾朝铭、顾巍:《北京地区长城航空遥感调查》,第61页。

⑥(明)魏焕:《九边考》卷3《蓟州镇·疆域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6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2页。

⑦《明史》卷198《翁万达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5246页。《明史》卷91第2240—2241页《兵志·边防》内容同。

⑧(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56页。

⑨(明)刘效祖撰:《四镇三关志·建置考·昌镇沿革》,万历四年刻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1年9月,第2册,第59页、63页。《明史》卷91《兵志·边防》:“蓟之称镇,自二十七年始。”本文采用明人所撰《四镇三关志》的说法。

⑩(明)杨时宁:《山西宣大三镇图说》,《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明)孙世芳:《东路志总论》为“自火焰山至靖安堡一隅”,(清)李钟俾修,穆元肇等纂:乾隆七年《延庆州志》卷9《艺文》,第11页。靖胡堡,清改为靖安堡,俗称白河堡,今淹没于延庆白河水库。

⑪(明)杜齐名:《南山志总论》,乾隆七年《延庆州志》卷9《艺文》,第12页。

⑫(明)秦霖:《宣镇东路舆图说》,乾隆七年《延庆州志》卷10《艺文》,第9页。

⑬北京结非蓟镇与宣镇交界点,蓟镇、宣镇长城初不接界,其中有空,直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方由宣、大总督翁万达奏请填筑。据《明世宗实录》卷三四七,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己未”条:“总督宣、大尚书翁万达奏:‘臣往来相度,拟于东路镇南墩与蓟州所属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筑墙仅三余里。’”另北京结非蓟、昌二镇分界点。蓟、昌本一镇,至嘉靖三十年分离,以慕田峪正关台为界。《明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

⑭(明)吴亮撰:《集众思条十议以裨边政疏》,《止园集》卷10。

⑮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7月,第127页。

⑯⑰曾朝铭、顾巍:《北京地区长城航空遥感调

查》,第66页。

⑱(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21页。关于这里的“单边”,或许有观点认为是指形制结构上的单边而非有一定宽度的城墙。笔者认为应该还是层状上的单边,因为清代未对长城进行过修建,顾炎武看到的长城应该和现在看到的长城形制相同,根据目前的调查,慕田峪东蓟镇石塘路的长城不只是单边,也有很多一等边墙,与慕田峪以西城墙形制一样。

⑲北京结的四条支线长城并非一点辐射出的四条射线,而是两个长城体系相交的两个结合点分出的四条支叉。这两个结合点之间防线的完全闭合是在嘉靖二十八年宣、大总督尚书奏请将宣镇镇南墩与蓟州火焰墩接界中空,筑墙三余里。

⑳㉑㉒㉓《四镇三关志·建置考·昌镇沿革》。

㉔㉕㉖《四镇三关志·建置考·蓟镇沿革》。

㉗(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7“北直八·四海冶堡”,中华书局,783页。

㉘《明宪宗实录》卷三十二,明成化二年七月“翰林院提督四夷馆”条:“吏部郎中刘文陈边务:‘永宁四海冶旧设马营哨瞭一堡……今宜相度紧要隘口,修垒高监。’”

㉙《宣府镇志·乘障》记载:“东路:四海冶堡东自镇南墩起,西至永宁界止,地远一百里,共墩二十九座。”正德《宣府镇志》卷三《关隘》,南京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明代孤本方志专辑,第72页。

㉚《读史方輿纪要》卷17“北直八·柳沟营”,780页。

㉛《明会典》卷130《兵部·镇戍·各镇分例·宣府》,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1847页。

㉜《明世宗实录》卷三四七,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己未”条。

㉝《明世宗实录》卷四三三,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总督宣、大侍郎江东言”条。

㉞具体修筑情况为:“居庸东北,自岔道西抵龙爬山止,共隘口一十八处,长亘一百零三里五十步。自岔道东抵四海冶镇南墩止,共隘口一十二处,长亘一百三十里零四十步,东西共计二百九十五里,折九万一千八十步。每百五十步筑墩一座,每二十座空内筑小堡一座。通内地隘口,设卒守把。其隘口各量势修筑应添大石墙或虎尾小墙者。总计墩七百九座、墩房七百九间、小堡三十余座、大堡七座、岔

道城一座。”“(嘉靖)三十五年兵部侍郎江东疏请修筑南山联墩”文下注,《宣府镇志》卷10《亭障考》,《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第81页。

⑭《明世宗实录》卷四四九,嘉靖三十六年七月“丙辰”条。

⑮《明世宗实录》卷四七三,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癸亥”条。

⑯《明穆宗实录》卷十七隆庆二年二月“总督宣、大、山西都御史陈其学条上南山事宜”条。今所见岔道城——小张家口——柳沟城——二司——头司——营城——韩家口一带土边,便为当时修筑。

⑰《四镇三关志·建置考·昌镇沿革》。另据怀柔文物管理所提供的隆庆三年头道关东四楼修城碑、隆庆三年洼腰楼修城碑、隆庆三年渤海所修衙门纪功碑(慕田峪、贾儿岭、田仙峪、擦石口、磨石口、驴鞍岭、大榛峪、黄花镇、南冶口、大长峪口、小长峪口、本镇口、鸽子峪口、撞道口、西水峪石湖峪口)、隆庆三年大榛峪西一台修城碑、隆庆三年沙岭西台修城碑、隆庆四年黄花城修城碑、隆庆四年亓连口修城碑。

⑱(清)吴廷华修、王者辅等纂:《宣化府志》卷14《塞垣》,《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乾隆八年修二十二年订补重刊本影印,第287页。

⑲据长城博物馆提供的万历年间分修南山边垣题名碑。

⑳据万历七年黄花镇本镇关(头道关西二楼)修城碑、万历十七年亓连关修敌台碑、万历二十七年擦石口修城碑、万历三十三年西水峪修城碑、万历三十九年修石塘路大水峪磨刀石敌台刻石。

㉑据密云文物管理所提供的“万历六年延绥营造”戳印砖文。

㉒《明神宗实录》卷五六二,万历四十五年十月:“兵部覆蓟昌二镇修边工稿,自四十三年春防起至四十五年秋防止。”且怀柔文管所提供的现存长城施工碑记载了黄花路附近修建长城的情况:如万

历四十二年大榛峪修城碑、万历四十二年大榛峪西大楼修城碑、万历四十三年大榛峪西大楼北侧修城碑、万历四十五年黄花路箭扣子修城碑等。

㉓《明神宗实录》卷五六二,万历四十五年十月。另密云文管所提供的现存的长城施工碑记载了石塘路附近修建长城的情况:如万历四十三年修石塘路大水峪五座楼刻石、万历四十四年东水谷城堡志等。

㉔(明)孙世芳:《东路志总论》,乾隆七年《延庆州志》卷9《艺文》,第11页。

㉕《畿辅通志》卷70周宏祖之《宣府论》。

㉖《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先是正月间”条。

㉗⑳(明)杨时宁:《山西宣大三镇图说·南山总图说》。

㉘⑲《宣府镇志》卷10《亭障考》,第81页。

㉙《四镇三关志·夷部考·昌镇夷部·入犯》。

㉚《明世宗实录》卷四四九,嘉靖三十六年七月“丙辰”条。

㉛吴辑华:《论明代北方边防内移及影响》,《新亚学报》卷12,1980年。

㉜马楚坚:《明代嘉靖初年北虏寇边与宣大长城战防之探索》,《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10月,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㉝⑳《明世宗实录》卷三四七,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己未”条。

㉞《明宪宗实录》卷三十二,明成化二年七月“翰林院提督四夷馆”条。

㉟详见《延庆火焰山营盘遗址》,《北京文博》2006年第3期,第42-44页。

㊱(清)吴廷华修、王者辅等纂:《宣化府志》卷14《塞垣》,第287页。

㊲(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61页。

㊳《保邦十策》,《日下旧闻考》卷153《边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2465页。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隐于闹市的记忆

——记朝阳门外九天普化宫

陈 巴 黎

繁华的朝阳门外大街，西起朝阳门立交桥，东至东大桥，是朝阳区最重要、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朝阳门原名齐化门，曾是漕粮入京的重要通道。元代《析津志》载齐化门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明清时期，漕运继续得到发展，雍正、乾隆皇帝曾下令动用国库，铺设石道，保障运输的畅通。漕运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经济发展，大街两侧商铺林立，商旅云集，热闹非凡。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如今，以东岳庙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遗存，成为见证朝外大街悠久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

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朝阳

区作为商务中心区 CBD 的功能定位日益明确，朝阳区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又好又快”的目标引领下，朝外大街改造工程全面启动。一条以朝外大街为中心线，辐射朝外南北街，彰显商务、商业、娱乐的高档商业街区拔地而起。在高楼蔽日，霓虹幻彩的重重包围下，古建筑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考验。

神路街北的九天普化宫便是在拆迁风潮中有幸保存下来的明代古建。九天宫西邻东岳庙，斜对慈尊寺（俗称十八狱庙）。过去，这三座庙是朝外大街香火最盛的道观，庙期也都大致相同。每逢初一、十五，尤其是每年的农历三月下旬，赶庙会的香客人山人海。去东岳庙进香的，也必到九天宫和

十八狱庙。在人们的心目中，九天宫代表着天堂，十八狱代表地狱，东岳庙则是地府的审判机关。香客们在泰山神东岳大帝及各职能机关——七十六司前，将自己过去一年的善恶得失算算帐，顺便祭拜一下先人的亡灵。出来后，再去看看亡灵的归宿——吉祥幸福的天堂和阴森恐怖的地狱。庙里一通通形制各异的碑刻、一尊尊造型逼真的塑像，生动再现了中国人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的传统观念。各档香会也依着这个程序，先去东岳庙，再到九天宫、十八狱，才算完成了整套进香仪式。也有香会取名“三项圣会”，一个“顶”代表一座庙，“三项”表明三座庙都要拜。

据记载，九天宫建于明万历年间，主祀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属私建。庙内古树荫翳，环境优美。山门匾书“敕建九天宫”，宫内有北海天王殿、雷祖殿等大小殿宇 50 多间，供奉真武、雷公、电母等神像 72 尊。据东岳庙最后一位道士傅洞奎回忆，正殿雷祖殿雕像为悬山塑，分上下两层，依墙而上，气势弘伟。神像奇异，相传皆仿照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的雕塑法，堪称京城一绝。殿中供奉真武像，悬山正中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真武像为明代铜铸，体量高大，法相庄严。1955 年，东四区合作社为完成购铜任务，竟将重达 5 吨的铜像当成废铜烂铁，砸碎装进麻袋，准备运往永定门仓库熔化。后经举报，文物组出面干涉，铜像才没被送进熔炉，如今这些残片已无从查找。

九天雷声普化天尊，即雷祖，是道教雷神信仰体系的最高神统。据介绍，雷神崇拜最早源于古代先民对自然界雷电现象的畏惧，天人感应观念的产生又赋予雷神鉴别善恶、除暴安良的社会职能，成为主持天道的神祇。北宋末年，道教构造了以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为主神的一系列雷部诸神，形成一个庞大的道教神统——雷部。

关于雷祖究竟是谁，说法不一。据《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称，雷祖是浮黎元始天尊第九子玉清真王的化

身。也有说轩辕黄帝升仙以后成为雷精，主雷雨之神，封号雷祖。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则称闻仲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率领雷部二十四位催云助雨护法天君。

由于民间的推崇，雷祖信仰也被纳入官方祭祀系统，每到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雷祖圣诞，朝廷都要派遣官员进行祭祀，《明史·礼志》记载，“是日遣官诣显灵宫致祭”。庙里的道士则要念《玉枢宝经》，做法场，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

九天宫第一任住持林永诚，生平不详，是否与东岳庙道士有师承关系也无从考证。明清两朝，九天宫香火盛极一时，民间盛传建于唐朝，比东岳庙还要早，由此可见它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民国以降，九天宫香火逐渐衰败，为贴补庙里的开支，住持白景春将大部分房屋租给劳工、小贩，自己却住在了东直门内药王庙。到了 40 年代，九天宫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许多无家可归的贫民滞留在此，显然当时已经没能力做法事活动了。1952 年，九天宫被东郊区人民政府用作粮食仓库，归属民政局。同年 7 月，移交房地产管理局。建国后被北京市交电公司用作仓库，此时仅剩后殿。80 年代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2 年，在朝阳区委、区政府的协调下，市交电公司腾退九天宫，北京市文物局拨款进行修缮。作为主管部门，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恢复了殿前牌匾，制作了说明牌，将施工现场挖出的两通石碑重新归位。区政府协调相关部门拆除九天宫四周的违章建筑，搬迁商户，平整殿前绿地，修建休闲广场。2003 年东岳庙春节文化庙会，在九天宫月台上搭起露天舞台，表演传统曲艺，吸引了许多过往游客驻足观看，成为朝外大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管理部门也拟定了规划方案，计划以九天宫为大门，仿东岳庙古建規制，开辟北京民俗博物馆新馆。

2004 年，朝阳区昆泰集团动工修建越秀市场，欲将九天宫拆除。在文物部门和专家的强烈反对下，设计方案重新调整。经多方协调，古建算是原地保住了，却被遮挡

得严严实实,仅露出半边“脸”。为宣传造势,市场管理部门在建筑外墙挂满了鲜艳夺目的巨幅广告。为体现国际化,又在九天宫西侧立起一面超豪华电子屏幕。在如此严重的视觉污染下,曾被誉为朝外大街最亮丽风景的九天宫再次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北京地方文献关于九天宫的记载仅寥寥几笔,2002年在九天宫北侧工地挖掘出的两通石碑,为研究九天宫以及北京道教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一通是清顺治四年(1647)《敕修九天普化宫记》碑,另一通是顺治五年(1648)《御制玉枢宝经》碑。

《敕修九天普化宫记》碑阳、碑阴分别额书“敕建九天普化宫”和“九天圣会”,由此推断该碑由民间香会组织——九天圣会捐立。可惜碑身风化严重,刻字漫漶不清,碑文无法辨认。

《御制玉枢宝经》碑,双面刻字。碑文由三部分组成,起首为顺治帝御书序,大意是介绍雷声普化天尊的职守、诵读玉枢宝经的益处,以及刊刻经文的目的。第二部分是诵经的科仪要求,“凡诵经者切须斋戒,严整衣冠,澄心定气,叩曷演音,然后朗诵,慎勿轻慢,交谈接洽,务在端肃念念,无违随愿,祷祝自然感应”。随后是开坛前念的八大神咒:“净心神咒”、“净口神咒”、“净身神咒”、“安土地神”、“净天地”、“解秽咒”、“祝香咒”、“金光神咒”、“开经玄蕴咒”。最后是完整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记述的是雷祖向雷师皓翁讲道的经过,着重宣讲道教“至道”和“气数”两个概念。从内容判断,这块碑应属于刻经碑(后附碑文)。

儒释道三教都有大量的石刻经传世,最典型的要数北京房山石经。此举主要受到先秦以来神化典籍和文字思想的影响。道教称道经出自太上老君口谕,或由漂浮的云篆凝结而成,或通过扶乩接受神灵的启示。诵念经书也被当作一种修道方式,认为不但可以检束身心、与道合一、长生不

老,还可以获得驱邪避害,增福延寿等诸多现世报应。于是,念经不仅成为道士的必修课,还因为它的实用性、功利性,且简单易行,广为信众接受。顺治四年九天圣会捐刻碑上布满的会众名,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信众参与的广泛性。

诵经在成为信众谋求现世利益的手段的同时,经书也变成宗教势力控制世俗社会的一种权力象征。在宗教与封建帝制相互利用、相互需要的时代背景下,经书也被赋予了官方的属性。历史上,唐玄宗亲自为道德经注疏,明神宗在《武夷山冲虚观敕谕碑》中,公开饬令道士不得对道藏“褻玩损失”。经书的制度性和官方化成为界定正统道教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封建帝王在动用行政手段确立经书“法典”地位的同时,却始终对宗教保持着距离。

序文中,身为人主的顺治帝对诵读《玉枢宝经》的能效大加赞叹:“诵此经者而能变凶为吉,化疹成祥,感应之机,捷于影响,其功德信,不可以思议也”,对信众诵经这一宗教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支持。但在尊崇经典的同时,对宗教垄断经书的现象也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且直抒胸臆:“是经也岂特学道之士之所当知。”

顺治帝福临是皇太极第九子,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崇德三年(1638)生。《御制玉枢宝经》碑成于1648年,据此推算,立碑时顺治帝还是10岁的顽童,当时的朝政应该由其叔父多尔衮把持。所谓御制碑文,多半由朝臣代笔,宣达的旨意自然与朝廷如出一辙。

由皇帝御笔将经书公布于世,号召世人诵读,此举一方面打破了经书的神秘性、专属性,使其平民化、世俗化,让人人享有获得宗教知识的权力;另一方面,世俗化的同时,经书也被纳入世俗权力体系,划归封建帝王掌控的势力权限。于是,刻经与写经、造像一样,不单单是功德无量的善举,而且成为封建帝王拥有宗教和世俗双重权力的有效手段。难怪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道教生存的政治依赖性过大,以至于一旦

失去政治支持，就立刻失去了它在正统文化中的生命力。

九天宫现存碑刻，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如何存在和发展，以及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范本。但愿它不要在人们的视觉中隐匿后，又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附录)

御制玉枢宝经

世之论者谓阴阳相薄而为雷，是固然矣。然雷之震之威无不惊惧，一击之力无不摧折，非有神以司之焉能兹是哉。朕观玉枢宝经言玉霄一府总司五雷，而雷部诸神皆由储勳累行以致登庸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所以位上，真权大化者示由缝道酿功于千五百劫之先信乎，雷有神以司之也，且雷声普化天尊尝管广大愿，欲拯未来世。故凡世人五行九曜之不顺，沉痾痼疾之难痊，官符口舍之缠连，卜筑兴修之禁忌，婚娶产育之弗利，妖孽瘟疫之未除，与夫水火盗贼之害，害灾九横之厄，诵此经者而能变凶为吉，化疹成祥，感应之机，捷于影响，其功德信，不可以思议也。经曰：无闻未见即是真道，又曰：道者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盖示人以造道之阶欲其同芝高真，可以管天地之藏者矣。是经也岂特学道之士之所当知，使世之人皆是诵是持，则将渊默雷声而于道，岂不庶几也哉。兹重锲梓，故为序之。

大清顺治五年

凡诵经者切须斋戒，严整衣冠，澄心定气，叩曷演音，然后朗诵，慎勿轻慢，交谈接洽，务在端肃念念，无违随愿，祷祝自然感应。

净心神咒

太上台星，应变无停，驱邪缚魅，保命护身，智慧明净，心神安宁，三魂永久，魄无丧倾，急急如律令。

净口神咒

丹朱口神，吐秽除氛，舍神正伦，道命养神，罗千齿神，却邪卫真，喉神虎贲，炁神引津，心神丹元，令我通真，思神炼液，道炁

常在，急急如律令。

净身神咒

灵宝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鬼魄，五脏玄冥，青龙白虎，队仗纷纭，朱雀玄武，侍卫身形，急急如律令。

安土地神

元始安镇，普告万灵，岳渎真官，土地祇灵，左社右稷，不得妄惊，回向正道，内外肃清，各安方位，备守家庭，太上有命，搜捕邪精，护法神王，保卫诵经，皈依大道，元亨利贞，急急如律令。

净天地秽咒

天地自然，秽气氛散，洞中玄虚，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灵宝符命，普告九天，千罗答那，洞罡太玄，斩妖缚邪，杀鬼万千，中山神咒，元始玉文，持诵一遍，却鬼延年，按行五岳，八海知闻，魔王束首，侍卫我轩，凶秽消散，道炁常存，急急如律令。

祝香咒

道由心学，心假香传，香蒸玉炉，心存帝前，真灵下盼，仙旆临轩，令臣关告，径达九天。

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万炁本根，广修万劫，证吾神通，三界内外，惟吾独尊，体有金光，覆印吾身。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包罗天地，育养群生，受持万遍，身有光明，三界侍卫，五帝司迎，万神朝礼，役使雷霆，鬼妖丧胆，精怪忘形，内有霹雳，雷神隐名，洞慧交彻，五炁腾腾，金光速现，覆护真形，急急如律令。

开经玄蕴咒

天皇天皇，普化十方，无祷不应，无求不祥，酿阳酝阴，万古垂光，顺吾者亨，逆吾者亡，玉文宝篆，诵之吉昌，司命守护，不得隐藏，急急如九天普化玉清真王律令。

神霄雷祖帝，九天普化君，谈道跌九凤，持法骑麒麟，统摄圣岳将，掌令判雷霆，三辛逢初六，察人善恶情，祈福并度厄，称名诵宝经。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

(经文略)

(作者为朝阳区图书馆副馆长)

从历史遗迹看 北京国子监孔庙历史上的 两次大型修缮工程

邢 鹏

北京国子监孔庙始建于元代，在明代和清代都经历了多次不同规模的修缮工程。其中重要的修缮工程有两次：一次是明代正统八年至九年的工程，另一次是清代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工程。

一、明代正统年间的大修工程

据史料记载，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曾修缮国子监：“七月壬午，以修国子监，命监生暂讲肄于故都察院”，“八月乙酉，以营建国子监，遣工部尚书王登祭告先师孔子”。“十月丁未，修国子监大成殿圣贤牌位、祭器。”“十二月丁酉，营建国子监讫，遣祭酒李时勉致告先师孔子，工部尚书王登告谢司土之神。”正统九年英宗皇帝亲来国子监视察：“三月辛亥朔，上幸国子监”，并发布了一道《御制重建太学之碑》诏书以为纪念，碑文内容在《明实录北京史料》中有



图1 大成门下正统八年铜钟款识

全文记载^①。关于这次大修的原因有文献记载为：“先是，太学因元之旧。吏部主事李贤上言：国家建都北京以来，佛寺时复修建，太学日就废弛。举措舛错，何以示法天下？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从之。正统九年正月，太学成，上临视祇谒先圣，行释奠礼，退御彝伦堂，命祭酒李时勉进讲”^②。

目前遗留在国子监孔庙中的有明确纪年的属于这次修缮工程的遗物、遗迹共有两件：一是悬挂于大成门下的铜钟，一是位于大成门外东南的明代“御制新建太学之碑”及其碑亭。

铜钟，位于大成门檐下的外部西侧稍间内悬挂。钟正面有铭“大明正统八年月日造”(图1)。

明正统九年的“御制新建太学之碑”(图2)及其碑亭，目前位于大成门外东南。其内容即为前文所述《御制重建太学之碑》。其形式螭首龟趺，并建有御碑亭予以保护。其现



图2 御制重建太学之碑

在的位置与历史记载的原位并不一致:如考察目前仍保留在国子监与孔庙夹道中“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立石”的《文庙、国子监图》碑^③,在其图中孔庙部分的大成殿月台的东南找到了一座碑亭(图已残缺,所绘的碑亭也已残缺顶部)。再考察嘉靖三十六年(1557)编修的《皇明太学志》中的国子监与孔庙图象,该碑亭位置清晰可见(图3),与《皇明太学志》中“内墀东碑亭一座,正统新建太学碑树焉”^④的记载相符。可是到了清代,这座石碑及其碑亭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清代《国子监志》记载“英宗御制新建太学之碑:正统九年三月立。旧在大成殿东庑。乾隆三十三年重修文庙,移至大成门外东南,有亭”^⑤。此碑为螭首,螭尾斜交于碑顶。圭形碑额内为“御制新建太学之碑”八字双行阴文篆书。碑文为楷体,首书“御制新建太学之碑”,尾书“大明正统九年三月初一日”。由于历史原因,碑阳、碑阴部分被涂有墨迹及墨字。另外考察此碑之碑亭的建筑结构,笔者发现其四条抹角梁的两端与碑亭四面的明间柱头科斗拱相交处均露出了梁头(图4)。而这种技法在孔庙的十四座御碑亭中只有两例,除此之外就是与此

碑亭位置对称——大成门外西南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修文庙碑”。由于十四座御碑亭中除“御制新建太学之碑”外其它的建造年代都是清代:有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所以排除了这种露出梁头的技法是清代出现的新技法的可能性,笔者判断其应是明代的施工技法。故笔者推论这座御碑亭是随“御制新建太学之碑”一起迁建的明代建筑。如果推论成立,那么它将为人们研究明代建筑技法和建筑特征提供重要信息,也将推动对于孔庙历史的研究工作。

二、清代乾隆年间的大修工程

1、乾隆三十三年(1768)大修工程

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帝下诏重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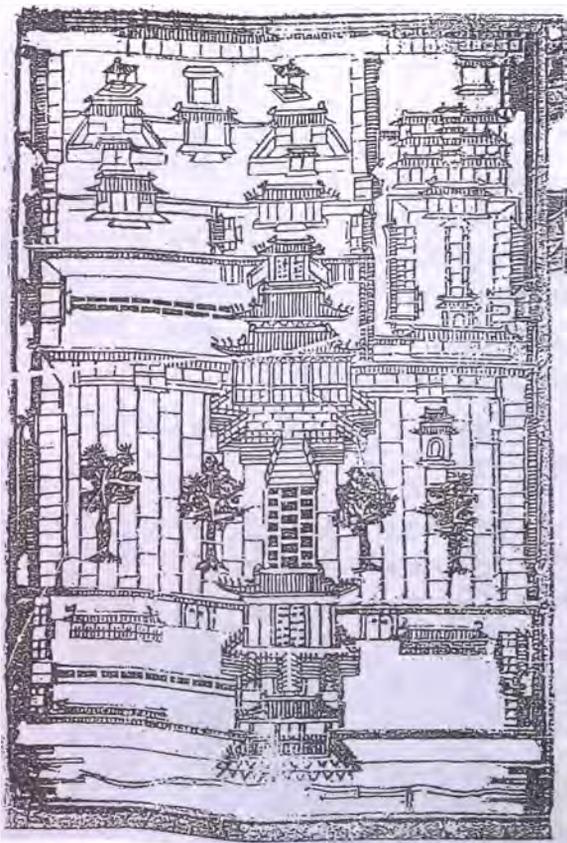


图3 《皇明太学志》书中国子监与孔庙图象

北京国子监孔庙^⑥。在这次修缮过程中有三项重大变化：一是改名活动，为原本无名的大门（今称先师门）增加“先师庙”匾额。将原称“庙门”的二门改名为“大成门”，将原称“先师庙”的正殿改名为“大成殿”^⑦。二是在重修的过程中给御碑亭换用黄色琉璃瓦^⑧。三是将原先位于大成殿月台外东南方的明英宗“新建太学之碑”及其碑亭移至大成



图4 明正统御碑亭明间柱头科斗拱

门外东南角，并且以先师门至大成门一线为对称轴，在与之对称的位置设置“敕修文庙碑”并采用仿明代建筑的技法修建了其碑亭。随着修建这两座东西对称的碑亭工程的完工，原本平淡的“先师门——大成门”一线凸显了出来。而原本重要的“持敬门——大成门”一线被淡化了。

2. 乾隆三十三年大修工程的意义及其影响

在明代，北京孔庙是附属于国子监（国家级教育机构）的礼制性建筑，祭祀孔子的活动很少有皇帝参加。所以只有祭祀时才使用的“先师门——大成门”一线并不如日常使用的“持敬门——大成门”一线重要。而“持敬门——大成门”一线恰恰反映了孔庙从属于国子监的建筑关系，因而在注重礼制的明代被标注于图中（见图3）。有清一代，祭祀孔子的主祭者除了“有司”之外还增加了皇帝。为了显示皇帝的地位，乾隆帝于乾

隆三年（1738）以尊孔的名义下诏将大门（先师门）、二门（大成门）和正殿（大成殿）改易黄琉璃瓦^⑨。在殿宇改易黄琉璃瓦及后来在“先师门——大成门”一线两侧对称修建御碑亭等活动的综合作用下，原来“先师门——大成门”一线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而“持敬门——大成门”一线的地位则下降了。更加巧合的是1904年清政府下令取消科举取士

制度，但仍保留孔庙作为国家级祭祀场所。随着国子监的关闭，持敬门也关闭了，“持敬门——大成门”一线也就不再使用了。所以自民国以来的著录多将孔庙和国子监（太学）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建筑来记载。近年来人们一谈论起孔庙的建筑艺术必言其具有“中轴线对称”的特色，殊不知原来它有一主（“持敬门——大成门——大成殿”）一辅（“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两

条建筑轴线。笔者以为造成后人形成错误认识的原因是乾隆皇帝为了突出皇权、巩固少数民族对汉族的统治而采取的一项以尊孔为形式、以改变汉民族文化内涵、使汉民族忘记自己历史的本来面目、服从其统治为目的而进行的政治阴谋活动。



图5 东庑之绿琉璃釉板瓦款识



图6 西掖之绿琉璃釉脊瓦

三、2005 年底对孔庙的大型修缮工程及调查中的所见

因多年来孔庙未进行过大型修缮,致使诸多殿宇的木结构构件均有不同程度的腐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在 2005 年底以来的大修工程中对东庑、东掖、西掖等殿宇多采用了落架大修的修缮方式。随着砖瓦的落架,笔者也看到了许多平时难得一见的现象。

在东庑(即东配殿)的修缮过程中,在落架的绿琉璃釉板瓦中笔者见到了有些板瓦的凹面无釉处有长方形单框双行阴文楷书“雍正八年琉璃窑造斋戒宫用”戳记(图 5,“斋”字比“雍”字高一格)。这些板瓦现除首都博物馆留藏了数块以外多数仍被复用于东庑的屋顶。

在西掖(即西配殿与大成殿之间的房屋,曾用作首博资料室)的修缮过程中,在落架的绿琉璃釉脊瓦的一端,笔者见到了用毛笔朱书“文庙庑”的字样(图 6)。后在东掖的落架脊瓦中也见到了同类脊瓦。推测其为按等级制度要求订制的。这些脊瓦今都已经复位继续使用了。

另外,在此次大修工程开始前,笔者于

调查工作中在大成殿月台东南角的多块铺地方砖(边长约 52.5 厘米见方)上见到长方形双框单行阳文扁字“口口窑细泥尺七”戳记(图 7)。

上述这些砖瓦上的款识为日后研究孔庙的建筑原料来源等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在文献中见到的孔庙建筑遗迹

北京国子监孔庙作为国家级祭祀孔子的礼制场所,在历史上不乏文献记载:一类是其自身的志书,如《皇明太学志》、《钦定国子监志》等。一类是关于北京名胜景物的志书,如清代的《日下旧闻考》、民国的《旧都文物略》等。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

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孔庙的古迹,如先师门的门板样式、大成门左右的两个门和墜坎等。

先师门又称棂星门,坐落在孔庙建筑轴线的南端——大成门外正南,南向,是孔庙的外门。《春明梦余录》称之为外门:“寻建新庙于故址。中为庙,南向,……正南为庙门。

门东为宰牲亭、神厨;西为神库、持敬门;门正南为外门……”^⑩。而在《日下旧闻考》引《大清会典》中则称之为街门:“先师庙在安



图7 大成殿月台东南角的铺地方砖



图8 《旧都文物略》中孔庙先师门的老照片

定门内太学左,南向。街门西为持敬门,西向。大成门崇基石栏,前后三出陛……”^⑩。由此足见此门在明代直至清乾隆前期地位都不高。而且此门在清乾隆三十三年之前一直没有悬挂书写其名称的匾,称之为先师门是乾隆三十三年以后的事^⑪。目前所见的先师门主体建筑为黄琉璃瓦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屋宇式大门,其下有青石台基,前后三出陛的礅礅踏垛。屋顶岔脊各有五个小兽。中柱位置有木门三:中间的较高,两侧较低。门板原为栅栏门(图8)^⑫,后改为板门。今只存有中间一门,两侧的均已经拆改(分别作为首博的售票处和传达室),但仍能从其遗留下的门簪辨别出昔日



图10 孔庙瘞坎位置(应在四棵树之间)

琉璃瓦庑殿顶、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的屋宇式大门,启门三。前后三出陛的正中一组均为垂带式踏垛,而东、西两侧均为礅礅踏垛。据记载前后三出陛“阶各十有四级”^⑬,



图9 大成门主体及左右小门

而从民国年间的照片看来就已如今日所见了^⑭。屋顶四条垂脊前端各装饰有七只小兽代表其建筑等级。位于屋宇中柱位置的明间及两侧次间均有实踏大门,每扇门板上都有横九纵九的81颗门钉。在主体建筑的东、西各有一个小门:青石台基,前后为礅礅踏垛,屋顶与两侧配殿相连,绿琉璃瓦剪边。其门板现已无存,但从屋檐下的痕迹以及屋顶内部的结构可以推定木门原在南侧檐柱位置^⑮。这两个小门是供太学生等普通人进出孔庙用的,是大成门的附属建筑,虽然它们以往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但文献中仍有所记载,如“(大成门)左右各一门”^⑯。也有学者称之为“角门”^⑰。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大成左门(在东)和大成右门(在西),它们与主体建筑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大成门”(图9)。

孔庙是作为国子监的礼制性建筑存在的。礼制性建筑包括两方面:建筑物和礼制活动空间。孔庙的礼制活动空间包括大成殿月台、大成殿前甬道和大成门下的钟鼓、燎炉与瘞坎等。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祭祀活动大

的情况。在看到这张历史照片之前笔者一直疑惑:为何许多外地文庙的大门都是牌楼式门,而且门板为栅栏式,独国子监孔庙的为屋宇式用板门呢?至此方才领悟:使用屋宇式大门是因为其属于国家级祭祀场所,不同于各省的地方学宫,而使用栅栏式门板说明其在作为整体的孔庙建筑群中的地位很低——非正门。

大成门是国子监孔庙建筑轴线上的第二道门,南向,它是国子监孔庙的正门。其主体建筑为崇基石栏、前后三出陛、单檐黄



图 11 天坛祈年殿前的瘞坎

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举行祭祀仪式,后一个阶段是向受祭者献上祭品。前文所述的月台、甬道都是举行祭祀仪式的空间,在举行祭祀仪式时是有钟鼓奏乐相伴的。而举行献祭活动的空间是燎炉与瘞坎。燎炉位于西庑南端、大成右门内西侧的列舍门前,是一座用绿色琉璃砖瓦砌建的仿木结构建筑,至今仍在。而“瘞坎”目前已经不见了。文献记载为“丹墀西为瘞所”^⑨,或说“西庑南燎炉一,西北瘞坎一”^⑩。可见瘞坎的位置应该与燎炉相对称——置于西庑的北段地区前方。而调查发现,在西庑北段地区前方、御碑亭以北、西掖的门前,正好是一小片由东、西、北三侧有古树环抱的空地(图 10)。结合文献与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历史上这里确实曾有一座瘞坎。因目前的地表已经铺砖,日后如有动土工程时希望能加以注意。其形式可能类似天坛祈年殿前瘞坎形式(图 11),只是级别也许要低一些。

五、在调查孔庙建筑群过程中的一点心得

有的同志在论述北京国子监孔庙的建筑特色时将孔庙建筑群与北京故宫(紫禁城)建筑群相比较,并认为孔庙也存在“前朝后寝”。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均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孔庙建筑群与故宫建筑群的建筑性质根本不同,所以两者没有可比性:从用途上看,故宫属于北京皇城建筑群中的一部分,是为活着的人营建的,属于皇城中的实用性建筑群;而孔庙是附属于北京国子监的,是为纪念孔子而建的,属于国子监的礼制性建筑群,可见故宫和孔庙的性质根本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应该将北京皇城建筑群与北京国子监建筑群进行比较,而皇城中的太庙与国子监中的孔庙都分别属于其中的

礼制性建筑群,都是为纪念其各自主体建筑部分(紫禁城和太学)的主要使用者的祖先而建造的——太庙用于纪念皇帝个人的家族祖先,国子监孔庙用来纪念太学生们共同的人文祖先孔子。

另外,因国子监“崇圣门主体建筑——崇圣祠大殿”的建筑轴线与“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一线的建筑轴线相重合,所以许多人误以为崇圣祠院落



图 12 大成殿北的随墙门的南侧

是孔庙建筑群中的一部分,而将其称为孔庙的“后院”,称“先师门——大成门”院落为前院、称“大成门——大成殿”院落为中院,进而得出了“前朝后寝”的结论。实际上孔庙只有内院和外院之分,并无前、中、后之分;因为崇圣祠院落并不属于孔庙的一部分,而是与孔庙一样都附属于国子监。

这一认识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得出的：一、崇圣祠院落在于国子监营建之初并不存在，这里原是一片空地，建筑物是在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修建的^①，原名启圣祠。所以这些建筑物并不能体现人们最初营建国子监时的整体设计思想和营建理念。二、即使在营建了崇圣祠院落之后，它也不是作为孔庙建筑群的扩大部分存在的。这又表现在多处细节上：首先，孔庙院落和崇圣祠院落各自有名称。其次，孔庙院落和崇圣祠院落之间有一道院墙划定和区分了各自的范围，而且这两组建筑群都有各自独立进出院落的门和道路。古时要进入孔庙和崇圣祠都要先进入太学，从持敬门进孔庙，而经太学与孔庙之间的夹道（今十三经碑林）从一个西向的小门楼（今仍存，已关闭）才能进入崇圣门外的院落；而孔庙院落和崇圣祠院落建筑设计 and 布局上又十分相似：孔庙的正门是大成门（主体建筑附带左右两小门），崇圣祠的正门是崇圣门（主体建筑附带左右两小门）；孔庙的主体建筑是带月台的大成殿，崇圣祠的主体建筑是带月台的崇圣祠大殿；在《皇明太学志》的示意图中又分别标记了大成门外和崇圣门外的东西向道路。再次，传统古建筑的对开式大门的门板部分都是向建筑物内部打开的，所以凭借这一特征即可分辨建筑的“内”、“外”。在大成殿北的东西方向的院墙上有一个随墙门（图12），现在的人们都通过这个门进入崇圣祠院落。而这个门是向南打开的，这说明它只是孔庙的一个后门，进而说明人们在观念上把此门以北的崇圣祠外院看作是孔庙范围以外，并没有把崇圣祠院落看作是孔庙的后院。通过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崇圣祠院落和孔庙院落同属于国子监，两者之间不存在“前朝后寝”的关系。

以上是笔者在调查北京国子监孔庙时的一些收获，期盼读者、方家指正。

①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全四册）》（二）：正统777、778、790、818、819条。北京：北京古

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138-144页。但书中记载诏书的时间为“三月癸丑”，与孔庙石碑文物自身碑末记“大明正统九年三月初一日”有出入。

②《日下旧闻考》引《明典汇》。（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版，1101页。

③（清）文庆、李宗昉等：《国子监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2000年3月，1140页。

④（明）《皇明太学志》，北京：国家图书馆保存本阅览室藏品，编号：2002 G649.29/53。

⑤⑦⑧⑨⑩⑪⑫《国子监志》，933页、52-53页、52页、49-51页、37页、42页。

⑬乾隆三十二年三月立“敕修文庙碑”，928页。

⑭（清）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92年12月，287页。

⑮《日下旧闻考》引《大清会典》，1096-1097页。

⑯乾隆三十三年，谕内阁：修葺文庙，现届落成，太学规模，式昭轮奂。惟门题殿榜尚应详考彝章，用申景仰。向来正殿称‘先师庙’，二门曰‘庙门’，而大门未有书额，盖沿明代旧文，未加釐正。夫庙门之号，于礼经所称祖庙既涉嫌疑，而先师庙额揭诸殿楹，名实尤多未称。应于大门增先师庙额，其正殿改为大成殿，二门改为大成门，庶符合典定制。”见《国子监志》卷二，52-53页。

⑰汤用彬：《旧都文物略》，1935年12月，“技艺略”，4页，图六。而清乾隆年间的《孔庙、国子监全图》中所绘的似乎是板门。王秋方：《〈孔庙、国子监全图〉考》，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1期，128-129页及彩色插图。

⑱汤用彬：《旧都文物略》“坛庙略”，13页，图二十三。

⑲清乾隆年间的《孔庙、国子监全图》中所绘也是如此。王秋方：《〈孔庙、国子监全图〉考》，128-129页及彩色插图。

⑳《国子监志》，37页。《日下旧闻考》引《大清会典》，1097页。

㉑齐心：《北京孔庙》，文物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7页。

㉒（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90页。

㉓《日下旧闻考》引《大清会典》，1097页。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文物保管员）



——从嘉庆《重修皇史宬记》说起

高智伟

皇史宬位于今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大街，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库。其总面积约有 2000 多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皇史宬门、正殿、东西配殿及御碑亭等。

在御碑亭中，有一块清嘉庆皇帝御制《皇史宬碑》。碑高约 500 厘米，宽约 130 厘米，方首、方座均浮雕变形云纹。碑额篆书“御制”，首题楷书“重修皇史宬记”。碑身正面为汉字，背面为满文，由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颙琰撰文并书丹。由于在明嘉靖年间皇史宬建成及隆庆年间修缮时，都没有立碑以记其事，因此嘉庆皇帝御制的这块碑就成为皇史宬内有关其自身的唯一碑传资料，也是研究皇史宬的重要资料。本文拟从此碑谈起，借助史料将皇史宬始建、修葺、

管理及保存档案情况做大致的梳理，敬请方家指正。

此碑的碑文拓片收录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碑身拓片阴、阳均高 216 厘米，宽 98 厘米；额均高 34 厘米，宽 28 厘米。

现录碑文如下：

“重修皇史宬记

皇史宬建于前明嘉靖年间，藏洪武以来御笔实录。四周石室中藏金匱，具有深意焉。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因其旧制，恭藏实录、圣训、玉牒，一脉相承，万世永保，猗欤盛哉。正中石室内石台尊藏五朝实帙，兹恭编皇考高宗纯皇帝圣训三百卷、实录一千五百卷告成，琅函充积，振古烁今，诚未有之盛典



修缮中的御碑亭(《重修皇史宬碑》即在其中)

也。石室围墙及黄瓦历年既久,不免风雨剥落,爰命所司量加修葺,红垣画栋,焕然一新,取吉恭奉圣训、实录全部分贮金匱,入室尊藏,而旧贮玉牒敬移于景山寿皇殿之东西室。用抒诚敬而昭法守洪,惟皇考继列祖之鸿猷,开亿龄之景运,御极六十三年,久道化成,丰功大业,笔不能述,旷古未闻。金匱排列石台较五朝倍之,予小子瓣香九扣瞻仰,感慕之诚里实不能已,系以铭曰:地建前明,相因旧制。受命自天,大清万世。石室敬藏,列祖统系。暨我高宗,久敷仁惠。文德武功,上蟠下际。宝笈琅函,千八百计。金匱瑶台,巍焕壮丽。惟予小子,殚心绍继。竭力守成,夙夜自励。殷鉴匪遥,苞桑是系。安益求安,永延带砺。敬告后人,引长勿替。

嘉庆十有二年岁在丁卯长至月御笔”

一、初建皇史宬及其最终規制

按照碑文所述,“皇史宬建于前明嘉靖年间”。《明实录》中记载其最初被称为“神御阁”,主要的作用是供奉列祖列宗的御容及实录等。

神御阁的兴建是在嘉靖十三年(1534)七月,“先是,上谕内阁,《祖宗神御像》、《宝训》、《实录》,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再以坚楮书一总作石匱藏之。乃议建阁尊藏之,以郊建罢,至是辅臣张孚敬申前议请重书训录。上乃命内阁同在工诸臣视建造神御阁地于南内,上亲临定命制如南郊斋宫,内外用砖石围甃。阁上奉御容,阁下藏《训》、《录》。又以石匱夏月发润,改制铜匣。”^①神御阁

动工之前,嘉靖帝“預告太庙世庙,十七日兴工,遣武定侯郭勋于工所行礼。命吏部尚书汪紘兼兵部尚书总督神御阁、启祥宫等处大工兼管军士。”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神御阁建成,嘉靖将其“更名皇史宬,专藏训录。其列圣御容别修饰景神殿以奉之”。^②《明会典》中对此进行了补充:“嘉靖十五年,改世庙正殿曰景神殿,寝殿曰永孝殿,奉藏祖宗帝后御容于其中。”崇祯年间进士孙承泽所著的《春明梦余录》中这样描述:“皇史宬在重华殿西,建于嘉靖十三年,门额以史为叟,以成为宬,左右小门曰黼历,以龙为黼,皆上自制字而手书也。”

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明朝政府对

皇史宬进行了一次修缮。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六月,又增添了皇史宬牌、皇史门牌、龙历左门牌、龙历右门牌等匾额。^③

入清以后,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恭送高宗实录、圣训尊藏皇史宬之前,因其“石室围墙及黄瓦历年既久,不免风雨剥落”,才重新进行了修缮,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规模。

今天的皇史宬,正殿“皇史宬”建筑在2米高的台阶上,外形为宫殿式建筑,红墙黄瓦,金碧辉煌,但在结构上与众不同,殿面宽九间,庀殿顶,黄琉璃筒瓦,脊、大吻、顶部装饰的垂兽、仙人也都是用黄琉璃砖烧制的,墙身砌以灰色磨砖,厚达5米,裙肩部分是采用汉白玉雕成的须弥座,额枋、斗拱、门、窗也都是用洁白的汉白玉雕成,额枋上施以描金旋子彩画,正面开五个门,门分两层,外层为实踏大门,内层为朱红隔扇门,东西山墙有两面对开的窗子,整个建筑全部为砖石结构,台基四面设有滴水龙头,围以汉白玉栏杆,望柱头上浮雕翔凤盘龙,台南有八级垂带踏跺,中间为浮雕双龙戏珠的御路。殿内屋顶为拱券式,没有梁、柱,故称“无梁殿”。地面铺设浮雕海水游龙的汉白玉须弥座一个,高1.2米,须弥座上放置着152个收藏档案的鍍金雕龙铜皮樟木柜(即“金匱”)。柜高1.31米,宽1.34米,厚0.71米,这种建筑形式和内部设置,不仅能防火、防潮和避免虫咬鼠伤,而且能经受数百年的风雨侵蚀。

二、皇史宬中存放档案的内容

前面提到,皇史宬兴建之初定名为神御阁,不仅要存放《实录》、《圣训》,还要供奉祖宗御容像。那么为什么要以神御阁名之呢?

在元代,安放帝王御容的场所被称为神御殿,其“旧称影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纹绮局织锦为之。”^④元文宗即位后改称神御殿,因为其中安置有帝王织造画像,又被称为御容殿。嘉靖帝命人建造神御阁,要尊藏

《祖宗神御像》,应当与元代的神御殿功能类似。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断,明代最初并没有专门收藏《祖宗神御像》及《实录》等的专门地点,到嘉靖时才正式建造神御阁用于贮存?

1、明代存放内容

神御阁建成后,嘉靖帝却将其“更名皇史宬,专藏训录。其列圣御容别修饰景神殿以奉之”。由此以后,这座更名为皇史宬的建筑就成为保存列朝《实录》、《宝训》的专门地点。“中贮列朝实录及宝训,每一帝山陵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图,正本贮此。实录中诸可传诵宣布者曰宝训,宬中四周上下俱用石甃,中具二十台,永陵定陵各占二台。”^⑤

既然皇史宬是专门保存列朝《实录》的地点,那每位皇帝的实录修成后进存其中的仪式也是非常隆重。以万历年间一次进奉实录的仪式来看:“万历五年,世祖实录成,续定进仪。设宝舆、香亭、表亭于史馆前,帝袞冕御中极殿,百官朝服侍班。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朝服至馆前。监修官捧表置表亭中,纂修官捧实录置宝舆中,鸿胪官导迎,用鼓乐伞盖,至会极门下阶,至桥南,由中道行。监修、总裁等官随表亭后,由二桥行至皇极门,实录舆由中门入,表亭由左门入,至丹墀案前。监修官捧表置于案,纂修官捧实录置于案,俱侍立于石墀东。内殿百官行礼迄,帝出御皇极殿。监修、总裁等官入,进实录,进表俱如永乐仪。次日,司礼监官自内殿送实录下殿,仍置宝舆中,用伞盖,与监修、总裁官同送皇史宬尊藏。”^⑥仪式非常隆重、庄严,可见皇帝对实录的重视。

在明代,皇史宬中除了存有皇帝的实录及圣训之外,还存有一些其它的档案资料。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四月,就“录《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进藏皇史宬”^⑦。将一些儒家的经典都抄录进存,也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视,看重其对巩固统治、禁锢人民思想的作用。另外,也是在嘉靖年间,“(文渊阁)灾,书移

通集库及皇史宬”^⑧，这样看来，皇史宬中还暂时保存过文渊阁中的部分图书。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出现。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上御皇极门内殿，大学士顾秉谦等进《三朝会典》（《春明梦余录》作《三朝要典》），百官致词称贺，上命送皇史宬收藏。”^⑨而天启年间正值魏忠贤权势极度膨胀之时，这部《三朝会典》也正是在魏忠贤的授意之下编纂的。因此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在铲除魏忠贤与客氏专权集团势力的同时，认定“要典者，魏氏之私书”，命“将皇史宬内原藏一部取出毁之，仍传示天下各处官府学宫所有书板尽毁不存”。^⑩

有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那就是《永乐大典》是否在皇史宬中保存有副本？《春明梦余录》记载：“永乐五年十一月告成，凡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装成一千九十五本，各以韵为类，赐名永乐大典，贮文渊阁，副本贮皇史宬。”《日下旧闻考》认为此条记载的原意是《永乐大典》后来才藏于皇史宬中的，而现在有关皇史宬的介绍中也说其中藏有《永乐大典》的副本。但是朱彝尊认为“列朝实录宝训不下数千卷，若永乐大典一书多至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皆藏诸皇史宬，不与焉。”^⑪

另外，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昭槿为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后，曾参加过奉迎高宗实录到皇史宬的仪式，他在《啸亭续录》中记载：“余于丁卯冬奉迎纯皇帝实录，曾一至其地。尝闻徐昆山先生述闻李穆堂侍郎言，其中藏全份永乐大典，较今翰苑所贮者多一千余册，盖即姚广孝、解缙所修初本，缮为精工，非隆庆年间誊本之所及也。惜是日匆匆瞻礼，不得从容翻译，未审是书尚存与否也。”高宗纯皇帝即为乾隆皇帝，丁卯年即为嘉庆十二年（1807年），也就是《重修皇史宬记》碑所立的时间。作为皇族的他也只是听闻此间存有《永乐大典》而“未审是书尚存与否”，有两种可能：一是确实曾存放过后转移他处，二是受明人的记载影响。

笔者认为，明代实录、圣训的数量已经

很多，还有文渊阁的部分图书存放于此，如果再加上二万多卷的《永乐大典》，可能已经超过了皇史宬的储存能力，故存放在此的可能性不大。

2、清代存放内容

清朝入关，定鼎燕京以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前明的制度。清代的《实录》、《圣训》等依旧保存在皇史宬中。为了使皇史宬中有足够的空间存放本朝的实录等，对于原先保存其中的明朝实录、圣训，清政府将其移至他处保管：“其旧存明实录，移贮内阁书籍库”^⑫。

根据清朝的礼制，“纂修实录、圣训，择吉进呈。帝御殿受书，王公百官表贺。玉牒、本纪次之”。但最初的时候，实录是藏在皇宫大内的，而且与圣训不是同时进呈。“雍正中，圣祖实录与圣训同进，后以为常。乾隆间，定实录、圣训归皇史宬”^⑬，至此清代的实录等才开始在皇史宬保存。

同明代一样，清朝进呈实录的过程也很隆重庄严，以康熙十一年（1672年）进奉世祖实录的过程为例来看。“前期一日，太和殿陛东设表案，阶下列实录案。至日具卤簿，陈乐悬，监修官奉表陈表亭，纂修官奉实录陈彩亭，王公百官齐集行礼如仪。校尉分异香亭、彩亭出中道，表亭由左，监修各官从至太和殿丹墀，监修等奉实录与表分陈案上。帝御殿，鸿胪官奏进实录，乐作。礼部官举实录案自中道升，至殿门外，帝与座，乐止。举案人，乃坐。设案保和殿正中，监修等立阶下齐班，赞‘跪’，则皆跪。赞‘进表’，宣表官跪宣。毕，乐作，众官三跪九叩，退立，乐止。众复跪，宣表官代奏致词云：‘某亲王臣某等暨文武群臣奏言，惟世祖皇帝神功圣德，纂述成书，光华万世，群臣欢忭，礼当庆贺。’鸿胪卿宣制答云：‘世祖皇帝功德配天，实录纂成，朕心欢庆，与卿等同之。’宣讫，行礼如初。赐茶，俱一扣。驾还。监修等奉实录至乾清门，交送大内，退。”^⑭

与明代的过程相比，清代进实录的过

程要稍显繁琐一些,多了百官致辞、皇帝致答的内容。略有不同的是,康熙时的实录还是进呈大内,并不是送往皇史宬尊藏。

在实录、圣训之外,玉牒也是皇史宬所保存的重要皇家档案。玉牒就是清朝统治者的家族谱系,每十年修纂一次,详悉记录了皇室家族中每个人的身份、辈份、爵位等情况。每当玉牒修成以后,“总裁王大臣率提调以下官陈玉牒于彩亭,至太和殿阶下。提调以下官奉玉牒诣中和殿,陈于黄案。总裁王大臣等行礼毕,奉玉牒诣乾清门授内监,进呈御览。俟内监奉出,王大臣率提调以下官奉设彩亭,诣皇史宬行礼尊藏。”^⑤不过玉牒在皇史宬中保存的时间比较短暂,嘉庆十二年(1807年),《清高宗实录》及圣训修纂完成,在进藏皇史宬之前,嘉庆帝下令将皇史宬中“旧贮玉牒敬移于景山寿皇殿之东西石室”,可能从此之后,玉牒再也没有在皇史宬中存放,而是保存在景山寿皇殿。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在清代实录存放的问题上,有人曾提出不同的看法。朱偁先生认为“旧制凡历朝实录,以及重要典籍,皆贮是处。唯清代内阁另有实录库,则皇史宬已非明旧制矣”。也就是说,清代在内阁实录库,而不是皇史宬存放实录。笔者认为,这些档案是了解清代的重要史料,以致于清末光绪年间纂修《大清会典》时,“(光绪)十二年(1886年)令在馆诸臣亲赴皇史宬恭抄列圣实录以备汇纂”,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所以有清一代,实录还是应该保存在皇史宬中的,而内阁实录库,应该是存放实录副本的地方。

除了实录、圣训、玉牒之外,皇史宬中还存有其它一些档案资料或是比较重要的物品。

其一,是本纪和方略。《清史稿·礼志八》中记载:“自乾隆年始进本纪,第讷吉藏皇史宬,方略则进二部,一藏史宬,一交礼部刊发。”

其二,是清代一些重要的官印。“乾隆十四年(1749年),礼部奉谕:理藩院印文之蒙古字,不必篆书。……又谕:近因新定清

文篆书,铸造各衙门印信,所司检阅库中所藏经略大将军、将军诸印,凡百余颗。皆前此因事颁给,经用缴还,未经销毁者。……今择其克捷奏凯,底定迅速者,经略印一,大将军、将军印各七分匣收贮。稽其事迹始末,刻诸文笥,足以传示奕禩。即仍其清、汉旧文,而配以今制清文篆书,如数重造。遇有应用,具奏请旨颁给。一并藏之皇史宬。其余悉交该部销毁。此后若遇请自皇史宬而用者,藏事仍归之皇史宬。”^⑥

后来,乾隆皇帝还制定了《印谱》,“钦命总理一切军务储精经略大臣关防一,奉命、抚远、宁远、安东、征南、平西、平北大将军印各一,镇海、扬威、靖逆、靖东、征南、定西、定北将军印各一”,并为之做序。他在序中说这些印信“载在册府,藏之史宬”,序的结尾部分说“装潢藏事,并令守者什袭尊藏。为部凡四:一皇史宬,一大内,一内阁,一盛京也。”^⑦也是将这些印信分别保管。

总的来看,皇史宬在明清两代是以尊藏实录、圣训及玉牒等皇家档案为主。此外,明代有儒家经典、文渊阁藏书,清代有本纪、方略及重要印信也被列入其保管的范围。

三、皇史宬的管理情况及其他

1、管理机构

在明代,皇史宬是由司礼监来进行管理的。据《明官史·司礼监》记载:“司礼监提督一员,秩在监官之上……自提督以下,则监官、典籍十余员。第一员监官提督皇史宬”。书中又载:“皇史宬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晒晾,司礼监第一员监官提督,董其事而稽覆之。”司礼监是明代二十四监之首,其中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等更是时时伴随在皇帝身边,可见其在皇宫中有非常显赫的地位。由这个机构来负责管理皇史宬,亦可想见皇史宬在明代的重要位置。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明代的皇史宬保存的主要是御笔实录、圣训等重要档案,在某种程

度上还算为皇室服务的众多机构之一，是“内廷”的一部分。

清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但为皇史宬设置了专门的官员，而且将其归到礼部属下进行管理。《清史稿·职官一》中记载：“天聪五年（1613年），设礼部。顺治元年（1644年），置尚书、侍郎各官。……皇史宬尉，满洲三人，正七品”，此外，在《清朝通志·职官略八》、《清朝文献通考·职官》中都有与此基本相同的记载。由于其中保存的档案都与皇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担任负责官员的三名皇史宬尉都是满族人；另外这些档案只是普通的保存而已，平时利用的也并不是很多，所以皇史宬尉的官品只有正七品，与太常寺博士等相同。

皇史宬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在明清两代有很大的不同，笔者考虑其原因，大概是不愿重蹈明代宦官专权的覆辙，防止宦官借此干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清代将皇史宬从宫廷中转移出来，成为礼部下的一个正式机构，也从侧面反映了清代的封建中央集权比明代有所加强；由正式的官员而不是太监来进行管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家国天下”的统治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

2、日常管理

皇史宬是完全的砖石结构，对于保存其中的纸质档案来说，在防火、防虫方面有着很好的效果，但是档案受潮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明清两代每年都要组织力量对其中的档案进行晾晒工作。《日下旧闻考》卷148《风俗》记载：“六月六日，内府皇史宬晒曝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每岁故事也。”同书卷40《皇城》亦载：“皇史宬，藏太祖以来御笔实录。每年六月六日，奏知晒晾。”

另外，在具体的日常管理方面，清代也较之明代严格、正规。《清会典·内阁》中记载“皇史宬额设守尉三人，守史十六人”，昭槤也说“（皇史宬）设旗员年老者八人守之，地甚严密。”^⑧

3、档案的副本保存

在保存副本方面，皇史宬与唐代的甲库非常类似。甲库是唐代吏部辖下专门保存官员人事档案的机构，与官员的迁转有密切的关系。最初因为不注意副本的保存，结果永徽年间一次意外大火将这些档案全部烧毁。鉴于此，后来这些档案不但在吏部保存，还在中书省和门下省也都存有副本，所谓“名书有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书，泊门下”^⑨。

由于皇史宬中的实录、圣训等是很重要的档案，万一有什么意外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档案副本的保存是非常必要的。笔者并没有发现有明代皇史宬档案副本保存的史料，现仅以清代为例来说明。

《国朝宫史·书籍一·实录》中有许多相关记载。雍正皇帝在为《圣祖仁皇帝实录》所做的序中说：“敬成圣祖仁皇帝实录若干卷。又于尊藏皇史宬外，恭缮全秩，虔供几案。时时展读，以遂朕敷时绎思、继志述事之意”。《世宗宪皇帝实录》修成以后，乾隆皇帝命令“纂修实录告成，敬缮装潢，尊藏皇史宬、大内、盛京各一部，又缮一部尊藏内阁”。不管是出于皇帝本人阅读方便还是单纯从保存角度出发，实录除了正本之外至少还要另抄录三部副本在其它地点保存。

作为皇家重要档案的玉牒也很注意副本的保存，修成之后除了在皇史宬中存放一部之外，“又恭缮一部送盛京”^⑩。

盛京作为清政权的龙兴之地，在定都北京之后，其地还保留了各级官僚机构，而且皇帝还经常回盛京举行祭祀活动或是巡幸。因此实录、玉牒等都要在盛京保存一份副本。“（乾隆）八年（1743年）五月谕：‘奉天乃我朝发祥之地，历朝实录皆应缮清汉文各一部送往尊藏。俟见在皇史宬、内阁藏本缮成后即著在馆人员敬谨誊录，其送往仪注，大学士会同礼部详议具奏。’寻大学士等奏言：‘奉天尊藏之处，惟崇政殿后有翔凤楼，高敞壮丽，堪以尊藏。请敕下奉天将军会同盛京礼工二部、奉天府尹敬谨办理。’”

尊藏金匱照在京皇史宬内式样制备，应需官员专司守护均令该将军等妥议具奏。’从之。”^⑨不但规定了档案副本的保存制度，而且还确定了其在盛京的存放地点——崇政殿后的翔凤楼。



皇史宬内金匱

另，《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0分册中收录一份拓片，命名为《迁送清实录、御容、玉牒碑》，写有“恭送列祖、皇考实录、御容及玉牒至盛京尊藏，卜吉启程，瓣香致敬”等字样，乃乾隆十五年（1750年）高宗弘历亲自撰写并书丹。这是清代实录、玉牒等除在皇史宬保存之外，另外存副本到盛京的最好的证据。此拓片下注明此石在北京东城区南池子，而《日下旧闻考》中记载：“（皇史宬）内有碑二，一恭刊御制恭瞻皇史宬诗，一恭刊御制恭送实录至盛京诗。”据此推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所命名为“迁送清实录、御容、玉牒碑”当为《日下旧闻考》中所提的刻有“御制恭送实录至盛京诗”的那块碑。

四、皇史宬金匱石室的渊源

皇史宬“殿庑七楹，扉牖楹楣以石代之，内贮金漆柜数十，盖古人金匱石室之意”。可见这种建筑形制还是有历史渊源的。

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

誓，丹书铁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这其中就提到了金匱石室。颜师古对此曾注曰：“以金为匱，以石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义。”“匱”在古代又同“柜”，大概刘邦用来保存丹书铁契的

地方就是用砖石建成的。这也许就是此种全部砖石结构建筑的最早的形态。

自汉代以后，这种形制的建筑便鲜有出现。到了明朝弘治年间，又有人提议使用这类砖石建筑。

弘治五年（1492年），大学士邱浚就曾经提议“于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文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度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度之下层。每岁曝书，先期奏请，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员晒晾，事毕封识。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⑩如此看来，当时邱浚的设想与现在皇史宬的结构形制基本相同，而且当时也是得到了弘治皇帝的允许，但后来此事却没有了下文。究竟由于什么原因邱浚的提议没有得到实施，还有待于史料的证实。

直到四十余年后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皇史宬建成后，才将《实录》、御制文牒等存放进去。

皇史宬自建成之后，因其建筑可以充分的防火、防虫，就一直作为明清两代保存皇家档案的重要场所。同时，这种金匱石室的砖石结构建筑性质也得到了时人的称颂。

明代的王立道是嘉靖十四年(1535)的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比较了解皇史宬动工修建并完成的整个过程。他对这种金匱石室的建筑形制十分推崇,在其所著《具茨集》中就收录有一篇《皇史宬颂》:

“惟古有史,君举必书。左言右动,载笔罔虚。赫赫管彤,螭坳侍立。东马南狐,各专其职。惟我有明,肇自太祖。太宗仁宣,英宪孝武。煌煌帝业,洋洋圣谟。超坟袭典,溢于翰觚。网罗散失,广记备搜。郡国所上,太史所修。芸籒缥帙,金匱咸收。简册既繁,先后靡一。于惟我皇,览于前籍。因而出之,爰正爰辑。缮录靡忒,校讎孔精。诸臣咸勤,用观厥成。乃审厥藏,仿古石室。司空载营,石室有翼。匪栋匪楹,不节不悦。斫之袭之,有贲其饰。瑰阶玉碱,廓其靛深。疏以琼户,启以朱扃。昔藏名山,京师留副。制崇兰台,严先四库。其在于今,乃知其陋。百千万年,与国永寿。”

清代,随着对皇史宬的管理逐渐严格、正规,皇史宬也受到更多的关注。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还专门为其做了一首七言御制诗,这首诗的刻石同嘉庆《重修皇史宬记》碑一起保存在皇史宬内。

“恭瞻皇史宬

五代神谟秘典垂,崇宬肩钥壮鸿规。兰台令史无惭笔,纶阁元臣有职司。百世聪听钦宝训,万年永茂衍宗枝。瑶函金匱前朝制,殷鉴兢兢念在兹。

乾隆庚午御制并书”^①

皇史宬的形制结构较之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有很大的优势,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档案保管事业不断发展、不断探索的结果。

①《明世宗实录》卷165“嘉靖十三年七月丁丑”条,中央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1962年5月,第3636页。

②《明世宗实录》卷189,“嘉靖十五年七月戊寅”条,中央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1962年5月,第3995页。

③(明末)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6《宫阙、宫官、内官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46页。

④《元史》卷75《祭祀志》,中华书局,1976年,

第1875页。

⑤(明末)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13《皇史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106页。

⑥《明史》卷56《礼十·进书仪》,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7页。

⑦《明世宗实录》卷273,“嘉靖二十二年四月辛丑”条,中央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1962年5月,第5372页。

⑧(明末)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12《文渊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100页。

⑨《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六月庚寅”条,中央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1962年5月,第3506页。

⑩(明末)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13《皇史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114页。

⑪(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62《官署》,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1页。

⑫(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40《皇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⑬《清史稿》卷89《礼八》,中华书局,1976年,第2651页。

⑭《清史稿》卷89《礼八》,中华书局,1976年,2650-2651页。

⑮⑯《清会典》卷1《宗人府》,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第1页。

⑰《清史稿》卷104《舆服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3080页。

⑱《清史稿》卷104《舆服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3081页。

⑲(清)昭槠撰:《嘯亭续录》卷1,中华书局,1980年,第391页。

⑳柳宗元《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全唐文》卷577,第5834-5835页。

㉑《清朝通典》卷55《礼》,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95页。

㉒(明末)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12《文渊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101页。

㉓此诗拓片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0分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业务人员)

不同材质文物温湿度环境的探讨

不同材质文物温湿度环境的探讨

文物是人类文明和历史的承载体,记录了中国的古老文明,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破坏,就会使那些有价值的历史、科学、艺术成分部分或全部消失,所以对文物进行保护显得非常重要。而文物保护中最应该注意的问题就是文物所处环境温湿度的问题,因为环境中温湿度的变化是非常频繁的,并且变化幅度也较大,变化的幅度越大对文物影响越大。像北京地区日温差一般在 8°C 上下,相对湿度日变化值一般在50%左右,文物如果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会严重受损,像首都博物馆新馆试运行之初,温湿度条件无法控制使有机质文物面临损坏,大家想尽各种办法增加展柜内湿度才保证了文物的安全。为什么温湿度的变化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这主要是因为文物是由材料构成的,而材料都是由分子、原子按一定规律排列而成的,这些分子、原子在温湿度不适合或变化较快的环境里,会打破原来的排列规律,使材料老化变质。只有在一定的温湿度环境里保存才能保证文物的安全,具体对于每种材质的文物所需的温湿度条件也是不相同的,都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上限或低于其下限,对文物的寿命都有影响。文物合适的温湿度条件与文物的材质有关,我们的前辈们已经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制定了相关材质文物存放的条件,但他们没有从构成文物的材料方面进行理论探讨来证明他们的结论。下面我们就从材料学角度对每种材质文物的结构及合适的存放环境做一个分析,以引起大家对文物环境的重视。

何海平

一、温度对文物的影响

温度是表示冷热程度的物理量。衡量温度高低的标准是温标。常用温标有三种,即摄氏温度($\text{TC}/^{\circ}\text{C}$),绝对温度(TK/K),华氏温度($\text{OF}/^{\circ}\text{F}$)。三种温标之间的关系如下:

$$\text{TC}/^{\circ}\text{C}=\text{TK}/\text{K}-273.15$$

$$\text{TC}/^{\circ}\text{C}=[(\text{OF}/^{\circ}\text{F}-32)\times 5]\div 9$$

即华氏换成摄氏:减32乘以5除以

9;摄氏换成华氏:乘以9除以5加32;摄氏换成绝对:加273.15。

常用的温标是摄氏温标,单位是摄氏度,摄氏温标规定在标准状况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为0℃,沸腾水的温度为100℃。从微观看,温度反映了物质的原子或分子杂乱运动的激烈程度,是构成物质的原子、分子动能的标志。任何一种物质都有一定的内能,内能由分子间动能和势能组成,物质的内能就等于组成物质的所有分子的动能和势能的总和,因此温度对内能的影响较大,温度升高,内能增加,而内能增加就会加速化学反应的发生。所有的化学反应,都是由于原子、分子之间发生相互有效碰撞、相互交换成分而发生的,一般有效碰撞的次数约为总的碰撞次数的十分之一。原子、分子之间的相互碰撞次数增多,化学反应速率将相应增加。温度升高,分子的动能增大,运动速度加快,导致原子、分子之间的碰撞几率大大增加,这样使得化学反应发生的速率也相应增加,这就是温度升高、化学反应速率加快的原因。无论什么材质的文物,其腐蚀老化过程都是构成文物的原子、分子与其周围环境中的原子、分子发生错综复杂的化学反应,使文物自身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都发生变化的化学过程。如酸雨对石质文物的腐蚀作用就是酸与石灰石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可溶性盐和气体的过程。具体的化学反应离子方程式为:



因为温度越高,化学反应速率越大,所以温度升高,文物的腐蚀老化速率也会加快。由此可见,文物应保存在较低温度的环境中,但也不是越低越好。这是因为温度降低后,虽然文物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性减小了,但其物理变化对文物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从材料学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物都不是一种纯净物,而是由几种物质混合而成的混合物,这样使文物在低温下很容易受损。当温度降低以后,各种材料的收缩率不同,有的甚至会发生物态变化,使得文物内部的内应力增加,对文物的危害很大,会

大大缩短文物的寿命。如装裱过的字画,其每层纸张的收缩率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环境温度太低,其层间就会存在一定的应力,这种应力会对整个文物有危害,轻则降低每层间的附着力,重则使画面产生撕裂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还有石质文物,一般孔隙较多,其内部都会含有一些水分(以气体或液体的形式存在),当温度低于0℃时,内部的水分会以固体(即冰晶)的形式存在,由于水凝结成冰后体积会增加,挤压石质文物基体,产生很大的内应力,使文物破裂,所以温度太低也对文物的危害很大。根据几代文物工作者的实践及研究,一般文物保存在18℃-22℃之间比较合适。因为这一温度范围不仅影响化学反应,而且细菌、霉菌(最适宜霉菌繁殖条件的气温是在25℃-30℃)等微生物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的活性最低,减轻了微生物对文物的损坏。

二、湿度对文物的影响

湿度对文物的影响比温度对文物的影响要复杂得多,从材料学角度来说,构成文物的材料结构和性质不同,发生化学反应的条件也就各不相同,有的需要在高湿度条件下才能与外界环境发生化学反应,有的在低湿条件下就能与外界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因此各种材质的文物对湿度的要求也不相同。湿度是以空气中水汽含量或潮湿程度来表示。空气中含水汽量多,空气湿度就大,反之,空气中含水汽量少,空气湿度就小。空气湿度的概念有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两种。绝对湿度是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的水汽量,即空气中水汽的密度,以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水汽质量表示。通常用Q代表绝对湿度,单位为克/立方米(g/m³)。相对湿度是指一定空间内,空气实有的水汽压强(e)与相同温度下饱和水蒸汽压强(E)的百分比,常用RH表示。

$$\text{RH} = e/E * 100\%$$

相对湿度是测量博物馆湿度最常用的湿度指标,它是衡量空气环境的潮湿程度

对文物是否合适的重要指标。测得的湿度百分数值愈大,表示湿度愈大;反之,湿度愈小。温度、绝对湿度与相对湿度是互相关联的三个物理量,改变其中一个物理量,另外两个物理量也会随之改变。在一定温度和压强下, E 值不变, RH 随 e 值而变化,即空气中水汽含量增加时,相对湿度增大;水汽含量减少时,相对湿度减少。当空气中水汽含量(即 e 值)不变时,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 RH 随 E 值变化, E 值越大, RH 值就越小,即饱和水蒸汽压强与相对湿度成反比。而 E 值与温度有密切关系,温度越高, E 值越大,相对湿度就越小;反之,气温越低, E 值越小,相对湿度就越大。总之,相对湿度随温度的变化而显著地变化着。增加湿度的方法主要是加入水蒸汽。降低湿度的方法主要有调节温度和机械去湿的方法。气温是影响相对湿度的主要因素,当空气的相对湿度显著增大,用提高室温的办法,可使相对湿度降低。而机械去湿就是将潮湿空气通过机械方法经过一个吸水装置,使空气中水分凝聚下来,以达到去湿的目的。各种文物所处的环境必须经过加湿或者去湿使湿度稳定在其合适的范围内。各类文物适应的湿度范围不一样,下面就按材质的不同简单分析一下其适应的湿度。

1、书画或丝织品等纤维类文物

中国人喜欢在纸或绢上书写作画,故亦称纸绢画。其所用的基本材料是纸、丝织品和颜料,而丝织品除了作画还用作衣物、饰品等。书画经装裱后,增加的辅助材料还有粘合剂、木材、黄明胶、明矾、象牙、牛角、玉石、金属、珐琅、瓷等。构成中国书画的主要材料,是有机纤维质地材料,这是中国书画不易保存的原因所在。保护中国书画的实质是保护纸和丝织品。书画所用的丝织品,包括绢、绫、罗、绮、纱、锦等,它们只有织造结构、花纹图案、经纬密度之区别,其质地都是蚕丝。所以无论是书画还是衣物都是复合材料,其主要成分都是纤维,

是各种纤维与其它材料复合而成的。

不论麻纸、皮纸或竹纸皆为植物纤维,纤维素的分子式为 $(C_6H_{10}O_5)_n$ 。纤维素的分子是由葡萄糖分子脱水而成的长链大分子的结构。纤维素的分子结构,决定着纸张的强度、耐久性和其它性能。纤维素分子结构的氢氧基是一个强的亲水基团,是纸张吸湿的根源。当环境湿度大,纸张纤维则大量快速地吸收水份,对纸张的耐久性和寿命产生很大影响。纸张纤维吸潮,给纤维素的水解及其它破坏性化学反应创造了条件。纸张吸水发生溶胀现象,纤维之间的距离增大,空气污染物容易侵入破坏纤维,加速化学破坏作用。纸张潮湿又遇光线,在加速纤维素水解的同时还会发生光氧化和光分解反应,纸张会迅速破坏。霉菌和害虫就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纸张潮湿也容易霉变和虫蛀。潮湿还可使水溶性的色彩渗透扩散、变色褪色、字迹模糊,因此纸张必须要防潮。但纸张也不能太干燥,纸张过于干燥,就使其塑性降低而易于脆裂。这是因为纤维素分子中的氢氧基,不仅是一个亲水基团或吸湿中心,还可以产生有一定键能的氢键,是纤维素分子之间的重要结合力。氢键使纤维素分子排列得整齐紧密,使空气污染物不易进入,保护了纤维素免遭破坏。纤维素分子间含有适量水份,也产生氢键,把纤维素分子结合在一起。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水产生的氢键,使纤维具有塑性和软和性,这对纤维耐久是有益的,所以纤维素分子中含有一定的水份是必要的。纸张在制造出厂后都含有一定的水份,在相对湿度为50%~60%的环境中,纸张仍能保持相同比例的水份,这时纸张柔和、不霉变,耐久性佳。可见,保持纸张环境的相对湿度,对纸张的寿命是很重要的。干燥环境不仅使纤维组织干脆断裂,就连装裱所用浆糊,也会过度干脆,亦形成机械性损坏。环境湿度过高,纸张、丝织品等有机纤维质地藏品,不仅因吸水使纤维强度降低,而造成机械性损坏,还成为微生物的良好养料,促使霉菌滋长。一般地说,相对湿度在60%

以下,霉菌失去正常生长发育的能力。相对湿度在75%以上,霉菌繁殖较快。最适宜霉菌繁殖的相对湿度在80%-95%。因此,纸质文物的最适宜的相对湿度范围在50%-60%之间。

丝织物是用动物纤维蚕丝编织而成的,蚕丝的主要成分是丝素和丝胶,它们都是蛋白质。我们知道,蛋白质是一种含氮的有机高分子化合物,而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是氨基酸。蛋白质分子的空间结构形式很多,在蚕丝中,丝素为纤维蛋白质,丝胶为球状蛋白质。蚕丝的纤维结构为,每根蚕丝由两根单丝平行粘合而成,每根单丝的中间为丝素纤维,作为蚕丝的主要成分,外面为丝胶,起到粘结作用。丝素为蚕丝的主要成分,经加工后的丝织物已除去大部分丝胶,故丝织物主要是丝素纤维。因此丝素纤维的性质,决定着丝织物的性能与质变。丝素纤维具有吸湿性,吸收水蒸气后,水分子进入纤维内部,使肽链之间的结合力减弱,纤维强度下降。丝织物与水接触,或在空气中都能吸收水份,造成其体积膨胀、重量增加、强度降低。丝织品保存环境的潮湿,会加速蛋白质的分解及老化,造成丝织物的机械性损坏。丝素的另一性质是会发生霉烂变质,这是由于微生物的分泌物的腐蚀作用与酶的催化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酸和碱都会促使丝素水解而使其破坏,丝素对酸的抵抗力比植物纤维强,丝素对碱的抵抗力比对酸的抵抗力弱。从上述丝素主要性质得知,防潮湿是保护丝织品,防止丝织品质变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丝织品过于干燥,就会脱去丝素纤维中的水分,使纤维分解变质,易失去塑性而导致脆性断裂;不仅如此,纤维缺水后会象纸质纤维一样使其老化速度加快,对丝织品文物的危害极大。所以现在文物工作者们普遍认为丝织品所处环境的相对湿度也应该在50%-60%之间。

2、金属文物

金属文物是指由金属及其合金构成的

文物,如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等。金属一般都以晶体的形式存在。每个原子如果都有规则地排列在晶格节点上,这样的晶体为完美晶体。但现实中的金属原子不可能都是这么有规则的排列,其中有一些原子总不能按其正常的规律排列,看上去就象有些原子排列错位一样,这在晶体学里面称为位错,任何一种晶体都存在位错。从电化学的角度来说,位错存在的部分电极电位低,而没有位错的部分电极电位高,当有电解质存在时,位错部分称为阳极,其它部分称为阴极,位错部分与其他部分形成原电池,位错部分的基体被氧化,使文物发生腐蚀,这些存在位错的地方就成为金属易腐蚀的地方,这种腐蚀行为称为电化学腐蚀。电化学反应是金属腐蚀的重要因素,几乎所有金属文物的腐蚀机理都与电化学反应有关,但电化学反应的发生必须要有电解质溶液存在,因为没有电解质溶液电子就无法传输,电化学反应无法进行。金属文物内部普遍存在位错等缺陷,如果文物所处环境湿度太高(如相对湿度超过45%),金属文物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水膜,这层水膜溶解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及文物表面的盐类,形成电解质,使文物发生电化学腐蚀。金属文物腐蚀的主要原因是发生电化学腐蚀,因此控制金属文物所处环境的湿度是解决金属文物腐蚀的主要措施。一般金属文物所处环境的相对湿度必须在45%以下,有条件的最好低于35%。

3、石质文物

石质文物是指由岩石组成的文物,主要成分为碳酸盐和硅酸盐。石质文物的种类很多,如花岗岩文物、汉白玉文物、青砂岩文物等。不同岩石具有不同的成分,不同的孔隙率高、吸水率,有的易溶于水而有的不溶或难溶于水。一般来说,坚硬的石头孔隙率低,不易被有害物质侵蚀,寿命相对较长;而酥脆的石头易风化,寿命相对较短。石质文物发生腐蚀的主要形式就是石材的风化使文物表面裂隙纵横交错、崩塌、瓦

解、酥粉和剥落,失去文物的价值。因风化形态不同,通过风化程度与岩石的吸水性和物理性能对比分析后可以发现,孔隙率高、吸水率大、强度低、比重小的岩石表层风化严重。在砂砾岩中还存在着胶结物的问题,含泥质大和泥质胶结的岩体,表层风化比含泥质少和钙质胶结的风化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孔隙率越高,环境中的水分及其它介质就越容易进入文物基体内部,文物基体越容易与水等介质反应,这样文物就更易腐蚀。总的来说,石质文物的风化都离不开水及有害气体。如果空气湿度太高,在石质文物表面就会凝结成水珠,水珠溶解有害气体后,与文物发生反应,使文物腐蚀。但如果湿度太低,会使文物内部某些盐类失去结晶水,改变了石质文物内部的晶体结构,使文物酥脆、甚至断裂。所以普遍认为石质文物所处环境的相对湿度在40%-50%之间。

4、陶瓷文物

陶器是我国历史艺术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用粘土(如云母、石英、长石、高岭土、方解石以及铁质、有机物等组成)经配料、制胎、成型、干燥、焙烧工艺制成的,一般焙烧温度在700℃-960℃之间。器物质地的硬度和颜色与焙烧的温度、火焰有关。陶器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粘土中的有机质被氧化,生成二氧化碳气体逸出,因此陶器的结构不致密、多孔隙,孔隙度一般在15%-35%之间,如果环境的相对湿度过高,陶器可吸收大量的水分,使结晶体膨胀破裂,从而导致文物强度、韧性降低,容易脆裂。瓷器的表面涂有釉层,烧制温度一般在1200℃-1500℃之间,在此温度下,胎体中部分成分开始熔化,填充到胎体的孔隙中,高岭土、石英、氧化铝聚合,形成紧密的网状结构,孔隙率相对较低,所以质地坚硬、吸水率低,对温湿度要求相对较低。陶瓷文物的材质属于无机硅酸盐类,因为陶瓷文物有很多

孔隙,容易吸收环境中的水分,所以陶瓷文物保存环境的湿度也不宜过高;但过低也会加速其老化,脆性增加。普遍认为陶瓷文物环境应该与石质文物所处的环境相同,相对湿度也在40%-50%之间。

5、竹、木、漆器等

竹、木、漆器都属于有机质类文物,因为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有机纤维素以及酯类高分子化合物,其材质与纸质文物相似。这些有机物是微生物的养料,由于长期受到地下水(含酸、碱、盐等)及其它有害物质的侵蚀,使构成文物的纤维素、木质素等遭到破坏,从而导致这些竹、木、漆器糟朽不堪。这些文物出土后经过脱水、加固等措施,文物暂时处于稳定状态,不会进一步腐蚀,但必须保存在合适且稳定的相对湿度条件下。如果相对湿度过低,这些文物会进一步脱水,脱水后由于收缩率不同文物内部会产生内应力,严重时文物内部纤维断裂,使文物起皱、开裂;如果相对湿度过高,文物又会发生膨胀,由于膨胀系数不同,文物内部会产生内应力,也可能使文物起皱、开裂,并且还会促进微生物腐蚀,所以如果处理过的文物在相对湿度变化较大的环境中,会加速竹、木、漆器等文物的腐蚀老化过程。因此,竹、木、漆器与当初出土时的状态以及处理后的状态有很大关系。一般相对湿度范围在50%-70%之间。

文物是由材料构成的,材料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才能不受损害,所以除了以上条件外,文物所处环境的日温差应该在2℃以内,日相对湿度差值应该在5%以内,如果达不到这些条件对文物的损害就较大。并且材料都会同周围环境发生老化腐蚀等现象,直至最终消失,所以文物作为材料也有一定的寿命,如果我们能根据其特性妥善保存,就能大大延长文物的寿命。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业务人员)

中西方文物修复对比之异同

王金生

2005年底,我作为故宫博物院文博科技考察团中的一员,随团对意大利和德国进行了考察。考察了罗马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意大利中央书籍病理研究所、国际文物保存与修复研究中心、佛罗伦萨“花岗岩工厂”修复研究院和巴伐利亚州文物修复中心等文物保护单位。听取了外方专家关于文物修复理念的阐述,观看了他们在修复文物时的实际操作和演示,了解了他们的修复工艺和仪器设备状况。我们重点参观了他们的文物修复室,包括油画修复室、青铜器修复室、陶瓷器修复室、石器修复室、书籍纸张和绘画修复室;并且与外方同行进行了多次交流和座谈,这些活动使我们对国外文物修复工作的发展现状有了更加直观地了解和认识。下面是我在参观考察活动中的一点体会:

一、通过实地考察和交流,我们感到在文物修复理念和修复原则上双方存在着不同点。德、意两国专家多次提到“最小干预”的原则,提倡“可修可不修的以不修为好”,在修复文物时要尊重原作,不要进行艺术再创造,人为的干预要越小越好,“要尊重文物的唯一性”。即使是经过修复的文物,也应保留文物修复的痕迹,例如:他们在一幅已经修好的油画上面,特意贴上一块旧的底色样

本,以供人们增加辨识。在修复其他类别的文物时,填充补缺部分同样是必须可辨识的。经过他们修复的文物,修复痕迹都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些已经修好的文物旁边还标有说明,指出被修复过的部位。他们一再强调,修复文物一定要量力而行,要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能修多少就修多少,目前办不到的,要等待将来科学发展了再完成,这样也给后人留出发展的空间。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我们所坚持的修复原则与之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在国内修复文物时,随形、随色、填充补缺、做旧等方面,坚持的一贯原则是修旧如旧,即使遇到极其复杂的问题或者遇到极大的困难时,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破损的文物复原。在制作复制品时,也以越接近原作越好,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尤其是在修复字画、青铜器、陶瓷器等方面,仿旧、



意大利修复人员拼接教堂天花板碎片

做旧技术更是炉火纯青。这样做不仅要求修复师要有高超的修复技艺,还要胆大心细、富有空间的立体想象能力,对出现的各种突发问题具有很强的把控能力和应变能力。正是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和追求,长期以来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破损的文物。在如何看待修复文物的理念和坚持什么样的修复原则这个问题上,各国都有各自的思维方式及处理问题的手段,而且各自的文化背景又不尽相同,到底应该坚持哪一种修复原则,不可一概而论,客观地说双方各有利弊。这些问题可供人们今后继续探讨,或者由漫长的历史发展来作答。

二、在修复文物方面,意、德两国非常注重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工艺相结合。在我们参观的文物保护机构中,除了设有各类文物修复室外,每个修复行业中都设有自己的实验室,并且始终坚持实验在前、修复在后的原则。他们在动手修复文物之前,先由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对文物作充分的研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的残损状况进行拍照、绘图、扫描,分析材料的成分、理化特性及制作工艺,然后再由科研人员与修复师共同制定修复方案,确定修复中使用的工艺和材料。在修复文物的过程中,他们尽量采用传统工艺,材料也尽量选择与原材质相同或相近的,对于不得不使用的新型材料,都要经过反复试验和论证,最后才由修复师实施。在这个问题上,与之相比,我们遇到问题时,利用实验室的科技手段分析较少,而往往是由经验来代替。也正是由于我们在各个文物修复门类中拥有一批实力很强的专家和骨干,在修复文物一线上积累了丰富的修复经验,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也就弥补了欠缺科技实验手段的弱点。实际上在我们工作中,经验和科学实验都是必不可少的,加强二者的结合,加强科技理论、科技分析、科学实验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手段对优秀的传统工艺加以总结提高,大力提高科技保护意识,应用科学技术手段对文物进行保护,这些都

是势在必行的。可以说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新型的、跨越文、理、工等各科的边缘科学,它内容多、涉及面广,十分繁杂。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文物保护科技队伍,增强文物保护科技实力是我们刻不容缓的工作。特别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环境千变万化,对文物影响的因素也会逐渐增多,所以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解决各种新问题应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发展方向。

三、加强文物修复档案的建立、健全,使之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文物档案的建立与完善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德、意两国专家都是非常重视的。他们的档案内容涉及到文物的残损细节和总体状况、修复师所使用的修复材料及修复师的姓名。如果是为外单位修复文物,修复档案要连同被修复的文物一同交付给对方。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也正在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这项工作。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在修复文物时,每件文物都要留下修前、修中、修后的影像资料,作为第一手资料准确记录修复文物的基本过程。其次,文物修复档案力求细致、准确、全面,从文物的名称、编号、年代、收藏地点、类别、等级、尺寸、重量、附属物、损伤状况到历史背景与外观描述、修复方案、修复过程、修复难点及解决的办法,都要一一认真的记述下来。实践中我们也深深地感到,做好这项工作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历史意义,它既是对我们现在工作的系统描述和总结,也是为后人提供修复经验、引以为戒的参考资料,参照它可以让后人在修复、保护文物时,减少盲从、少走弯路。总之,这是一件造福于后人的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文物修复档案绝不能放弃任何细节。

四、充分挖掘社会力量为文物保护工作服务。在抢救各类文物和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些工程是浩大的,仅靠文物部门的力量是不能满足需要的。国际上采用的办法是,招募社会上有专长的自由职业者参与修复工作,由文物工作者



德国雕塑家在复制雕像

负责指导和监督。多年来,意大利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已形成了“保护与利用并举”的模式,由公共部门负责保护,政府每年给予大量公共财政投入,同时鼓励私营企业家大力投资保护文化遗产,由私人或企业负责经营管理和利用,让文化遗产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促进了就业和相关行业的经济发展。这一点与我们是比较类似的,故宫在古建大修和文物大修方面也在借助社会力量的参与,并且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学者、专家、工艺大师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充分利用他们的人才优势和仪器设备,这样做也是文物保护的一条有效途径。

五、后备人才的培养。意大利和德国都非常重视后备人才的培养,文物修复室就是他们的大学课堂。修复专业的大学生每年有 11 个月的时间是在博物馆修复室内度过的。他们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读期间,学生由专家指导从头至尾修复每一件文物,让学生掌握修复文物的全过程。国外的修复机构内还设有自己的文物修复学校,而且要求修复专业的学生必须要掌握物理、化学知识,要能够使用实验室内各种仪器设备。在我国,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一直是靠师承,由师傅带徒弟在干

中学、学中干。近些年来,我国许多高校也设立了文物修复专业,学生在校期间以学习基础知识为主,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二者相比孰优孰劣,并没有判断标准,我想还是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根据实际的需要,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修复后备人才,才是至关重要的。

意大利政府对文物修复工作非常重视,每年为文物修复工作拨专款数亿欧元,同时对投资文物修复的企业或个人给予税收

优惠。意大利政府在 2004 年制定了《保护文化和自然景观遗产法典》,明确界定政府和地方行政的职责。法典规定,对破坏遗产的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数万欧元至数百万欧元不等的罚金以及 6 个月至 1 年的监禁。国家在出台各种文物保护法规的同时,还非常注重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全国各地经常举办音乐会、研讨会等与文化、历史有关的活动,帮助年轻人增加历史知识,培养艺术方面的修养,加强保护文物的意识。在素有“大露天博物馆”之称的意大利,全国拥有 3200 多座博物馆、10 万座教堂和 5 万多座历史建筑物,收藏着 510 多万件文物和 200 多万件艺术品。每一座废墟遗址都记录着浩大、深远的历史。现在已有 40 多处古迹、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综上所述,在文物修复的理念上、文物修复工艺技术上,我们同国外既有相同、相通的地方,又有一些不同点,但只要我们坚持一个宗旨:一切要从有利于保护文物出发,既不要盲从于别人,也不要轻易排斥别人。要通过比较、分析,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不断提升我们修复文物的工作水平。

(作者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馆员)

北京市文物局 2007 年一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1月16日~17日 全市文物系统工作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局长孔繁峙,副局长舒小峰、于平、崔国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局巡视员巴爱民同志及老领导许金和、张大祯同志。会议对2006年工作做了全面回顾,并部署了2007年工作。全市18个区县文委及2个特区办事处的主任、文物科(所)长,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局机关各处室正副处长参加了会议。

1月17日 原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金鲁同志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遗体告别仪式于1月23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李其炎、单霁翔、杜德印、蔡赴朝等领导参加了告别仪式。

1月22日 万寿寺东路安全隐患整治及管理交接仪式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行。万寿寺东路的管埋使用权正式移交北京艺术博物馆。杨玲馆长与总政话剧团、总政歌舞团的领导分别代表各自单位在协议书上签字。孔繁峙局长、于平副局长出席了签字仪式。

1月25日 海淀区建设委员会在万寿寺东路居民区张贴了“北京市城市建设项目拆迁公示”,万寿寺东路居民搬迁工作正式启动。

1月26日 市文物局与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北京奥运新闻中心及北京市“2008”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共同组织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日本NHK、德国电视

台等境外主流新闻媒体记者30余人,集体参观了位于奥运主场馆中心区、正在修缮中的北顶娘娘庙和龙王庙两处文物古建筑群。孔繁峙局长介绍了配合奥运场馆建设工程进行的文物保护工作情况,市文物研究所宋大川所长介绍了配合奥运工程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出土文物情况,并就文物遗址保护与奥运场馆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1月30日 “北京市2006年度文物拍卖工作总结会”在康铭大厦召开,会议总结了2006年北京市文物拍卖工作的总体情况。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副局长于平以及市工商局、商务局、地税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北京拍卖行业协会等各相关管理部门的领导及在京70家文物拍卖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2月5日 按照行政执法程序的有关规定,提请管辖法院强制拈花寺的产权单位和管理使用单位拆除非文物建筑、消除安全隐患、修缮文物。2月27日,根据拈花寺的管理使用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及其上级单位愿意以协商的方式继续积极同各相关单位协商解决目前拈花寺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并正式请求中止向法院强制执行的申请,暂从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的申请。

2月6日 召开16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整改安全隐患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向在京媒体介绍自2005年底对全市存在

较严重安全隐患的拈花寺等 16 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产权单位和管理使用单位依法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一年来整改安全隐患工作情况和隐患整改的进展情况。

2月8日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学勤,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文化处处长王文光到局调研。孔繁峙局长汇报了 2006 年全局工作情况及 2007 年工作计划和重点任务。

2月28日 孙安民副市长到局调研。孔繁峙局长汇报了首都博物馆展览和文物局今年重点工作等有关情况。孙副市长在听完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

3月9日 召开局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总结 2006 年思想政治工作,部署 2007 年组织宣传、纪检监察和老干部工作,并对首都博物馆等 8 家单位颁发了文明单位奖牌。会议由巴爱民巡视员主持,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舒小峰同志代表局党组总结并部署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孔繁峙做重要讲话。机关各处室正副处长、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参加了会议。

3月12日 为期一周的“博物馆管理与展览组织高级研修班”在北京西山大觉寺正式开班,研修班邀请法国欧洲文化行动学会负责人、法国国土文物高级官员高乐菲女士和法国欧洲文化行动学会主任阿兰·儒弗莱先生主讲。北京地区近 30 家博物馆的馆长和相关专业人员参加了学习。

3月15日 召开局专家组成立大会。专家组成员、机关各处室领导、局属各单位党政领导参加了会议。孔繁峙局长、崔国民副局长分别做了讲话。会议向专家组成员颁发了聘书,并讨论通过《北京市文物局专家管理办法(试行)》。

3月22日 召开局顾问组成立大会。局党组成员、文保协会及博物馆学会领导、机关各处室领导及局属各单位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会后,顾问组召开了第一次全体顾问会议,推选刘燕玲同志为顾问组负责人。

3月23日 北京地区博物馆工作会议在首都博物馆多功能厅召开。北京地区 90

余家博物馆的馆长及 18 个区县文委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布置了今明两年北京地区博物馆的重点工作,介绍了“双两百”(两百项固定展览,两百项临时展览)活动和安排、博物馆重新登记事宜、市属及区县博物馆清库等工作。孔繁峙局长做了总结发言。

3月26日 意大利罗马市市长瓦尔特·维尔特尼先生及访华代表团一行参观首都博物馆。于平副局长、首博韩永副馆长陪同参观。

3月27日 北京奥组委在首都博物馆发布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奖牌式样。发布仪式由杨澜和孙正平主持。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出席发布仪式并致辞。发布仪式上,奥运冠军许海峰、马燕红、刘璇、李小双、邢傲伟、高敏畅谈对奥运会奖牌的理解,并由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蔡振华、奥运冠军邓亚萍分别揭幕“北京 2008 年奥运会金、银、铜牌”。

3月份 为解决皇史宬安全隐患,组织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召开第四次协调会。两单位在搁置产权争议、启动搬迁问题上达成共识。

3月份 对全市存在较严重安全隐患的国立蒙藏学校、吕祖阁等 18 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 28 家产权单位和管理使用单位依法送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3月份 举办“第二期区县干部文物鉴定培训班”,全市 18 个区县的 30 余位区县干部参加了为期三周的培训学习,授课内容有古典家具鉴定、佛教知识、古代书画鉴定。

1季度 承担的“奥运倒排期折子工程”项目进展顺利。完成了北顶娘娘庙的鼓楼、大雄宝殿等建筑主体及屋面的修复,完成了龙王庙第一进院建筑主体及屋面的修复,完成了图海家族墓地碑刻的保护工作。

1季度 奥运场馆建设中出土文物修复、研究和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工作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已修复文物 300 余件、绘图 900 余件、照相 200 余件,并整理完成工程

的文字记录,初步编辑完成《北京奥运场馆工程地下文物保护工作报告》。

1 季度 着手落实国家文物局对全国文物市场现状调研报告的汇总工作,共收到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自治区的调研情况总结,并与国家文物局赴上海、江苏、浙江进行实地调研,调研报告进入最后整理阶段。

1 季度 向局内行政执法人员颁发国家文物局统一制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行政执法证》。

1 季度 地安门西大街 153 号四合院的产权单位和管理使用单位——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投资 26 万元安装了安全技术防和避雷设施,完成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整改内容。

1 季度 完成了对十三陵、故宫等 36 家国保单位的巡视检查和 30 家重点市保单位的抽查工作。对 5 处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了抽查。对 20 家博物馆进行了检查。

调查处理群众举报 27 起,处理违法案件 5 起,实施行政处罚 1 起,罚款 5 万元。

1 季度 组织完成了 07 年度“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中消防安全项目招投标的前期准备工作。

1 季度 组织完成了 07 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市文物系统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发生一起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引起的安全事故。

1 季度 对区县文化委员会和局属单位中获得 2006 年度文物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1 季度 下发了《北京市文物局直属单位安全保卫工作考评方案》和《北京市区县文化委员会文物安全和文物行政执法工作考评方案》。

1 季度 组织对公检法部门涉案文物鉴定 20 次,接待前来鉴定的人员 40 余人次,共计鉴定涉案文物及复、仿制品 140 余件,起草、打印鉴定意见 20 份。

2007 年第一季度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生	老人
首都博物馆	116343	77737	38606	17864	7008
大觉寺	27820	18935	8885	2120	3933
正阳门	11786	10500	1286	213	653
徐悲鸿纪念馆	6240	1775	4465	413	1270
智化寺	10183	6194	3989	419	1850
辽金馆	4289	0	4289	694	1564
西周馆	4257	0	4257	1648	631
古代艺术博物馆	15492	10386	5106	1131	3764
团城演武厅	11624	0	11624	1172	7343
大葆台	5935	0	5935		
大钟寺	24487	17425	7062	2624	1251
古建馆	17169	14772	2397	1447	2014
白塔寺	18803	6852	11951	1181	5422
老舍纪念馆	2521	1138	1383	1002	840
德胜门	36323	33110	3213	426	1763
石刻馆	7078	6578	500	456	500
孔庙和国子监管理处	24382	13311	11071	2720	905

(本表由市文物局博物馆处提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 2007. 2/张展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402-1885-0

I. 北… II. 张… III. 文物工作-北京市-丛刊 IV. G269.27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0740 号

北京文博(2007 * 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定价:10 元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部分介绍(一)

柏林寺

●年代:元、清

●说明:柏林寺位于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始建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重修。柏林寺坐北朝南,建筑分为三路,主要建筑建于中路,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殿和万佛宝阁,共五进院落,东西两侧各有配殿、廊庑。东西路另有行宫院、东斋堂和小法堂等建筑。柏林寺保存的龙藏经版,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珍贵文物。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



大觉寺

●年代:明至清

●说明:大觉寺位于海淀区北安河乡西南的阳台山麓,始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年),明宣德三年(1428年)、清代曾修葺。大觉寺坐西朝东,依山势而建,保持了辽代契丹人“朝日”的习俗。中路轴线依次为山门、放生池、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佛殿、大悲坛等建筑,两侧有碑亭、钟鼓楼。另有方丈院、僧房、香积厨、四宜堂、憩云轩、迦陵禅师舍利塔、龙王堂、领要亭等建筑。寺内供奉的佛像,造型优美,形象生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ISBN 978-7-5402-1912-3



9 787540 219123 >

定价:10元